

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鄭梓 教授

《中國論壇》半月刊與戰後台灣  
自由民主之路(1975-1990)



研究生： 羅 元 德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



## 謝辭

本論文得以完成，首先感謝指導教授鄭梓老師的審閱指導、細心斧正，並給予學生充分發揮的空間。尤其鄭梓老師在筆者大學時代所開設的「歷史與新聞報導」和「歷史與新聞評論」兩堂課，令我獲益良多，並引發我對於報紙與雜誌研究的興趣。後來訂閱電子報和作剪報，便成為筆者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並且將其主題分類成不同的資料夾，長期下來亦累積不少寫作材料，對問題思考的觀點與見解有頗大的幫助，非常感謝鄭梓老師給我的啟發。在碩士論文口試時，丘為君、任冀平老師的不吝指正，以及提供的寶貴建議，使筆者獲益良多，在此特予感謝。

筆者亦感謝東海大學諸位師長的教導與鼓勵，包括古鴻廷老師（研究實習）提供我擔任大二中國現代史課堂助教的磨練機會；張榮芳老師（文獻研讀）在論文發表會的評論與指教；張炎憲老師（台灣近代史專題研究）帶領學生參觀國史館的難得經歷；哲學系苑舉正老師（人文經典研讀）啟發我對盧梭自由哲學的認識；社會系張華葆老師（歷史社會學、社會心理學）開展筆者在社會科學領域的視野；賴淙誠和郭麗真助教協助在學階段的各項事務。

此外，感謝研究所學長姊在課業上的關照：陳志昌、陳恕、謝銘育、黃文榮、蔡裕仁學長，林韻柔與廖庭櫻學姊。接著感謝過去參與讀書會的好友：文義、志豪、廷叡、家榮、元悰、順昇、柏樟、敏璋、國豪、拓梓、士賓。我們的讀書會，或者是後來的改稱「社團」，即從原先的指定閱讀書籍，轉型成分享彼此寫過的報告文章與讀書心得的模式。如此的做法，主要是不想構成大家額外的負擔，希望成員能定期來聚會即可。經歷過這些日子以來，我深刻體會到，想要凝聚讀書會這種沒有利害關係的自發性團體，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過去我曾參加過兩年的讀書會，跟幾位好友學習到不少東西，互相切磋琢磨。雖然他們有些人已經畢業了，各奔東西，不過我仍相當珍惜這份情誼，並感謝他們開啓了我不同的人生視野。再來感謝從過去以來，所有曾經和我一起學習成長的同學們：沈亮、裕盛、勝智、憶汶、仁侃.....等等。

最後感謝父母的扶持與照顧，使筆者專心撰寫論文，無後顧之憂；弟弟元庸、妹妹巧芸和我在求學過程中的相互提攜，尤其是元庸增長我有關易經和佛學的見聞，讓我對人生有更多的哲學思考與精神支柱。東海大學的優美校園、完善圖書設備，提供筆者舒適的環境完成學業，度過從學士到碩士畢業的八年光陰，於此一併向其致謝。

## 寫作有感

在 1970、1980 年代的時代背景中，受限於戒嚴時期的黨禁、報禁，以及國會尚未全面改選，使得反對派人士以「辦雜誌」做為言論發表的重要戰場。雖然當時的黨外雜誌屬於市場主流，不過卻也常因為其言論較激烈而遭到查禁、停刊的命運。《中國論壇》相對於當時保守的國民黨政府與激進的黨外雜誌，則試圖扮演著「中間派」、「第三勢力」的角色，主張體制內的溫和漸進改革手段。

回顧戰後台灣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所謂「自由派」中間份子雖努力高喊超然、中立的呼聲，但他們實際上所發生的影響力，卻常常在對立兩極的政黨利益衝突下被掩蓋了，從早年的國共鬥爭，到今日的藍綠對立可見一斑。我認為想成為一個「中間份子」，應該曾經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不過在現實政治上，處於中間地帶的人民雖然是多數，但由於成員複雜且鬆散，缺乏嚴密的組織運作，也就難以在兩極對立之中，站穩自己「中庸之道」、「中間路線」的腳步，而這情形遇到內憂外患的危難之際則會更加明顯。

2004 年 3 月份，筆者在趕工碩士論文初稿時，正當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地展開並進入短兵相接、白熱化的最後關頭。今年三月份對台灣社會大眾而言，應該算是過得蠻煎熬的一個月，相信許多人的心情隨著總統選舉的詭譎風雲載浮載沉。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有五組總統候選人競選，由於政治立場和訴求差異頗大，而有出現所謂「新中間路線」主張，希望得到「中間選民」的認同。到了 2004 年，只有兩組候選人參選，氣氛變得格外兩極化，使得人民的政治傾向被硬生生地撕裂成「非藍即綠」。縱使有人出來說他自己是「中間派」的話，便會被藍綠兩邊陣營嚴格的檢驗，判定他到底比較偏向哪一邊，於是有意或無意間，他也被歸類到某一派的支持者，接著他就失去中間派的立場了！

容忍異己是自由主義的重要基礎，伏爾泰曾說：「我不贊同你所言，但我誓死維護你說話的權利」，這便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精神表現；而胡適亦指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然而，在台灣政治競爭過程中，不論是候選人或是其支持者，對待競爭者多有互相攻訐。因此如何包容異己、用平常心做公開、公平的競爭，是台灣政治發展所面臨的關鍵問題。筆者衷心期望台灣社會能早日走出藍綠對抗的緊張局面，回歸理性平靜的生活，能讓中間選民的心聲和訴求得到更多的伸張；而所謂「中間派」、「第三勢力」可再次重整旗鼓，試圖在兩極的對立矛盾中，走出另外一條康莊大道。

## 摘 要

本論文主要在研究《中國論壇》半月刊與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關係，而論述核心有兩大面向：藉由縱向跨時代的垂直比較，說明該雜誌在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脈絡中的傳承角色；透過橫向同時代的平行比較，探討其自由民主言論與時代的互動關係。

### 一、思想脈絡：《中國論壇》與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傳承

在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程裡，主要是以政論雜誌來扮演啓蒙批判的角色。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政治論述先後刊載於《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在這些刊物停刊後，從《大學雜誌》分化出來的各股勢力中，比較信奉自由主義理念的人物則轉進到《中國論壇》。由《聯合報》資助的《中國論壇》，成為知識份子抒發言論新園地。《中國論壇》的經營特色，有別於早年《自由中國》、《文星》和《大學雜誌》純知識份子的「文人辦報」，而首次嘗試與「報團」合作的發展模式。《中國論壇》是由一群富有時代關懷與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所催生的，包括：胡佛、李鴻禧、張忠棟、韋政通、楊國樞和黃光國等人，在當時台灣思想輿論界扮演著重要角色。直到 1990 年《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分裂前後，其中多數成員則加入「澄社」這個純知識份子的論政社團，於是結束一段知識份子與傳播媒體的分合史。

### 二、實踐面向：《中國論壇》對台灣自由民主的時代關懷

《中國論壇》1975 年在戒嚴和動員戡亂時期創刊，歷經 1979 年美麗島事件，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87 年解嚴，1991 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與國會全面改選，直到 1992 年停刊，總共發行十七年時間。《中國論壇》面對威權統治的客觀環境，致力於鼓吹自由民主、憲政改革，對戒嚴、報禁和黨禁解除，政黨政治推動，動員戡亂時期停止，以及國會全面改選，發揮思想啓蒙與社會力量興起的激發作用。這十七年橫跨台灣政治由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治的重要階段，而《中國論壇》作為一份對時代變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論刊物，替這一大時代歷史作了見證。《中國論壇》的政治立場是屬於「中間派」，且具國民黨的改革色彩，主張溫和漸進的體制內改革。《中國論壇》之所以從未間斷地持續發行了十七年，在於《中國論壇》的文章形式與風格，注重學術架構，文筆也較學術性的，沒有那麼激進、尖銳，因此比同時代大多數的政論雜誌（尤其是黨外雜誌）走了更長的道路。

## 關鍵詞

中國論壇、自由民主、自由主義、人權、  
言論自由、國會改選、政黨政治、黨外雜誌

# 目次

<b>第一章 緒論</b>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9
第四節 研究架構 .....	13
<b>第二章 《中國論壇》的發展始末</b> .....	14
第一節 《中國論壇》發行時代背景.....	14
一、1970年代的時代背景.....	14
二、1980年代的時代背景.....	21
第二節 《中國論壇》刊行始末.....	17
一、《中國論壇》的創刊 .....	24
二、編輯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	27
三、編輯委員會的分裂與停刊.....	30
第三節 《中國論壇》議題取向與筆陣分析.....	33
一、專題座談會與大型研討會.....	33
二、讀者群與銷售量分析.....	36
三、議題取向與主要作者群.....	37
<b>第三章 《中國論壇》自由主義的傳承</b> .....	43
第一節 歐美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	43
一、歐美自由主義思想的脈絡.....	43
二、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45
第二節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發展回顧.....	49
一、1950年代《自由中國》的自由民主訴求.....	50
二、1960年代《文星》與1970年代初期《大學雜誌》.....	53

三、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的《中國論壇》.....	56
四、1990 年代以後的「澄社」.....	57
第三節    《中國論壇》政論主題與言論分期.....	59
一、第一階段（1975-1986 年）：選舉制度與地方自治.....	60
二、第二階段（1986-1990 年）：政黨政治和認同問題.....	61
<b>第四章    《中國論壇》的時代關懷：攸關「自由民主」</b>	
<b>言論分析.....</b>	<b>67</b>
第一節    《中國論壇》在同時期政論雜誌的定位.....	67
一、1980 年代政論雜誌類型.....	67
二、黨外雜誌派別與發展概況.....	77
第二節    政治自由主張：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	90
一、戒嚴與人權保障.....	90
二、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	98
第三節    民主理念內涵：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	115
一、國會改選問題.....	115
二、政黨政治發展.....	130
<b>第五章    結論 .....</b>	<b>155</b>
第一節    《中國論壇》的時代意義.....	155
一、思想脈絡：《中國論壇》與戰後台灣自由主義傳承.....	155
二、實踐面向：《中國論壇》對自由民主的時代關懷.....	160
第二節    《中國論壇》局限與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環境.....	164
一、《中國論壇》的局限.....	164
二、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環境.....	169
<b>參考書目.....</b>	<b>173</b>

# 表目錄

表 2-1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委員學術領域表.....	28
表 2-2	《中國論壇》各類文章篇數一覽表.....	37
表 2-3	《中國論壇》主要作者政論文章統計表.....	40
表 3-1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刊物或團體傳承表.....	50
表 3-2	《大學雜誌》集團的分化譜系.....	56
表 3-3	《中國論壇》有關「泛論國是」的卷期主題.....	59
表 3-4	1975-1986 年《中國論壇》政論主題表.....	60
表 3-5	1986-1990 年《中國論壇》政論主題表.....	62
表 4-1	1980 年代政論雜誌類型表.....	70
表 4-2	《黃河》、《中國論壇》與《八十年代》政治偏向比較表.....	73
表 4-3	1980 年代政論雜誌言論取向比較表 .....	77
表 4-4	黨外雜誌五大派系發行時間表.....	82
表 4-5	《中國論壇》有關「言論自由」文章篇目表 .....	113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歷程，可說是十分的曲折迂迴。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台灣實施高壓統治與殖民經濟，壟斷台灣政治和經濟利益，而刺激知識份子萌發本土意識；且在接受已經西化的日本教育下，台灣的知識份子多少吸收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不過，由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台灣知識份子實難有所伸展。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灣人民殷切期盼回歸祖國後，便可重獲自由，無須再受到次等國民的歧視待遇。然而，由於兩岸因長期隔閡，產生認知差異，造成國民政府施政未如台灣人民所預期，乃至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悲劇，烙下歷史的傷口，令台灣人民對政治幾乎絕口不提，聞政治而色變。

1949年政府遷台，在面臨中共攻台的戰爭威脅下，台灣做為國民黨政府有效控制的最後一個據點，勢必以維繫政權為首要。1948年5月10日公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以非常時期的措施達到動員戡亂目的。1949年5月20日實施「戒嚴」，剝奪言論、思想、出版、結社、遷徙等自由。國府陸續頒布許多相關法令，賦予警備總部超越憲法的權力，濫用軍事審判，管制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結社、行動、通訊等自由。台灣社會瀰漫在肅殺氣氛之中，基本自由處處備受箝制，不能享有自由空間。<sup>1</sup>戰後台灣徒有實行憲政法治之名，卻在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之下，處處充滿政治干預，而「戒嚴法」從此被外界視為獨裁政治壓迫

---

<sup>1</sup> 張炎憲，〈緒論：台灣民主運動的特色〉，收錄於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縣：國史館，2000)，頁III-IV。

的象徵，令台灣籠罩在戒嚴的陰影之下長達三十八年（1949-1987年）。<sup>2</sup>

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積極想在台灣推展自由主義，建設台灣為一「自由中國」。胡適與雷震從中國大陸帶來自由主義的火種，配合著反共救國口號，1949年在國民黨默許下成立《自由中國》雜誌社。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種種敗相，令美國失望而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放棄國民黨。因此，蔣介石欲藉《自由中國》宣傳自由民主理念，以爭取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然而，當1950年韓戰爆發，國民政府受到美國支援，轉危為安，國際關係好轉，不太需要《自由中國》為它宣傳，於是對雜誌的支援大不如從前。日後《自由中國》碰觸到民主憲政議題，反對蔣介石三連任，與執政當局正面衝突，最後因計畫組黨而遭壓制瓦解。

不過，自由主義的根苗並未就此斷絕，仍逐漸生根蔓延。在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結束後，到了1960年代則出現《文星》，之後1970年代初期有《大學雜誌》，先後延續著文人以自由主義論政的傳統。自1973年之後，《大學雜誌》歷經多次分裂改組，已不復當年風光，而其中比較信奉自由主義理念的人物，則轉進到《中國論壇》。《中國論壇》成為自由派學者集結的大本營，續擔任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傳媒。<sup>3</sup>《中國論壇》半月刊創刊於1975年10月10日，至1990年10月10日改版為月刊，恰滿十五年。《中國論壇》是由一群富有時代關懷與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所催生的，包括：胡佛、李鴻禧、張忠棟、韋政通、楊國樞和黃光國等人，在當時台灣思想輿論界扮演重要角色；其言論立場帶有自由主義色彩，致力於倡導民主憲政。《中國論壇》發行人楊選堂如此說到：

《中國論壇》是怎樣的一份刊物呢？它的言論立場是怎樣的呢？如果要為《中國論壇》定位，大體的說，可以說《中國論壇》是一份

---

<sup>2</sup> 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138-139。

<sup>3</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20-21、298。

自由主義的刊物，是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的一種「書生報國」表達方式，它的言論立場，就是知識分子為民主憲政而倡導、而批判的立場。<sup>4</sup>

1970 年代的開啓，在國家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形成一個具有關鍵性的轉型期。1970 年代正值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變化的艱困考驗，國際外交橫逆接踵而來。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 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在北京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中日斷交，1975 年蔣介石逝世等國際外交橫逆接踵而來。至於經濟方面，1973 年 10 月由於中東戰爭所掀起的石油飛漲危機，導致全球性油價攀升與油源恐慌，造成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稱為「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5 年)。因為台灣的原油幾乎全部依賴進口，且經濟型態以外貿為導向，使得出口受挫，經濟成長陷入停頓。在 1973 年 12 月展開的「十大建設」計劃，便是政府為了挽救經濟危機，期冀以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帶動經濟景氣的復甦。<sup>5</sup>十大建設解決了重大基本建設不足的瓶頸，提高經濟活動效率。以對外貿易為主導的經濟發展，促使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不斷成長。不過，國家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亦伴隨著產生許多問題的產生，諸如：現代化的需求與傳統觀念、價值及制度之間的矛盾；民智開通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提出擴大政治參與的訴求；以及經濟發展向高級工業轉型所面臨的各項瓶頸等等。於是 1970 年代台灣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逐漸累積成社會大眾求新求變的苦悶。<sup>6</sup>

《中國論壇》半月刊在 1970 年代國內外的澎湃情勢中創刊，其目的在

---

<sup>4</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 (1992.10)，頁 6。

<sup>5</sup> 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1)，頁 278-279。

<sup>6</sup> 楊選堂，〈心憂天下、手援天下——《中國論壇》半月刊創刊十週年叢書總序〉，收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頁 1-2。

於結合海內外知識份子的力量，發揚時代關懷與參與回饋的熱誠，以理性的研判，明察事理，建立共識形成中流砥柱，激發社會進步。《中國論壇》半月刊以結合海內外知識份子，發揮知識份子推動時代力量為己任，召集相當多著名專家學者撰述，或參與專題座談或組織重大課題研討會。直到1990年11月，因為編輯委員會產生分裂，學者群分道揚鑣，而《中國論壇》半月刊改為「月刊版」續發，但風格丕變。之後，《中國論壇》月刊勉強撐了二年，終究還是在1992年10月停刊，正式走入歷史的洪流。

本論文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中國論壇》半月刊言論內容，來探討1970到1980年代台灣自由派學者對於各項政治議題的具體看法為何，尤其是有關於「自由民主」理念在現實政治中的實踐問題。《中國論壇》半月刊與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傳承關係如何？此外，作為一份持續長達十五年的政論雜誌，何以《中國論壇》半月刊能夠長期屹立於台灣的言論界，而沒有像大多數「黨外」<sup>7</sup>政論雜誌受到官方的處分或禁制？《中國論壇》半月刊在同時期政論雜誌中的定位如何？因此，筆者期盼藉由本論文之研究，能夠對《中國論壇》半月刊這一份帶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政論雜誌，呈現其精神與特質，以及在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目前關於《中國論壇》半月刊的研究，在學位論文方面，最早有洪春柳的〈中美斷交後國內政論內容分析：「黃河」、「中國論壇」、「八十年代」

---

<sup>7</sup> 「黨外」一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一個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而少用「黨外」一詞。自黃信介、康寧祥崛起後，「黨外」一詞大量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份子所共同使用的標誌。在這個界定含糊、定義籠統卻又簡短的號誌下，一些政治異議份子經由數次的選舉而逐漸凝結成一般在野的政治運動。請參見李筱峰，〈知識分子與政治革新運動〉，《中國論壇》23:1=265 (1986.10)，頁74。

分析比較），而該論文在時間方面，以中美斷交後三年的時間為限，即自1979年1月至1981年12月止；至於樣本方面，則以黨派色彩為標準，盡量挑出可代表不同黨派的政論雜誌來比較；黨派色彩是政論雜誌的特色，該論文則以黨派色彩來分為國民黨、自由主義和黨外三大部分。當時台灣政治環境以中國國民黨為一黨獨大，因此大家習稱中國國民黨以外的份子為「黨外」；此外，有一批不特別標明黨派色彩，而以自由、民主為信仰的知識份子，可稱之為「自由主義」。該論文斟酌實情，取《黃河》雜誌來代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以《中國論壇》代表自由主義，另以《八十年代》代表黨外。最後其研究結果得出：《黃河》雜誌強調中國認同與維持現狀，《中國論壇》較著重基本人權與政治制度化，而《八十年代》則重視制衡規範的建立與主張台灣認同。<sup>8</sup>洪春柳的論文主要是透過量化分析方法，來綜合比較所取樣的《黃河》、《中國論壇》和《八十年代》，藉以釐清國民黨、自由主義和黨外這三種不同政治立場的差異。由於該論文所要處理的雜誌文章內容相當多，因此僅進行篇目的統計與分析而已，難以針對文章的細部內容作進一步的呈現與探討。

陳重生的〈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sup>9</sup>指出，《中國論壇》有別於早年《自由中國》、《文星》和《大學雜誌》純知識份子的「文人辦報」，可說是首次由「報團」（聯合報系）結合一群知識份子進行論政的方式。該文旨在分析其半月刊時代（1975-1990）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進而對該刊與主導其內容的學者們作一歷史定位。論文第一章介紹《中國論壇》創刊背景、組織運作和內容流變。第二至六章就外交、反對勢力、國民黨威權體制、憲政改革、兩岸關係等問題，逐一分析

---

<sup>8</sup> 洪春柳，〈中美斷交後國內政論內容分析：「黃河」、「中國論壇」、「八十年代」分析比較〉，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1983。

<sup>9</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中國論壇》暨撰稿人的建言和立場。在第七章結論與評估中，作者嘗試建構一個台灣政治發展的動態模式，以檢視《中國論壇》十五年來的政論概況，將之分為初期的「歌功頌德」(1975-1981)、李鴻禧接任編輯委員會召集人的「回歸憲法」(1981-1986)、以及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的「民主優先於統獨」(1986-1990)三個時期，並對「中國論壇派」的崛起和沒落進行評估。由於陳重生這篇論文偏重在《中國論壇》對現實政治發展的政論分析，因此並未就《中國論壇》有關自由民主的理念與言論多作探究。

蔡智賢的〈《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sup>10</sup>，分析整個自由民主之知識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形成過程，以及五〇年代以後台灣知識份子透過雜誌媒體來進行論述的集結，而形成強調自由民主的主張，作為理解《中國論壇》形成之前的整個主張自由民主的知識理念發展狀態。接著論述七、八〇年代台灣社會正值民主轉型與多元發展重要階段中，強調憲政主義式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之知識論述與集結的社會實踐過程。最後探討進入八〇年代末期，台灣社會產生劇烈民主轉型與多元化發展階段，社會各層面所受到的衝擊，以及這些衝擊如何影響到知識份子處境與《中國論壇》經營。進一步理解知識份子如何在這股民主轉型中尋找實踐路線與自我定位，以及造成《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結束的直接原因。蔡智賢這篇論文主要在檢視知識份子如何在變動的社會情境中，如何透過其知識論述來與社會進行互動。由於該文僅大致談到《中國論壇》半月刊具自由派知識份子論政的風格，故此問題的研究尚有發展空間。

在專書方面，李筱峰的《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對戰後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的民主運動，分成四個階段來敘述：一是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改革訴求；二是1950年代初期的《自由中國》雜誌論政集團，及其在1950年代末期與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結合，所醞釀出的「中國民主黨」建黨

---

<sup>10</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運動；三是 1960 年代初期的《文星》雜誌的思想啓蒙，以及 1970 年代初期在臺灣外交挫敗中，《大學雜誌》知識份子所掀起的政治改革運動；四是 1970 年代初期開始成長的黨外運動，以至於民主進步黨的建黨。<sup>11</sup> 本書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發展歷程有清楚的脈絡分析，不過，關於 1970 年代中期之後的論述，集中在以黨外運動言論為主軸，對於同時代的其他宣揚民主的雜誌則略而未談，亦包括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中國論壇》半月刊。

王杏慶的〈《大學雜誌》與現代台灣——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知識分子改革運動〉<sup>12</sup>，指出《大學雜誌》在 1968 年創刊後的前三年，屬於校園文化的純知識份子型刊物，為非政治化的草創期；而在 1971 年改組並政治化。不過，自 1973 年起，《大學雜誌》集團開始發生內部分裂，分裂原因與過程頗為複雜，大體上由於「土」、「洋」知識份子意見和態度有別，再加上《大學雜誌》鼓起學生運動並介入選舉，使國民黨撤回對它的支援。自 1973 年之後《大學雜誌》歷經多次分裂改組，已經不復當年風光。由《大學雜誌》集團出走的知識份子，除了若干向國民黨靠攏並受重用者之外，其他不被國民黨當局吸收或拒絕當官的知識份子，分化為幾股不同力量，四散到其他領域傳播各自理念，包括：《人與社會》、《夏潮》、《台灣政論》、《中國論壇》、《思與言》等等，其政治理念亦呈現由左到右、由統到獨的歧異，例如：較具中國意識、左派訴求者轉移到《夏潮》；台灣本土意識較強、走選舉實踐路線者到《台灣政論》延續其理念；至於比較信奉自由主義理念、學院溫和改革派的人物則到《中國論壇》。王杏慶這篇文章對《大學雜誌》集團分化譜系有清晰脈絡，而進一步探討可參考他的〈中

<sup>11</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頁 269。

<sup>12</sup> 王杏慶，〈《大學雜誌》與現代台灣——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知識分子改革運動〉，收錄於澄社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 386-387。

國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sup>13</sup>。

江宜樺的《自由民主的理路》<sup>14</sup>從政治思想的角度切入，分析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淵源、發展與困境，並在此一基礎上，檢討五十年來台灣自由主義思想與民主意識的變遷。作者認為自由民主體制是一個值得不斷詮釋、反省、改進的社會制度。雖然此書僅簡介《中國論壇》而已，但由於此書著重在對西方自由主義理論流派進行闡述，而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與民主意識變遷亦有提綱挈領的介紹，所以為想要瞭解台灣自由民主理念發展脈絡的研究者提供不少思考的啟發。在期刊論文方面，曾華璧的〈一九七〇年代「中國論壇」有關環境主題論述之歷史意義〉<sup>15</sup>、〈1980年代「中國論壇」環境主題之論述及其與環境主義關係之研究〉<sup>16</sup>兩篇文章，涉及1970、1980年代《中國論壇》編委會成員的「環境主題論述」，雖然與本論文的研究旨趣頗有差距，但亦提供問題研究的範例。

回顧過去研究成果之後，筆者發現尚未有將《中國論壇》半月刊「自由民主」言論作一完整的分析專題研究；而《中國論壇》在1980年代的政論雜誌中所扮演的定位與角色，以及和當時風起雲湧的黨外雜誌之間的比較，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本文將參考現有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包括：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從日據時期到民國81年〉、<sup>17</sup>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

---

<sup>13</sup> 南方朔(王杏慶)，〈中國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收錄於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台北：四季出版社，1979)，頁1-63。

<sup>14</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sup>15</sup> 曾華璧，〈一九七〇年代「中國論壇」有關環境主題論述之歷史意義〉，《思與言》33:4(1995.12)，頁1-28。

<sup>16</sup> 曾華璧，〈1980年代「中國論壇」環境主題之論述及其與環境主義關係之研究〉，《思與言》34:1(1996.03)，頁207-262。

<sup>17</sup> 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從日據時期到民國81年〉，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1992。

角色功能之研究〉、<sup>18</sup>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sup>19</sup>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sup>20</sup>等。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自由主義是半世紀來台灣知識分子的珍貴思想資產，雖然它基本上是個舶來品，卻與知識分子有著微妙的親近性。近百年來，不斷以道德力量喚醒民眾、抨擊當道者，若非宿儒耆德，便是接受自由主義洗禮的知識分子。以戰後台灣知識分子與執政當局的互動來看，從1949年《自由中國》創刊以迄1997年學術界對朝野兩大黨修憲的反彈，自由主義始終是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它並不能主導政局，卻是評斷政治實踐正當與否的道德力量。因此，研究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承與變遷，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灣政治發展的得失與成敗。

然而，就方法上而言，除非我們先界定「自由主義」的意義，否則無從判斷台灣究竟有無自由主義，或辨識台灣自由主義運動的軌跡。知識分子「獨立判斷」、「抗拒專制」、「改造社會」等性格，固然與自由主義的外在氣質相通，但這些特質只是泛泛的描述，稱不上自由主義的核心意義。否則任何一個勇於批判現狀的異議人士都可算是自由主義者，而符合這個條件的人也將遍佈古今中外。談到自由主義，必須先對它做一個簡單的界定；它不僅是一個思想，一種意識型態，也是行動和制度安排。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曾經歷多次變遷。從十七世紀英國洛克開始提倡，直至十九世紀的三〇、四〇年代，“liberal”或是“liberalism”才變成今日

---

<sup>18</sup> 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sup>19</sup> 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sup>20</sup>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英文的字眼成爲大家所認同的現代性政治理念。然而，許多自由主義代表性人物彼此之間，也多有意見分歧，像 John Stuart Mill 的政治理念比較傾向於社會主義，而與亞當史密斯私有財產、自由競爭等主張大異其趣。

不過，自由主義內容雖非定於一尊，卻也有一般認可的標準，大致而言有四：一是政治性的：必須強調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二是經濟性的：此項緣起最早可追溯到洛克。他強調私有財產觀念，並以私有財產和私有市場經濟爲基礎，設計出政治模型。此一體制肯定市場競爭，縮減國家干預；三是社會性的：十九世紀以後，自由主義亦關注社會問題，注意到社會正義，特別是弱勢族群生存問題，像 John Stuart Mill 思想中就有很明顯的社會主義色彩；四是哲學上與思想上的自由主義，肯定個人主義（以個人爲出發點來構織整個政治社會理論）、思想自由、強調容忍異己等。<sup>21</sup>

如果我們接受西方學界對自由主義的主要界說，則這種意識形態大體上萌芽於 17 世紀英國的憲政革命，發展於 18 世紀的啓蒙運動，而茁壯於 19 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基本特性有四：(一)個人主義，(二)平等主義，(三)普遍主義，(四)改良主義，而具體主張則包括：提倡宗教寬容、維護思想言論自由、堅持法律程序正義、主張政府分權制衡、肯定私有財產、尊重市場機能等。江宜樺曾將自由主義的重要主張整理成一個理念體系，包含六項基本原則，可以做爲討論台灣自由主義運動的起點：<sup>22</sup>

(一) 個人權利：自由主義明確主張人人擁有若干基本的自由權利——人身自由、行動遷徙自由、思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政治參與自由、以及在法律保障範圍內選擇自己所愛、實現自己人生計劃的自由。

(二) 多元寬容：自由主義所預設的社會是一種多元開放的社會。對於多元社會裡的人際關係，自由主義主張只要一個人的自由不妨礙其他人

---

<sup>21</sup> 黃克武，〈自由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國史館館刊》30（2001.6），頁 5-6。

享有同樣的自由，他的思想言行就應該得到尊重。換言之，社會對於標新立異、不同於主流價值的種種異常言行應當寬容；除非這些言行對他人造成傷害，否則社會不能以多數的壓力禁止之或譴責之。

（三）立憲政府：自由主義傾向於把政府當成必要之惡，它是人們為確保自由與福祉，經由投票表達同意而成立的權威性組織。為防止這大權在握的政治組織變質為難以駕馭的怪獸，須以種種方法減少其濫權機會。方法之一是以憲法為根本規範，將種種自由列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即法律主治傳統的確立；方法之二是分散權力的執掌單位，避免政治權力的專擅，即分權制衡的設計。

（四）國家中立：自從宗教戰爭以後，西方人從歷史經驗中覺悟到政教必須分離，亦即政府不能干涉教會內部或教派與教派之間的衝突，而教會也不能染指世俗事務或利用政府權力打擊異端。這個原則後來進一步世俗化，並擴大其運用範圍，結果發展成國家不得成為任何特定族群、宗教、階級、黨派等所壟斷之統治工具，而我們一般稱此為國家中立原則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五）私有財產：自由主義者認為保有私產是人類自利天性的反映，而財產私有比較能夠鼓勵人們勤奮工作，增進社會繁榮。對許多自由主義者而言，私有財產具有與生命、自由同等崇高的神聖性。「私產神聖」觀念落實在：1、未經人民代表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徵稅或將私產充公；2、私人財產可自由買賣、利用、遺贈，而繼承人應該擁有繼承權。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要求國家保障人民私有財產，不得任意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或採嚴格的配給制度。

（六）市場經濟：這個原則要求以自由開放競爭的方式，由買賣雙方決定商品的價格與市場供虛的平衡。自由主義的市場原反對不必要的政府

---

<sup>22</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285-289。

干涉、管制，並相信無形的力量自然會導致最佳的資源配置狀況。由於市場經濟代表的是「競爭、效率、均衡」，因此許多自由主義者相信不只商品買賣可以透過市場機制加以調節，就是人才甄用或教育資源分配也應該採取自由競爭之方式。

這六項基本原則所構成的信念體系乃是一種「理念型」(ideal type)，作用在幫助我們辨識或比較實際社會中某種現象的明顯程度。其目的並非依據此一理念型標準，判定某人是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提供一個具有歷史根據的觀念架構，藉以衡量某人某事符合自由主義典型的程度。由於本論文在研究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因此根據「前四項」理念型的定義原旨與可能變化，分析半世紀來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呈現方式。

在定義界定上，本研究所謂的自由主義，乃屬於「政治自由主義」，並著重在其理念在現實政治環境如何落實的問題，以及與時代的互動情形；至於有關思想史與理論定義方面的討論，僅進行源流發展的基本概述。論文題目中所指的「自由民主」一詞，包括「政治自由主張」與「民主理念內涵」兩個概念。本論文擬以一般「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以及「民主」的基本理念，作為討論《中國論壇》半月刊的重要參考。在研究《中國論壇》半月刊的「政治自由主張」時，將以「戒嚴與人權保障」與「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兩項主題來觀察；至於「民主理念內涵」方面，則以「國會改選問題」和「政黨政治發展」兩項議題來檢視。

在史料運用方面，除了十五年的《中國論壇》半月刊和兩年的月刊之外，為了求探究《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中「核心撰稿人」的自由民主言論，還必須旁及該社所編輯的成「中國論壇叢書」，包括：大型研討會的論文集（如《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和《女性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等），以及將《中國論壇》各期文章精選出來集結成冊（如《成長的民主》、《現代化與民族主義》、《挑戰的時代》、《思潮的脈動》、《面對未來的沉思》和《楊子論衡》等），如此方能勾勒出他們

思想的全貌。此外，本研究亦參考國史館出版的《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冊，包括：從戒嚴到解嚴、組黨運動、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國會改造、地方自治與選舉、國會改造，對於研究戰後台灣民主運動提供莫大的裨益。而且，筆者參酌當時發表於其他報章雜誌，如《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立晚報》，以及《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等政論雜誌相關文章，以逼近《中國論壇》半月刊所處的時代氣氛。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除了利用歷史學研究法之外，因牽涉傳播資料的研究，還採用新聞學常用的「內容分析法」。本論文借重內容分析法中的類目分析與統計法兩種，用在從事文章的類目建構、篇數統計、作者排名等。在《中國論壇》半月刊政論文章的主要作者名單中，以楊選堂、李鴻禧、林嘉誠、<sup>23</sup>蕭新煌、黃光國、胡佛、韋政通、張忠棟、楊國樞等人最具重要性和代表性，且幾乎全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成員。這些人可以說是《中國論壇》半月刊的「核心撰稿人」，而他們的文章便成為本論文問題研究的取樣對象。筆者將針對《中國論壇》半月刊有關自由民主的文章，歸納成若干主題和類目，然後進行量化分析與質性研究。藉著結合歷史學與新聞學的研究方法，可將該雜誌諸課題之主旨充分呈現，並與時代背景的史實相呼應，以凸顯《中國論壇》半月刊的內涵、風格與歷史地位。

####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敘述本文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研究回顧、研究方法與範圍，以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中國論壇》發展始末」，第一節說明《中國論壇》發行期間

---

<sup>23</sup> 林嘉誠雖非《中國論壇》編委會成員，但自其博士班研究生開始，即勤於撰文發表於該刊，加上他拿的是法政學位，故能暢談憲政改革問題，且十五年下來所累積的篇數相當可觀。參見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 242。

的時代背景；第二節針對《中國論壇》從創刊到停刊的經營發展始末作一概述，並比較先後四任召集人的特色；第三節呈現《中國論壇》議題取向與筆陣分析，以及讀者群與銷售情形。

第三章「《中國論壇》自由主義傳承與主張」，第一節介紹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承，包括歐美自由主義思想的流變、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情形。第二節回顧自由主義理念在台灣延續與發展概況。第三節就《中國論壇》對現實政治的觀察與言論分期進行分析。

第四章「《中國論壇》的時代關懷：攸關『自由民主』言論分析」，第一節探討《中國論壇》在同時期政論雜誌中的定位與角色。第二節說明《中國論壇》的政治自由主張，包括人權保障態度與言論自由提升。第三節分析《中國論壇》的民主理念內涵，以選舉制度改革與政黨政治發展為例。

第五章「結論」，第一節總結《中國論壇》半月刊在台灣自由民主的時代意義，予以適切的歷史評價。第二節討論《中國論壇》半月刊的局限，最後針對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環境，進行一番回顧與展望。

綜言之，本論文將針對《中國論壇》半月刊與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關係作一番研究，而論述核心有兩大面向：首先，藉由縱面向的跨時代垂直比較，說明《中國論壇》半月刊在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脈絡中的傳承角色；接著，再透過橫面向的同時代平行比較，將《中國論壇》半月刊放在同時期政論雜誌中來觀察，探討其自由民主主張的具體實踐情形，以及與時代的互動關係。尤其，從 1975 年《台灣政論》的出現以來，黨外政論雜誌便在政府嚴厲查禁中前仆後繼，而針對《中國論壇》半月刊代表自由主義式論政傳統，來相較於黨外運動路線的雜誌政論風格，比對彼此間特色、差異，當能顯現這份政論刊物的歷史地位，以及環繞該刊物為核心的一群知識份子的角色，並對認識那一時代富有積極意義。

## 第二章 《中國論壇》發展始末

### 第一節 《中國論壇》發行時代背景

#### 一、1970 年代的時代背景

##### (一) 外交受挫與重大經濟建設

時序進入 197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變化的艱困考驗，國際外交橫逆接踵而來。1971 年，美國企圖拉攏中共以制蘇俄，動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4 月，發生保衛釣魚台主權運動。10 月，聯合國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承認其為「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中華民國則宣佈退出聯合國。1972 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9 月，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失去聯合國席次的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所遭遇的困境隨之而來，各主要國家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其建交。<sup>24</sup>

1973 年 10 月，中東戰爭所掀起的石油飛漲危機，導致全球性油價攀升與油源恐慌，造成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稱為「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5)。由於台灣的原油幾乎全依賴進口，且經濟型態又是以外貿為導向，結果造成台灣出口貿易受挫，經濟成長陷入停頓。同年 12 月展開的「十大建設」計劃，便是政府為了挽救經濟危機，期冀以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帶動經濟景氣的復甦。在此國家對外關係受挫，以及經濟發展停滯之際，當時擔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遂針對國內的工業與農業發展情況與需要，興辦十項工程建設，且加強農村建設。<sup>25</sup>

<sup>24</sup>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1999)，頁 231-232。

<sup>25</sup> 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1)，頁 278-279。

如此作法，一方面藉以轉移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抗爭情緒，另一方面，國民政府開始將全部心思放在台灣的經營上，而「反攻大陸、反共復國」也就成為形式化口號。1975年，總統蔣介石逝世，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而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主席。1978年，國民大會選舉蔣經國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謝東閔為副總統，於是蔣經國順利地延續蔣家政權。1979年1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不過美國國會特別通過「台灣關係法」與台灣保持文化、經濟的實質關係。<sup>26</sup>

1979年，十大建設順利完成，接著進行十二項和十四項（1984年）重要建設，促進經濟持續成長，國民就業機會增加。1970年代在國家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可說是一個關鍵性的轉型期。從1968年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國民的知識水準獲得普遍提昇。<sup>27</sup>1973年政府推動十大建設，解決重大基本建設不足的瓶頸，提高經濟活動效率。台灣以對外貿易為主導的經濟發展，使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不斷成長。不過，國家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亦伴隨著許多問題的產生，諸如：現代化的需求與傳統觀念、價值及制度之間的矛盾；民智開通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提出擴大政治參與的訴求，以及經濟發展向高級工業轉型所面臨的各項瓶頸等等。於是1970年代台灣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逐漸累積成社會大眾求新求變的苦悶。<sup>28</sup>

這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總是忙於適應失去國際地位、失去邦交國家，尤其是美國支持立場丕變的新環境；雖然失去政權外部的合法性，但

---

<sup>26</sup> 吳密察監修，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頁184-189。

<sup>27</sup> 台灣戰後初期，國民義務教育年限原為六年，由於政府對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視，國民教育發展非常迅速，在1950年代中期，即產生國民小學畢業生升學初級中學的瓶頸現象。政府為消除此一現象，以滿足國民接受教育的願望，乃於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於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教育隨之步上新的紀元。請參見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頁295。

<sup>28</sup> 楊選堂，〈心憂天下、手援天下——《中國論壇》半月刊創刊十週年叢書總序〉，收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

是國民黨政府選擇並順利推行「台灣化」的政策，藉由局部的開放權力結構，將台灣的政治菁英、青年才俊吸納進體制之內，以增強國家內部合法性的方式來彌補所失去的外部合法性。國民黨政府透過擴大政治參與管道、台灣化政策、重大公共建設等，來緩和這段時期因外交困挫、石油危機所帶來的挑戰與衝擊，企圖穩固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社會的統治，目標便在維繫一個穩定而具支持力的社會。1960年代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本省政治菁英及中產階級，其中部分人被網羅到國民黨體系中，但也有不少的本省菁英成為策動反對國民黨政府，推動民主化的主力。不過，1950、1960年代國民黨政府以高壓威權體制所維持的穩定、無聲而沈寂的社會樣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黨外勢力與反對運動的出現，動搖了國民黨政府的威權。

## （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與本土反對力量興起

1948年元旦憲法正式生效後，同年由中國各地選出第一屆的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任期各為六年與三年，理應分別於1954年和1951年期滿，但中華民國政府在第一屆中央民代任期還沒屆滿時，即喪失中國大陸的領土，因此無法再按期從大陸地區進行改選。國民政府遷台後，以「維護法統」為名，由總統蔣介石根據憲法「臨時條款」所授與的權力，批准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待將來形式許可後再行改選。1954年更進一步由大法官會議作出決議，認為在「反攻大陸、收復失土」前，第一屆中央民代不必改選，因此宣佈在尚未選出第二屆中央民代之前，理應由第一屆中央民代繼續行使職權。<sup>29</sup>

當時的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且多為1948年剛開始行憲時，即由全國各地選出的。這三種由中國大陸選出

---

頁 1-2。

<sup>29</sup> 吳密察監修，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頁 196。

的民意代表，在「反攻大陸」希望越來越渺茫、遙遙無期之下，這些第一屆中央民代，竟行使職權達四十年以上，變成了終身職，而如此永遠不必全面改選的國會，便被譏為「萬年國會」。隨著第一屆中央民代年齡逐漸老化，自然死亡的人數越來越多，空出一些缺額，加上為因應情勢需要與來自民間的政治改革呼聲，因此 1960 年代末期開始，國民大會先後多次修訂臨時條款，授權總統訂頒辦法在台灣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於是有 1969 年的首次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其後均依法繼續舉辦增額選舉，希望資深的國代與立委能夠逐年陸續退職。不過，這些經過補選出來的國代和立委，每六年和三年都必須改選，而與終身職的老國代和老立委不同。<sup>30</sup>

此措施雖可為年事日高、逐漸凋零的「法統」注入若干新血，但因改選比例太小，又為國民黨一黨所壟斷，依舊未能解決國會代表性嚴重欠缺與議事功能衰退等問題。尤有甚者，1972 年資深國大代表濫用修憲職權來修訂條文，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二款，無限期延長自己的任期，而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任期再獲得保障，導致日後國會結構合理化的工作益形困難與複雜，更創下憲政史上的嚴重惡例。<sup>31</sup>雖然國會一直沒有進行全面改選，但是定期進行改選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卻提供台灣本土政治菁英透過選舉進入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的管道，形成本土反對力量崛起的契機。另一方面，中央民意代表機關則因具備民意基礎的新血加入，使其正當性多少獲得補強。<sup>32</sup>

由於台灣在戒嚴令下，國民黨政府實施黨禁而長期一黨執政，使憲法賦予人民的集會結社權利被凍結，國民黨以「反共宣傳費」扶助青年黨與民社黨成為親善的友黨，充當實行「政黨政治」的門面。所謂「政黨」必

---

<sup>30</sup> 鄭牧心（鄭粹），《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8），頁 110-124。

<sup>31</sup> 朱雲漢，〈國會結構，國會選舉與政黨政治〉，收錄於蕭全政主編，《改革憲政》（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頁 161-162。

<sup>32</sup>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頁 191。

須以爭取政權或維持政權為前提，但是青、民兩黨既沒有爭取執政的能耐，亦無監督執政黨的功能，實在不能算是「有效政黨」。異議人士組織反對黨的過程相當艱辛，從 1960 年「自由中國社」結合台籍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失敗以來，反對人士的組黨行動暫告沉寂，改以「黨外」之名與國民黨做區隔，而所謂「黨外」正是指國民黨之外。<sup>33</sup>

1970 年代的台灣，在執行戒嚴法的情況下沒有結社自由，反對運動因此沒有明確的組織，而這些人屬於非國民黨體系，則被稱為「黨外人士」。隨著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新興反對勢力鼓吹言論自由的聲浪再起，例如：《台灣政論》（1975.08-12）、《八十年代》（1979.06-12）和《美麗島》（1979.08-11）等雜誌，均為重要的言論場地。雖然政府一再查禁該類書刊，但仍無法壓制反對的聲浪。同時，反對勢力不斷要求開放黨禁。<sup>34</sup>1970 年代透過辦雜誌、參與中央增額與地方公職選舉，傳播政治改革的訴求，也觸動了台灣社會民眾的政治意識。

1977 年 11 月的五項地方選舉，讓國民黨遭遇到不小的選舉挫折，而黨外人士則頗有斬獲，贏得 4 席縣市長、21 席省議員等，形成了一個有規模的政治勢力。除了國民黨政府的選舉挫敗之外，還因為桃園縣長選舉的開票爭議，引發國內外各界的關注「中壢事件」。由於群眾抗議執政黨作票而包圍警察局的「中壢事件」，造成兩名青年人死亡，憤怒的群眾遂焚毀中壢警局和警車。這是國民黨政府遷台確立體制以來，首次出現對抗國家體制的群眾街頭事件，成為戰後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自此之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開始受到挑戰，社會控制也逐漸趨於鬆動。另一方面，經過 1977 年 11 月這次五項公職選舉之後，黨外運動不再是昔日那種異議份子的孤軍奮鬥，而逐漸形成一種「政團」的雛型，且開始稍微掌握到地方行政的影響力。霧峰的省議會開始熱鬧起來，成為新聞記者們「新聞眼」

<sup>33</sup>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65-266。

的焦點所在。三十年來的政治禁忌，被黨外議員尖銳的質詢層層突破。<sup>35</sup>

「中壢事件」使部分黨外運動者察覺到群眾力量的存在，認為民心可用，但也使有人意識到群眾行為所隱藏的內在危險性。因此，自 1975 年《台灣政論》開始起，由康寧祥和黃信介所連線形成的黨外運動領導主軸，經此事件後逐漸呈現鬆動的現象。兩人由於對黨外運動各自堅持不同作法，漸行漸遠。康寧祥主張以理性溫和問政的改革方式與國民黨溝通協調，而黃信介則主張直接以較激進的策略來反對國民黨不合理的措施，自然影響兩人先前奠定的合作基礎，亦使黨外路線出現派別。1979 年 5 月和 8 月，康寧祥和黃信介分別創辦《八十年代》和《美麗島》，代表溫和與激進兩種黨外路線的發聲。美麗島事件導致黃信介入獄，康寧祥則因倖免牢獄之災，並順勢掌握黨外勢力，成為黨外運動的主流；黃信介出獄後，則逐漸取代康寧祥的領導地位。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由密切到疏遠，同時可印證不同派別的黨外人士彼此間勢力消長的過程。<sup>36</sup>

「中壢事件」讓黨外人士發現結合群眾可以和國民黨對抗，因而獲得相當的鼓舞，接著打算藉由 1978 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進一步擴張政治版圖。黨外人士的言論尺度變得較過去激烈，且籌組團體的行動亦更為積極。在 1978 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前，黨外擴大組成全省巡迴助選團，於各地掀起聽講熱潮。不料正當選戰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12 月 16 日，美國總統卡特突然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消息傳來，朝野各界同感震驚。蔣經國總統隨即根據臨時條款的規定，動用「緊急處分權」，將該次的中央民代選舉延期舉行。

由於中美斷交的緣故，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突然被迫停辦，也使得政

---

<sup>34</sup>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63。

<sup>35</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頁 122-127。

<sup>36</sup> 蔡裕仁，〈黃信介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94-95。

治環境逐步形成一股緊繃的張力。失去選舉舞台的黨外人士，改以《美麗島》雜誌社做為集會的據點，繼續擴張政治發言權。<sup>37</sup>黨外人士於1978年年底選舉組成「全省黨外助選團」，接著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市發動大遊行，爆發轟動一時的「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有相當數量的反對派菁英被逮捕。1980年舉行的軍法審判，在國內外的關注之下，特殊地採取公開審判的方式。透過大眾媒體報導，美麗島事件涉案人士的政治主張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雖然不少涉案人士入獄服刑，但是黨外的組織化並未因此而停擺，隨著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團的加入，使台灣反對運動得以持續發展。<sup>38</sup>

## 二、1980年代的時代背景

### （一）反對黨成立與解嚴

在1980年年底恢復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黨外勢力重整旗鼓，獲得不錯的成績，尤其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代兄出征」者全部當選。1981年年底縣市長、省議員和北高兩市議員三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黨外人士亦大有斬獲。在連年告捷後，黨外開始認真討論組織政黨的問題。1984年5月11日，黨外公職人員成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黨外自此出現常設組織。1986年黨外人士突破黨禁，成立「民主進步黨」，而政府為避免政治衝突，並未依戒嚴法加以取締。<sup>39</sup>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宣告台灣地區「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與戒嚴有關的法令陸續廢止或修訂。戰後台灣的戒嚴法，從1949年到1987年，實行有三十八年之久，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遊行自由

<sup>37</sup>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頁191-192。

<sup>38</sup>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266。

<sup>39</sup>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266-267。

的基本人權，普遍受摧殘損害。宣佈解嚴可說是放鬆對台灣的全面控制，有助於加速民主現代化和政治革新之推展。民營的報紙開始改版與增加張數，有意辦報的社會人士也展開行動，此後台灣的平面媒體走向自由化與多元的時代。

## (二) 國會全面改選和動員戡亂體制結束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年李登輝、李元簇當選第八任正、副總統。1989年12月，舉行中央立法委員增額選舉，以及地方縣市長、省議員和北高兩市議員的選舉。由於立法委員任期為三年，其他地方公職人員任期均為四年，所以每十二年才會出現一次同時選舉的機會，因此這次是台灣政治史上傾力一搏的大選舉。此外，從解嚴開放黨禁後的首次選舉，以及戰後蔣家強人政權結束，由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繼承權力的觀點來看，都可說明這次選舉是相當重要的選舉。

雖然國民黨的得票率還是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是總得票率只有58%強，首次跌破六成的底限。相對地，民進黨卻有大幅成長。從縣市長來看，該黨加上無黨籍共獲得六縣一市的勝利，掌握台灣三分之一縣市的行政權。在立法院方面，則獲得二十一席次，取得提案權(二十名以上)。這次選舉有很強的政權信任投票性質，由此選舉結果得知，國民黨喪失台灣人民信任的程度可說是與日俱增。選民對於停滯不前的政治改革，以及遲遲不退的「萬年議員」表示不滿，催促國民黨支付「分期付款式民主化」的最後一筆尾款。<sup>40</sup>

民進黨成立後，繼續推動黨外時期所主張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而國民黨在蔣經國主導下，希望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的方式來解決國會問題，亦即透過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席次，以及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的

---

<sup>40</sup>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

方式來應對。1989年1月，政府通過〈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比照政務官給予資深代表十分優厚的退職金，並配合國民黨的大力遊說；不過，因為採取「自願退職」的辦法，以致於退職的中央民代人數仍相對的少，成效不彰。結果在1989年年底的大選中，國會改選問題成了國民黨遭到空前挫敗的重要原因。

在要求國會改革的壓力日增下，1990年5月1日，李登輝總統正式對外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以兩年為期修訂憲法。動員戡亂時期的結束，意味著中華民國在法律上，結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戰關係，亦使國會改革問題初露曙光。1990年6月，大法官會議針對資深中央民代任期作出釋憲案，認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應於1991年12月31日以前終止行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適時辦理全國性之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1991年4月，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議修憲，通過憲法增修條文。1991年12月舉行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以及1992年12月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總算完成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改革工程，正式宣告長達四十多年的「萬年國會」終結，回歸憲政常軌。<sup>41</sup>

1991年5月，立法院廢止〈懲治叛亂條例〉，接著1992年5月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使得言論、結社和叛國問題得到解決。在白色恐怖時期，所謂的叛亂案多屬於言論與結社層次，很少有以武力從事叛亂的層次，因此〈懲治叛亂條例〉的廢除，以及《刑法》一百條的修正，也可以視為言論自由箝制的終結。<sup>42</sup>

---

社，1996），頁235-236。

<sup>41</sup> 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編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0），頁270-271。

<sup>42</sup> 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編著，《中國現代史》，頁271-272。

## 第二節 《中國論壇》刊行始末

### 一、《中國論壇》的創刊

《中國論壇》於 1975 年 10 月 10 日創刊，到 1992 年 10 月 10 日停刊，經歷了十七年的時間；其中有十五年是以「半月刊」發行，而最後兩年是「月刊版」。1970 年代以來，台灣政治經濟環境起了重大變化，由經濟成長帶動民主潮流，激發起反對政治勢力的浪花，因此時代背景可說是正值發生地殼變動的前夕。戰後二十幾年，累積下來受教育的人增多，且其中從國外學成歸國的人也變多，加上經濟發展逐漸給人一種安定的印象，使整個社會的自由民主風氣越來越盛。因此，在這樣客觀的環境下，自然會孵化出一些民主情勢出來。

由於當時《自由中國》已經查禁了十幾年了，《文星》雜誌停刊，《大學雜誌》亦產生分裂，於是社會上缺乏批評政府、反對政府的言論，呈現一片沈寂。對於國民黨一黨獨大及其中心領導體制不能忍受的人，將他們對政局看法發表到黃信介、張俊宏和許信良主辦的《台灣政論》上。1975 年 8 月《台灣政論》一刊行，馬上造成轟動，賣了幾期後，銷路直升得很快，幾乎是洛陽紙貴。此刻，既然有台灣人在辦《台灣政論》這樣的雜誌，《聯合報》基於時代的脈動，覺得亦可辦一份雜誌，於是聚集另一批知識份子，創立《中國論壇》。<sup>43</sup>

從《大學雜誌》分裂出來的成員中，有一批人到《台灣政論》，另一批人到《中國論壇》，也有一些人向國民黨靠攏當官去了。在時間上，《台灣政論》與《中國論壇》成爲繼《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之後，較受注目的雜誌，在當時可謂各領風騷。《台灣政論》的特色是敢於向統治

---

<sup>43</sup> 曾惠敏訪問整理，〈三位召集人走過從前——李鴻禧教授談《中國論壇》〉，《中國論壇》31:1=361 (1990.10)，頁 33。

體制進行強烈的挑戰，但一般學者仍相當顧忌其身份沒有保障，尤其台大哲學系事件（1972年）才發生不久。很多想採較溫和批判方式的人，便在《中國論壇》以比較理性、學術的方式來論政，於是《中國論壇》聚集了一批自由主義者，自成一格。《中國論壇》成立後，另一大報也覺得有必要辦雜誌，但是聚集不來，這更使《聯合報》覺得《中國論壇》這一批人非積極籠絡不可。<sup>44</sup>

當年聯合報系願意出資延攬知識份子籌辦，曾使人揣測要與同年創辦的《台灣政論》互別苗頭，而《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也有此的想法，他說到：

國民黨為對抗《台灣政論》起見，命令《聯合報》總主筆楊選堂出版一本《中國論壇》，由《聯合報》印刷廠付印，……裡面均是一些歌功頌德而沒有批評國民黨施政的文字，各出售雜誌攤子上都擺在很明顯的地方。我曾問過書攤，每期銷售數如何，他說：幾乎沒有人來買。可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糟蹋紙張了，橫直《聯合報》賠得起。<sup>45</sup>

面對外界這樣的質疑，一直主持《中國論壇》發行人楊選堂作出如此澄清：

《中國論壇》是怎樣誕生的，《聯合報》為什麼會辦這麼的一份刊物？這是過去十七年來經常為人所探詢的問題，我願意以個人所知，所能體會，以及自己決定出來主持這一份刊物的心意，作忠實的說明，我要在此強調，有一些猜測與傳說是不實的，十七年來《中國論壇》的言論與內容，可以為我的說法作客觀的佐證。我相信，十七年來許多海內外受人敬重的知識分子，能自動的或受邀參與《中國論壇》的編務與筆陣，也為《中國論壇》的自由主義基本立場做了有利的

<sup>44</sup> 曾惠敏訪問整理，〈三位召集人走過從前——李鴻禧教授談《中國論壇》〉，頁33。

<sup>45</sup> 雷震，〈《公論報》、《台灣政論》和《中國論壇》〉，收於傅正主編，《雷震全集（12）——雷震回憶錄二（雷震回憶）》（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頁296-297。

表達。事實總是勝於雄辯。<sup>46</sup>

《聯合報》在 1970 年代已發展成爲一份大報，但是受到當時報紙發行的法令限制，每日只有三大張的篇幅，用來報導國內外許多重要新聞已有困難，更別說學者專家的專論，因此投稿文章也就常不得不分成數天連載或割裂刊載。如此《聯合報》想要加強與知識份子聯繫的打算，便遭遇難以克服的阻礙，無法充分反映知識份子的意見。於是《聯合報》社長王惕吾欲藉由創辦《中國論壇》這一份刊物來「開闢第二戰場」。<sup>47</sup>他的說法是：

我一直有一種志趣，就是希望報紙和學術界結合起來，我認爲這是促進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社會事務，提高公意知識層面的要務。報紙發行深入社會各階層，形成現代社會活動的基本指標，在大眾傳播中最具接觸頻繁而影響持久的功能，當可有效擴大知識份子登高一呼之激發觀念，帶動起步作用。

但是，報紙在目前有限篇幅下，報導國內外範疇日益擴展的新聞尚感周延不足，實無法提供更多篇幅，刊載專家論著，充分反映知識分子意見。這種困難，積而為國家社會現代化的一大瓶頸，必須有所突破。我想，如果能創辦一個刊物，來結合海內外知識份子，對復國建國大業的推展，作客觀深入的探討，科學理性的研判，以求事理有知識之明察，公意有正確之引導，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sup>48</sup>

楊選堂是《聯合報》幾十年的元老，擔任《聯合報》的總主筆。他的內心相當有自由主義的思想，能夠一方面顧及《聯合報》的立場來寫社論，但是另一方面也了解《聯合報》必須對社會有所貢獻，因此他認爲可以透過《中國論壇》來推行有助於台灣民主憲政發展的思想。《中國論壇》能持續辦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說是《聯合報》社長王惕吾對楊選堂的充分

---

<sup>46</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1992.10)，頁 3-4。

<sup>47</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4。

授權，由他來為《中國論壇》商定言論的立場與原則，而楊選堂也認為此時把學者拉攏到這裡非常有意義。<sup>49</sup>《中國論壇》的發刊詞表明了如下的抱負和希望：

我們的抱負是：發揮輿論報國的功能。所謂輿論報國，有四重意義：一是反映公意，一是鼓吹新的觀念，一是啟發民智，一是促進國家社會的團結與進步。

我們的抱負復是：結合海內外知識份子，大家來共同奮鬥。知識份子為社會的中堅，也是帶動國家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力量。知識份子一貫在中國現代化革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知識份子的使命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知識份子尤其具有高度的時代感與以天下為己任的參與熱忱。面臨這艱難的時日，知識份子不能默爾而息，不能置身局外。我們的抱負就是，要結合知識份子，為知識份子提供發表意見的園地；更要藉此互通聲氣，相互激盪，而形成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呼聲；把理論與現實緊緊的配合起來，使一個開放社會、開放政府獲得知識力量的匡範與推動。

這就是我們辦這一份刊物的抱負與希望，我們把它稱之為「中國論壇」，便以這樣的抱負與希望，使它成為當前中國人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論壇。<sup>50</sup>

## 二、編輯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

楊選堂一開始便主張《中國論壇》組織編輯委員會，聘請海內外知識份子做為集體決策的核心，以保持一定的客觀、超然言論立場。最初是希望由周憲文主編，但他因為要主編台灣經濟叢書而無暇兼顧，便改由張茲

<sup>48</sup> 王惕吾，《聯合報三十年的發展》（台北：聯合報社，1981），頁 255-256。

<sup>49</sup> 曾惠敏訪問整理，〈三位召集人走過從前——李鴻禧教授談《中國論壇》〉，頁 33-34。

闖擔任。《中國論壇》第一卷最初幾期都有張茲闖的策劃，且編輯會議在他家中舉行。張茲闖親自執筆為文，亦邀請一些學者參與。然而，不久他以另有要公為由，將編務交還給楊選堂，並退出編輯委員會。<sup>51</sup>《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會的成員，在當時堪為學術界、輿論界所推崇之知識份子代表。若以學術領域來劃分的話，請參見下表：<sup>52</sup>

表 2-1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成員學術領域表

學術領域	成員名單
文學	尉天聰 (方豪、顏元叔)
歷史學	李永熾、張玉法、張忠棟
人類學	李亦園
哲學	韋政通
藝術	何懷碩
政治學	易君博、胡佛、袁頌西
外交	金神保
法律	李鴻禧
社會學	文崇一、葉啓政、蕭新煌
經濟學	朱雲鵬、林鐘雄、孫震、陳昭南 (于宗先、周憲文、張茲闖)
心理學	黃光國、楊國樞
教育學	張春興
科技	沈君山
工程	楊維楨
生態學	林俊義

<sup>50</sup> 中國論壇社，〈我們的抱負和希望——代發刊詞〉，《中國論壇》1:1 (1975.10)，頁 1。

<sup>51</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5-6。

<sup>52</sup> 成員名單以姓名筆劃排序。其中周憲文、張茲闖、方豪三位先生參與編務時間極短，而于宗先、顏元叔亦退出編委會甚早，應不宜列入「中國論壇派」的成員。參見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13。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召集人採取由編輯委員輪任制度，並沒有固定任期的規定。歷任召集人對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的組織運作，具有相當重要的凝聚作用。第一任召集人是尉天聰（1975-1978年），第二任召集人是袁頌西（1978-1981年），第三任召集人是李鴻禧（1981-1983年），第四任召集人是韋政通（1983-1990年）。這四位召集人在學術領域與理念上都有其不同，彼此各領風騷。<sup>53</sup>在尉天聰和袁頌西擔任召集人的前六年，《中國論壇》主要以編委會成員為主要撰稿人；由於他們多為學院中人，所以同質性較高。及至李鴻禧、韋政通接任後，一方面外界的投稿增多，文章來源範圍擴大，而刊物走向與內容，則與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脈絡更為貼近；另一方面，原本只擔任執行工作的編輯部，開始取得較重要的地位。<sup>54</sup>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是一個民主化的委員會，它決定刊物的內容、言論的立場和新編輯委員加入的審核。每次開會討論的事項，由於各編輯委員主攻的學術領域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或是個人背景不同，難免會有或多或少的爭論，是很自然的現象。不過，不管如何爭論，編輯委員會大體上皆能就事論事，照理論理。對於新編輯委員的加入，只問其學術造詣，而不問其黨派與政治背景，所以討論問題總能找出妥協的平衡點或歧見的交叉點，得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結論，這是一般知識份子共同參與組織所罕見的「民主而統合」的現象。知識份子組織常犯有「相輕」的毛病，但《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則避免了該問題，並超越傳統文人的習氣與心境。<sup>55</sup>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皆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志同道合的基本同質性。雖然討論問題不免有爭議，甚至有人曾中途退出編委會，但是這種

---

<sup>53</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14。

<sup>54</sup> 餘曉雯，〈這扇飄送書香味的窗戶終於關上了——「中國論壇」歷來扮演的角色與停刊的原因〉，《新新聞周刊》291（1992.10.3-9），頁 74。

<sup>55</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12-13。

基本同質性使大家產生和維持某種程度的契合，因此中途退出者也能重新加入，展現君子之爭的風度。「中國論壇派」的特色，不只是集眾志之大成，也是統合各種不同觀點與立場之大成。在這樣基礎上所形成的意見與主張，有相當的超然客觀性，以及有力的說服和導向作用。由於《中國論壇》的立場和言論受到認同與支持，「中國論壇派」成爲受到肯定的知識份子族群。《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能夠突破其間的「異質性」，對於許多高度爭執性的問題產生一種共同意見或主張，表現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方能使海內外作出「中國論壇派」的界定，重視它的意義與影響。<sup>56</sup>

### 三、編輯委員會的分裂與停刊

《聯合報》十七年來不計盈虧地持續贊助《中國論壇》，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像是在《聯合報》的一塊「租界」，其編輯方針和文章內容較不受《聯合報》的干涉。不過，由於立場與觀點的差距，難免還是會有緊張關係出現，而其中有二次較嚴重的齟齬發生。第一次發生在 1981 年 3 月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國論壇》以「加速推展我國民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爲主題，邀請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舉辦三場座談會。其中一場座談會中，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呼籲國民黨在兩年內制訂「政黨法」，讓朝野政黨公平競爭，促進政黨政治。那時正值《聯合報》董事長王愷吾正尋求連任國民黨中常委的敏感時刻，因此該期雜誌以「印刷延誤」爲由，等到王愷吾當選後才出刊。而陶百川發言部分原爲在「兩年」之內制定一個政黨法，則被改成在「若干年」之內制定一個政黨法。<sup>57</sup>

第二次是在 1982 年 11 月俄國反共作家索忍尼辛應邀來台，受到國民

<sup>56</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13-14。

<sup>57</sup> 餘曉雯，〈這扇飄送書香味的窗戶終於關上了——「中國論壇」歷來扮演的角色與停刊的原因〉，頁 74-75。

黨政府的熱烈歡迎。當時《中國時報》曾舉辦一次座談會，出席的四位《中國論壇》編委有感於索忍尼辛對自由主義一知半解，便從學術客觀的角度對其思想缺失加以批評。回到《中國論壇》之後，編委們也自己召開一場座談會，取名為「索忍尼辛思想的探索」，準備當作第一七二期的封面主題。然而，編委們對索忍尼辛的抨擊，實與國民黨的反共宣傳背道而馳，有違聯合報系的一貫政治立場，於是被硬生生地抽換下來。<sup>58</sup>該事件導致編委們極大的不愉快，不少編委因此選擇離開《中國論壇》。當時的編委會召集人李鴻禧為此提出辭呈，雖然後來勉強留下來，卻也把召集人職務交由韋政通接手。經過此次事件之後，《中國論壇》編委會實已元氣大傷。<sup>59</sup>

1989年11月，張忠棟完成一篇〈離開權力核心的雷震〉，內容談到雷震和《自由中國》的其他作者反對設立救國團，以及雷震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經過。不過，此文始終未在《中國論壇》登出。張忠棟詢問結果，編委會召集人韋政通表示對此事並不知情，而發行人楊選堂亦未給予滿意的答覆。張忠棟懷疑是楊選堂所為，但也不排除有其他力量的介入，於是退出《中國論壇》，不再重返。該文最後轉投至《當代》雜誌，於1990年3月正式刊出。或許是受到張忠棟的影響，原本在編委會內孤掌難鳴，同樣也遭過刪稿待遇（關於其反帝的文字）的尉天聰，隨後亦決定離開《中國論壇》。<sup>60</sup>

《中國論壇》編委會成員除了在專攻學術領域有不同之外，在政治立場方面，則可以分為執政黨籍的學者或支持執政黨的學者，以及反對執政黨的學者或同情反對政治勢力的學者，包括民進黨籍學者，因此在結構上具有高度異質性。1980年代末期，台灣反對運動的台獨主張日益明確，《中

---

<sup>58</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17-18。

<sup>59</sup> 曾惠敏訪問整理，〈三位召集人走過從前——李鴻禧教授談《中國論壇》〉，頁34。

<sup>60</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20。

國論壇》編委群也產生省籍與統獨情結，不能免除整個大環境兩極對立摩擦的影響，內部意見衝突增加。<sup>61</sup>1989年4月，知識界成立「澄社」，而其成員多是《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11月，澄社公佈立法委員候選人評鑑，認為民進黨籍候選人素質比國民黨籍優秀，引起聯合報系攻擊，使編委們與聯合報系間緊張關係急遽升高。

1990年5月李登輝總統軍人閣揆提名案，提名國防部長郝柏村為行政院長，激起知識界反彈聲浪。由楊國樞擔任召集人的「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行動」，有上千名學術文化界菁英參與簽名、靜坐和請願等抗議活動，復加入「反軍人干政聯盟」舉辦的「五二〇」大遊行。5月21日《聯合報》第八版的十五張彩色遊行照片中，有七張是群眾攻擊或縱火鏡頭。「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行動協調會」成員認為，號稱民營中立的《聯合報》，此舉有刻意選擇偏頗的圖文編輯角度，扭曲事實真相，抹黑及抹紅該和平遊行活動和參與者之嫌。協調會於6月初發表「知識界呼籲社會各界抵制聯合報聲明」，呼籲社會各界拒絕為該報撰稿與接受其訪問。<sup>62</sup>

在此一抵制運動中，角色最為微妙的，無非就是協調會內同時身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的楊國樞、韋政通（當時《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李鴻禧、胡佛、文崇一、蕭新煌、黃光國、李永熾、林俊義和何懷碩這群自由派的學者了。上述抵制聲明，究竟包不包括聯合報系所屬刊物？若是，則《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勢必面臨解散的命運。6月中旬，楊國樞、韋政通等多名編委，特為此事與楊選堂聚餐。楊國樞表示，在知識界抵制《聯合報》的情況下，他們不便出席《中國論壇》編委會，須等到1990年10月10日《中國論壇》創刊十五週年時，再考慮是否留任編委。不過，就個別意願而言，楊國樞係因「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行動」的召集人，堅持自

<sup>61</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300。

<sup>62</sup> 餘曉雯，〈這扇飄送書香味的窗戶終於關上了——「中國論壇」歷來扮演的角色與停刊的原因〉，頁75。

已得退出《中國論壇》，但希望其他學者能繼續維持這份刊物；而韋政通、李鴻禧、李永熾等人不欲留任編委，主張停刊；至於胡佛、文崇一等成員倒願意留在《中國論壇》。然而，編輯委員會的解散，則已成定局。<sup>63</sup>

1990年，由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群與《聯合報》立場的衝突，導致《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的分裂與解散，使得維持十五年的《中國論壇》首度傳出停刊的警訊。1990年8月間，聯合報系則向外界宣稱，由於報業不景氣，為了節省經費，有意讓財務狀況不佳的《中國論壇》停刊。不過結果是，《中國論壇》從1990年11月起，將原本半月刊的形式改成「月刊」發行，並將編輯工作改由編輯部全權處理，至此《中國論壇》已是形同瓦解，名存實亡。後來《中國論壇》雖然以月刊取代半月刊減少開支，且在總編輯蔡詩萍以討論兩岸問題作為雜誌的新定位，勉強支撐了兩年。最後卻不得不在《聯合報》以在香港發行《香港聯合報》，可以取代《中國論壇》的角色為理由，決定其停刊的命運。<sup>64</sup>《中國論壇》終究在1992年10月停擺，於是《中國論壇》正式走入歷史的洪流之中。

### 第三節 《中國論壇》議題取向與筆陣分析

#### 一、專題座談會與大型研討會

《中國論壇》因為有編輯委員會的設置，所以集體討論、集約採訪，以及舉辦專題座談會成為《中國論壇》特色之一。《中國論壇》每期有一個或數個專題，常常召開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來研討。此外，還會針對該

---

<sup>63</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20。

<sup>64</sup> 餘曉雯，〈這扇飄送書香味的窗戶終於關上了——「中國論壇」歷來扮演的角色與停刊的原因〉，頁75。

問題，讓不能前來參加座談的人寫文章呼應。每半個月出一期的《中國論壇》，從創刊號的十位學者共同討論「當前的中國與中國人」，接著第二期由十一位「本省籍學人談國是」開始，到最後一期停刊號的「台灣的政治經濟學」為止，這十七年所發生的每一項重大問題，幾乎都可在《中國論壇》找到專題的探討。翻讀十七年來的《中國論壇》，可解時代發展，可察社會變遷脈動，可明學術發展，提供 1975 年到 1992 年這十七年間，有關中國問題、台灣發展、世界大事的豐富學術資訊與歷史文獻。<sup>65</sup>

《中國論壇》除了內部的小型專題座談會之外，還倡導一種對外的集居式大型研討會，亦即聚集多位專家學者，針對某一特別重大問題，分別撰述論文，然後集體居住在一處，進行二至三天的密集討論。這種研討會在《中國論壇》發行的十七年來，至少有六次是具有時代意義的。第一次是 1984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舉行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研討會，參與學者三十一人，發表論文十四篇。這次研討會對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作了斷層掃描式的檢查，並於會後引起海內外的重視與反應，觸發美國與香港知識份子響應舉行類似的研討會。第二次是 1985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舉行的「國家未來十年發展」研討會，出席的海內外學者約三十餘人，發表論文十七篇。這次研討會對於國家未來十年發展，就現有主客觀條件基礎上，以及可預估的情勢下，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來探測國家未來的可能演變，並作了科學的預言與導向。

第三次是 1986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舉辦的「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研討會，參與學者二十八人，發表論文十二篇。這次研討會就中國知識份子運動作了歷史的檢驗，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作了新的詮釋與界說，並且針對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間的互動關係，有縱向與橫向的分析。第四次 1987 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舉行的「女性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研討會，此

---

<sup>65</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1992.10)，頁 9-10。

次研討會雖不是集居式的，卻也是會議期間參與者的集約討論。出席女性學者二十人，女性觀察員二十五人，提出論文九篇。該研討會對於女性運動的困境與突破、男女新關係的建立，以及女性知識份子對台灣的貢獻，作了全面與深入的探討，也為女性運動與女性知識份子的結合提出積極建言。

第五次是 1987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舉辦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出席的海內外學者共三十二人，提出論文十二篇。該會對於從二二八事件以來逐漸呈現，且逐漸緊張的省籍問題，升高至「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層面，作可觀的、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研討。對於後來發展的台灣獨立與國家認同問題，具積極的學術性研判。第六次是 1988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舉辦的「海峽兩岸社會文化變遷」研討會，出席的海內外學者共二十五人，提出論文十四篇。此次研討會是對於海峽兩岸關係開展的一種迴響，從社會文化層面的角度，來觀察海峽兩岸關係，並針對未來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指出方向。

除了這六次大型研討會之外，還有一次隔著海峽的研討會亦頗具意義，即由兩岸學者針對「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舉行對話，提出論文二十一篇。該會銜接了隔絕四十年的兩岸學術研究，也為兩岸學術交流開拓了先河。其中幾次研討會論文在會後有集結出版，由聯經出版公司發行，稱為「中國論壇叢書」，包括：《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女性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四本。這套「中國論壇叢書」除了四本研討會論文集之外，尚有九本是將《中國論壇》各期文章精選出來集結成冊，包括：《成長的民主》、《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國家建設與教育》、《當前高等教育的問題》、《挑戰的時代》、《思潮的脈動》、《面對未來的沉思》、《我的探索》，以及《楊子論衡》。<sup>66</sup>

<sup>66</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10-11。

## 二、讀者群與銷售量分析

《中國論壇》主要吸引了四類讀者群，第一種是學術界的人，想看看其他學者對社會問題有何理解。第二種是大學研究生也訂閱，因為這些學生發現《中國論壇》裡面，有些是他們的指導老師，或者是相關領域的重要老師在此執筆，於是欲藉由《中國論壇》了解老師們的觀點和想法。第三種讀者群就是新聞記者，當他們想寫一個專欄報導時，他雖可以自己做現象觀察，但怎樣將相關理論配合上去便是一個難題，而《中國論壇》剛好是個相當好的資訊理論源頭。第四種讀者群是公務員，特別是政府幕僚在擬定政策之前，要先察看常批評時政的李鴻禧、胡佛、張忠棟等自由派學者在想些什麼，以做為擬定政策時的參考。<sup>67</sup>

至於《中國論壇》的銷售情形，根據編輯部總編輯蔡詩萍指出，該刊每期銷路約有四千本左右，訂戶則在二千人上下。這項數字相較於黨外雜誌的銷售量，例如：《台灣政論》的五萬多本，《美麗島》十萬餘本，以及早年同具知識份子色彩的《自由中國》約兩萬多本，算是有段頗大的差距。<sup>68</sup>加上《中國論壇》是不刊登廣告的，不難發現《中國論壇》財務狀況不算太好。《中國論壇》長期處於虧損的情形，卻還能維持長達十七年之久，楊選堂認為是《聯合報》對社會的一種回饋：

當然，首先要說明的，要不是《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愷吾先生願意出來創辦《中國論壇》，要不是王董事長充分尊重《中國論壇》的言論與內容，要不是王董事長慷慨支持了《中國論壇》發行十七年的長期財務虧損；《中國論壇》是不可能維持那麼久的，《中國論

<sup>67</sup> 曾惠敏訪問整理，〈三位召集人走過從前——李鴻禧教授談《中國論壇》〉，《中國論壇》31:1=361 (1990.10)，頁 33。

<sup>68</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22。

壇》在過去十七年對國家社會現代化所產生的作用與影響，也是不可能的。

知識分子為國家社會現代化所作的努力，表現於創辦一份刊物上的，過去一個世紀來無論是「書生論政」或「秀才造反」的形態，都往往維持不了多久，主要是缺乏經費，支撐不了發行經營上的虧損，主要的也是言論自由的備受干預會遭到無可抗拒的外在壓力，而不能不關門解散。

《中國論壇》的幸運，在於能免於這些災厄。<sup>69</sup>

### 三、議題取向與主要作者群

關於《中國論壇》十五年的半月刊時期，在內容分析方面，根據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的研究統計，十五年的《中國論壇》半月刊，文章總計有 7179 篇，包括社論、座談會、訪問、讀者投書等皆計算在內。陳重生依其性質分成三大類：A 類是「與台灣政治發展直接有關部分」；B 類是「與台灣政治發展間接有關部分」；C 類是「與台灣政治發展無關部分」，所謂「無關」，不是客觀上全然無關，而是這些文章主觀上並非討論政治議題。至於詳細類目名稱和篇數統計，請見下表：<sup>70</sup>

表 2-2 《中國論壇》各類文章篇數一覽表

A 類	與台灣政治發展直接有關部分	篇數	內含社論篇數

<sup>69</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 2-3。

<sup>70</sup> 以下統計分析和圖表引自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 24-25。

A1	中美關係	86	26
A2	彈性外交	19	1
A3	反對黨與政黨政治的討論	74	8
A4	國民黨黨務及改革	83	8
A5	行政革新與政府人事	306	24
A6	報禁和新聞自由等媒體問題	62	3
A7	戒嚴等人權問題	88	7
A8	公職人員選舉及議會改造	258	27
A9	臨時條款與中央政府體制述評	93	9
A10	地方自治	47	0
A11	省籍、統獨問題及兩岸關係	194	14
A12	反共號召	59	50
	小計	1369	177
<b>B 類</b>	<b>與台灣政治發展間接有關部分</b>	<b>篇數</b>	<b>內含社論篇數</b>
	<b>分</b>		
B1	經濟發展	151	7
B2	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80	1
B3	司法改革	65	3
B4	一般外交問題	42	1
B5	美國情勢	74	1
B6	大陸情勢與香港問題	202	10
B7	現代化問題	79	9
B8	民主政治泛論	149	5
B9	知識份子本身的問題	236	16
	小計	1078	53
<b>C 類</b>	<b>與台灣政治發展無關部分</b>	<b>篇數</b>	<b>內含社論篇數</b>
C1	一般財經與農林漁牧問題	886	27
C2	一般社會問題	1004	18

C3	一般法律問題	170	0
C4	文化	636	6
C5	教育	868	24
C6	科技	141	2
C7	國際關係與外國情勢(美國、大陸除外)	201	1
C8	學術思想探討	519	1
C9	書評	72	0
C10	譯文	21	0
C11	雜文	214	5
	小計	4732	84
	合計	7179	314

由上表整體的分析得知：

(一)A 類「與台灣政治發展直接有關部分」文章共計 1369 篇，僅佔總篇數的 19.1%，可見《中國論壇》並不完全是純政論性雜誌。這也可以從「社會」(B2+C2)有 1084 篇，佔總篇數的 15.1%、「財經實業」(B1+C1)有 1037 篇，佔 14.4%、以及「教育」(C5)有 868 篇，佔 12.1%觀察出來。因此，《中國論壇》是一份綜合性、觸角甚廣的評論性雜誌。不過，在 314 篇社論中，屬於 A 類者高達 177 篇，佔 56.4%，無疑強化了《中國論壇》的「政治取向」。

(二)在「學術思想探討」(C8)方面的文章出現 519 篇，僅次於政治(A 類)、社會、財經實業、教育與文化(C4)等類，排名第六，可以反映出《中國論壇》對於理論路線的重視。至於「知識份子本身的問題」(B9)累計有 236 篇，排名第七，其中對於學者從政與學官兩棲的探討頗多，而知識份子的使命感與角色扮演，更是作者們感同身受、苦心思索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論壇》深具學者主導的菁英色彩。

另外，針對主要作者群的文章統計，請參見表 2-3：<sup>71</sup>

表 2-3 《中國論壇》主要作者政論文章統計表

名次	姓名	A 類篇數	B 類篇數	總篇數
1	楊選堂	51	36	87
2	李鴻禧	44	30	74
3	林嘉誠	50	8.5	58.5
4	蕭新煌	11.5	29	40.5
5	黃光國	27	12	39
6	蔡詩萍	19	19	38
7	胡佛	22	12	34
8	韋政通	16	17	33
9	張忠棟	15	18	33
10	金神保	15	16	31
11	文崇一	10	19	29
12	楊維楨	21	7	28
13	李祖琛	15	11	26
14	尉天聰	5	15	20
15	袁頌西	10	9	19
16	楊國樞	8	11	19
17	張玉法	6	12	18
18	謝承勳	16	1	17
19	周陽山	7	10	17
20	葉啓政	10	5	15
	合計	378.5	297.5	676

<sup>71</sup> 篇數出現小數點者，是指內含與他人合寫之文章，而以 0.5 篇計算。

由上表來看，除了排名第三、十八、十九的林嘉誠、謝承勳和周陽山是外界的投稿作者之外，楊選堂為《中國論壇》發行人，蔡詩萍和李祖琛來自該刊編輯部，其餘十五人都是編輯委員會成員，可見《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對該刊的政治言論甚具主導性。在《中國論壇》這些政論文章主要作者名單中，則以楊選堂、李鴻禧、林嘉誠、蕭新煌、黃光國、胡佛、韋政通、張忠棟、楊國樞等人最具重要性和代表性，而可以說是《中國論壇》的「核心撰稿人」，且幾乎全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的委員。至於林嘉誠雖非《中國論壇》編委會的成員，但自其博士班研究生時代開始，即勤於撰文發表於該刊，加上他拿的是法政學位，故能暢談憲政改革問題，因此十五年下來所累積的篇數相當可觀。<sup>72</sup>因此，這些主要撰稿人的文章，便成為本論文問題研究的取樣對象。

---

<sup>72</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 242。



## 第三章 《中國論壇》自由主義的傳承

### 第一節 歐美與中國自由主義發展

#### 一、歐美自由主義思想的脈絡

自由主義在西方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廣義而言，自由主義旨在保護個人不受無理的外力侵害，尊重人的個性，以求個人身心解放。自十九世紀開始，自由主義已成為西方，尤其是英、美等國的主要政治思想，而這個時代的自由主義稱之為「古典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有其特殊涵義。從經濟方面而言，古典自由主義是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市場無須任何計劃，本身便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在自由經濟中，個人謀求自身最大的利益，最終亦造就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政府機關干預個人的選擇，只會減少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換言之，「自由放任」就是古典自由主義在經濟方面的基本主張。

從政治方面來說，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則主張盡可能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免對社會進行破壞性的干涉，而這樣做正與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相呼應，古典自由主義認為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事務，因而必須有各種辦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於是分權理論及其制度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立憲政府成立後，包括言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等個人權利，即可獲得充分的保障。<sup>73</sup>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潮是以「古典自由主義」當道，而英國思想界更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然而，在十九世紀末期，自由主義理論發生一個

---

<sup>73</sup> 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307。

重要的變化。儘管邊沁 (Bentham, Jeremy) 始終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但大部份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開始持續關心個人自由外，也開始注重群體的利益，例如：約翰·密爾 (J. S. Mill) 晚年則有傾向社會主義的跡象；格林 (T. H. Green) 更認為集體的幸福是個人自由與責任的先決條件，強調集體主義的重要性，而他的具體主張有：基本工業國有化、利潤社會化、政府使國民得到良好的生活教育和休閒等。因此政治思想史家認為格林的自由主義，開始轉變成「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亦即有別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sup>74</sup>不過，此說雖接近社會主義，格林卻不採用馬克斯的階級對立之說。

在 1929 年至 1933 年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中，經濟蕭條不僅使資本主義經濟淪為廢墟，還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同樣陷入困境。就連最富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英美兩國，既沒有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也免去法西斯主義的陰影，卻也出現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羅斯福新政，以及英國工黨政府的社會改革。英美自由主義這種歷史性的轉變，對 1940 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產生了重大影響。1933 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擴大政府的職能與權力，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實施新政，挽救了美國因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危機，使政治經濟重獲安定。

羅斯福的新政，為美國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縮短貧富差距，化解階級的對立，更穩固了遭受動搖的自由民主制度。至於英國的工黨，可說是「費邊社」與英國工人運動結合的產物；而成立於 1884 年的費邊社，則是一個以費邊社會主義為標榜的改良主義團體。工黨執政後，全力推行社會福利與企業國有化政策，而英國實施如此溫和的社會主義，也引起世人關注社會主義能否與民主政治並存。

到了第二次大戰，英國的著名思想家，如拉斯基 (H. J. Laski)、唐納 (R. H. Tauney)，卻已有了結合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於一爐的政治傾向，而這

---

<sup>74</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172-173。

種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演變成一種自然的聯結，則可稱之為「新自由主義」。他們仍主張維持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自由經濟，與古典自由主義並無多大差別，不同的是，他們希望強化政府的角色，積極干預經濟事務，建立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使經濟成果獲得較公平的社會分配。換言之，新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有進行改革的必要，卻也不能率意取消，或任其自然沒落。<sup>75</sup>

## 二、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西方自由主義於十九、二十世紀之際傳到中國，由嚴復對西方名著的翻譯，以及梁啟超對西方政治理論的介紹，都成為傳佈自由主義的重要媒介。到 1900 年代初期，進步的知識份子多少對西方自由主義有所了解。五四時期堪稱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自由主義經過胡適、陳獨秀和蔡元培等人的提倡，在新一代的知識份子中獲得相當大的迴響，形成一股強勁的風潮。尤其《新青年》雜誌的初期，可說是自由主義者的主要論壇。<sup>76</sup>1920 年代以《新月》雜誌的創刊為標誌，中國自由主義進入致力於政治改革與人權運動的嶄新階段。《新月》月刊於 1923 年出版，由胡適、梁實秋、徐志摩、羅隆基等人組成，且有「新月派」之稱。

《新月》起初是以文藝性刊物出現，但經過一年多以後，從第二卷第二期開始轉變為政治性刊物。《新月》的編輯方針之所以改變，一方面是因為國民黨統治全中國以後，政治氣氛一度沉悶，如此演變令新月派感到可能蘊釀將來更大的不安；另一方面，亦反映這一批中國自由主義份子想在中國實現英美國家民主政治的願望。他們既信仰思想與言論自由，強調保障人權，同時也關心時局的變化。這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試圖像英美國家一些自由主義者一樣，採取不加入政治，卻又議政的方式，來影響中國政治

<sup>75</sup> 胡偉希等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頁 308-310。

<sup>76</sup> 張玉法，〈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收於《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1912-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1217。

發展。<sup>77</sup>

進入 1930 年代內憂外患時期，中國的民族危機接踵而來，相繼發生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及隔年的「一二八事變」。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創辦《獨立評論》，要求超越黨派的偏見，對時局與社會採取一種理性的批評態度。當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根據地一再進行圍剿，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則從維護人權和實行多黨制的立場出發，對國民黨的做法加以批判。1933 年，丁文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要求共產黨轉為非暴力公開的反對派政黨，並呼籲國民黨應容忍共產黨以反對黨的身分存在。不過，1930 年代中期以後，當日本擴大對華侵略局勢日益嚴峻，自由派知識份子被迫放棄超黨派的立場，試圖與國民黨合作，且其中不少人選擇加入了國民黨。<sup>78</sup>

第二次大戰後期與戰後數年間，由於美國介入太平洋戰爭，提供中國軍事與經濟的援助。局勢如此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創造出良好條件。戰後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顯然有由「新自由主義」取代「古典自由主義」的趨勢，而這種演變則與二十世紀的世界潮流有著密切關聯。1917 年俄國革命成功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蘇聯在經濟上取得顯著的成就，引起世人的注目。在此情形下，中國自由主義者亦深深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然而，真正影響中國戰後自由主義思潮發展的因素，則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轉變。

當英國工黨以費邊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結合，採取和平漸進的方式獲得政權，為中國自由主義者塑造一個楷模；尤其，戰後工黨政府實行所謂的「中間路線」，也使國家經濟大有進展，更是讓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大受鼓舞。美國羅斯福施行新政的成功，在 1940 年代的中國，成為受到中國自由派青睞的新自由主義象徵。羅斯福曾主張人類應當有四項基本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而

<sup>77</sup> 胡偉希等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頁 34-36。

<sup>78</sup> 胡偉希等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頁 37。

這「四大自由」的論點，特別為中國自由主義者所嚮往和追隨。此外，羅斯福推行聯合蘇聯的外交路線，也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創造出一個可與共產黨和平共存的夢想。<sup>79</sup>

二次大戰前後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除了受英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之外，也和國內的政治變化有關，尤其國共兩黨的衝突。對日戰爭爆發，國家遭逢危難之際，國民黨不得不團結黨外政治勢力，包容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異己份子。如此做法正為國內政治的多元化提供一些契機，當戰爭結束後，便可成為發展自由民主政治的良好基礎。雖然戰後國共衝突加劇，但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國共任何一方都難以在短時間內消滅對方，雙方都需要一個能影響輿論的第三者。因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樂觀的相信，藉由他們的居間斡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的大好時機；也就是說，這種兩強對峙的局面，可能是導致政治多元化的前奏。

在抗戰期間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1945年8月抗戰勝利前夕，民盟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口號，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將中國建設成一個英美式的民主國家，並發表明確政綱，包括：議會制、責任內閣制、司法獨立、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普及教育、男女平等，以及學術自治等。從這些主張來看，實與自由主義的一貫立場無多少差異。<sup>80</sup>不過，在民盟的經濟綱領中，其經濟政策是傾向以蘇聯為示範的「平均財富」，保證公共事業與獨占性企業的「公營原則」，其餘才是私營的領域；並主張由國家制定統一的經濟計劃，以國民和合作社為主的消費品分配，節制私人商業。如此類似的主張，在其他中國自由主義黨派亦相當普遍。由這樣發展可見，此時中國的自由主義僅指政治和文化層面而言，在經濟層面卻明顯歸向社會主義。<sup>81</sup>

抗戰結束後數年間，可以說是中國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發展的最佳時

<sup>79</sup> 胡偉希等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頁311。

<sup>80</sup> 汪榮祖，〈自由主義與中國〉，《二十一世紀》2(1990.12)，頁35。

<sup>81</sup> 陳依，〈《觀察》周刊之研究(1946-1948)〉，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刻。當二次大戰結束，從意識型態來看，代表國際法西斯主義的崩潰，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聲勢大漲，僅剩社會主義可與之抗衡的情勢。因此，從世界意識型態的變化來看，戰後美、蘇兩強的對立，多少也反映到中國國共兩黨的鬥爭上。自由主義者之所以能成為制衡國、共雙方的「第三勢力」，便是因為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制約的歷史條件：一是國共的對峙與內戰，二是美國的支持與干預。國共鬥爭造成的內戰危機，給中間勢力製造契機，不僅可從中平衡國共權力，避免一黨專政，更能進而由聯合政府促進政治的自由、民主、多元化。<sup>82</sup>

就意識型態而言，美國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基本上是支持的，但從現實政治權力來考量，美國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態度卻又游移不定；因為這必須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全局，而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則是充滿著矛盾與變動。1945年12月15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聲明，其中重要的一點即是支持中國的民主改革，藉由召開全國主要代表的國民會議，來解決內爭以促成中國統一。杜魯門政府的態度是扶助國民政府對抗共黨勢力，但也要求國民政府進行改組，實施民主改革，容納國內其他政治黨派，如此便能促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同年12月20日，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國共衝突，但終歸失敗，而他在離開所發表的聲明中，依然認為中國未來政治應由「自由份子」來領導。<sup>83</sup>

在抗戰勝利到國共內戰期間，中國自由主義者相當活躍，他們以《觀察》周刊、《世紀評論》和上海《大公報》等刊物為陣地，對時局與中國未來政治前途發表意見，而其中重要人物除了胡適之外，還有張君勱、張東蓀、章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等人。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自由主義者多半採取改革、漸進的方式。不過，1947年到1948年間，內戰全面爆發，國共鬥爭激烈化，改革的希望顯得日益渺茫。自由主義者藉由對國是的建言來改善現實社會，呼籲雙方能和平止戰，實際上並不能發揮多大作用。

其因在於自由主義者過於高估理性的作用，重視理論是非之爭，而忽略力量強弱之別，缺乏能夠直接影響時局的力量。國民政府對自由派知識份子的種種諍諫，不但未予理會，還以政治力量加以壓迫，甚至勒令停刊，加以通緝、逮捕。在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缺乏具體保障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也就更難實踐了。<sup>84</sup>

## 第二節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發展回顧

戰後台灣地區的民主運動，大致可以劃分成四個階段：(一)是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改革訴求；(二)是 1950 年代初期的《自由中國》雜誌論政集團，及其在 1950 年代末期與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結合，所醞釀出的「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三)是 1960 年代初期的《文星》雜誌的思想啓蒙，以及 1970 年代初期在台灣外交挫敗中，《大學雜誌》知識份子所掀起的政治改革運動；(四)是 1970 年代初期開始成長的黨外運動，以至於民主進步黨的建黨。<sup>85</sup>

至於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大致也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分期有密切相關。台灣自由主義發展思想的開展，一般是以《自由中國》雜誌為發軔，後繼有《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刊物，以及論政團體「澄社」。按照時間先後來劃分的話，依序是：(一)1950 年代的《自由中國》(1949.11-1960.09)，(二)1960 年代的《文星》(1957.11-1965.12)，(三)1970 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1968.01-1987.09)，(四)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的《中國論壇》(1975.10-1992.10)。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台灣已經沒有以宣

<sup>83</sup> 胡偉希等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頁 314-315。

<sup>84</sup> 陳依，〈《觀察》周刊之研究(1946-1948)〉，頁 225。

<sup>85</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頁 269。

揚自由主義為宗旨的雜誌，只剩下論政團體「澄社」(1989.4 至今)標榜自由主義的信念。上述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傳承脈絡，請參考表 3-1。

表 3-1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刊物或團體傳承表

刊物或團體	傳承代表時段	起迄時間
《自由中國》	1950 年代	1949.11-1960.9
《文星》	1960 年代	1957.11-1965.12
《大學雜誌》	1970 年代初期	1968.1-1987.9
《中國論壇》	1970 年代後期-1980 年代	1975.10-1992.10
澄社	1990 年代	1989.4 至今

在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程裡，主要是以報章雜誌來扮演啓蒙批判的角色，至於個別人物的專書著作則極為少見。這種現象可能與特殊時代背景有關，尤其是戒嚴時期對書籍的檢查比報刊嚴密。無論原委如何，目前所見有關自由主義的文字資料，確實以雜誌文章為主。<sup>86</sup>本文將針對各時期的發展作一概述，以釐清自由主義在台灣傳承與變遷。

## 一、1950 年代《自由中國》的自由民主訴求

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開始，在接受已經西化的日本教育下，台灣的知識份子多少吸收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因此台灣本土菁英曾有爭取自由民主與結社的行動。不過，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軍國主義抬頭，台灣本土的各種結社便受到壓制而沉潛。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由於兩岸因長期隔閡，產生認知差異，造成國民政府施政未如台灣人民所預期，且台灣本土政治菁英仍處於權力的邊陲地帶。經過二二八事件的衝擊，台灣的本土菁英幾乎被消滅殆盡，加上國民政府的嚴密控制，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凝重的氣氛，鮮少有人敢再談論政治問題，活動力大為衰退。國民政府藉「動

<sup>86</sup> 江宜樞，《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289-290。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令」建立起來的軍事獨裁統治，再度引起台灣社會大眾，尤其是知識份子的不滿。<sup>87</sup>

隨著台灣本土力量的衰微，爭取台灣自由民主的主導力量，便由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所扮演。1950年代，做為台灣在野言論與追求自由民主的代表，主要是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積極想在台灣宣揚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民主政治理念，期使建設台灣為一「自由中國」。胡適與雷震從中國大陸帶來自由主義的火種，配合著反共救國口號，1949年在國民黨默許下成立《自由中國》雜誌社。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種種敗相，令美國失望而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放棄國民黨。在來台初期，蔣介石欲藉《自由中國》來宣傳自由民主理念，以爭取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因此對《自由中國》採取容忍的態度。不過，當1950年韓戰爆發，國民黨政府受到美國支援，轉危為安，國際關係好轉，不太需要《自由中國》為它宣傳，因此對這本雜誌的支援大不如從前。日後《自由中國》碰觸到民主憲政議題，例如：主張民主政治，強調言論自由，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成立反對黨等等訴求，皆與強人威權體制形成嚴重摩擦。<sup>88</sup>

1960年，雷震等人和台灣本土的社會精英，透過地方選舉所凝結產生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才使台灣的民主運動又進入高潮。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十幾年之後的這個組織反對黨運動，主要是由兩股力量所產生：一股是來自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一些自由主義者，他們創辦《自由中國》，例如胡適、殷海光、雷震等人；另一股是台灣本土經由選舉而產生的社會領導精英，例如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許世賢等人。前者以《自由中國》雜誌為宣傳媒體，再配合後者的地方選舉活動，於是這兩股

<sup>87</sup> 張炎憲，〈緒論：台灣民主運動的特色〉，收錄於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縣：國史館，2000)，頁 I-IV。

<sup>88</sup> 薛化元，《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0)，頁 264-266。

力量結合起來，形成新黨運動。<sup>89</sup>面對本省政治菁英與外省知識份子的結合，警備總部於1960年9月4日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自由中國》的發行人雷震，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驩以及職員劉子英（時任國史館）等四人，史稱「雷震案」或「雷案」。雷震涉嫌叛亂之罪名，一為「知匪不報」、一為「為匪宣傳」。其中「知匪不報」是指雷先前即知《自由中國》的會計劉子英為匪諜，但不予告密檢舉。「為匪宣傳」則指，「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隨著《自由中國》領導人雷震因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與執政當局發生正面衝突，被逮捕入獄，被判處十年徒刑。而《自由中國》也跟著走進歷史。<sup>90</sup>

就《自由中國》在實踐層面失敗的原因來分析，《自由中國》知識份子提供的文字宣傳，實在無法深入台灣草根，而本土菁英所能動員的群眾資源又十分有限，這場幾乎沒有群眾的反對黨運動，註定以悲劇落幕。<sup>91</sup>《自由中國》作者群心目中的民主自由，偏重在言論自由的層次上。這與《自由中國》本身是一份刊物，單純就刊物而言，其所能做的，僅是批評時政；其所關心的，亦不過是雜誌是否能繼續存在，以及它的言論自由是否會得到保障。這或許是它做為一份知識份子的刊物，天生存在的結構性限制。《自由中國》畢竟不脫「文人論政」的傳統，作者群大多是高級知識份子，擅長於剖析民主憲政理念，卻較少深入了解台灣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問題，也無法從民間的經驗觀察而反過來檢討自由主義理念的實踐性。<sup>92</sup>由於《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啓蒙理想本身所受到的局限，因此組黨運動的失敗，也客觀地反映其主張所面臨的困境。換言之，若要對民主自由觀照到更多層面、更具有實踐力的話，一份刊物須超越其單純做為刊物的定位，不再只以意見的表達為滿足。當中國民主黨的雛形出現時，《自由中國》便開始

<sup>89</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55。

<sup>90</sup>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186-188。

<sup>91</sup> 鄭牧心（鄭梓），《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頁187。

<sup>92</sup> 江宜樞，《自由民主的理路》，頁296-300。

轉化為政治團體的機關刊物，而不再單純做為一份宣揚自由民主的刊物而已，<sup>93</sup>只可惜未能進一步實現其理想便告結束。

雷震與《自由中國》雖然以悲劇收場，卻也從此埋下政治改革的種子。雷震、殷海光等人，影響了台灣民主化進程與發展。在言論方面，《自由中國》的歷史意義在於揭開自由思想的啓蒙，其對國家與個人的觀念探討很多，一反執政當局的「國家至上」言論，認為「國家為個人利益而存在」、「個人為國家之本」、「國家要把人當人」，對後來政論雜誌的創辦有很大的啓蒙作用。在行動方面，《自由中國》成為後來黨外政論雜誌的先驅和榜樣，其組黨行動結合大陸及與台灣籍精英，並且先有雜誌，然後進行政治活動的模式，給二十年後《美麗島雜誌》與美麗島政團做了示範。<sup>94</sup>

## 二、1960年代《文星》與1970年代初期《大學雜誌》

1950年代《自由中國》結束後，自由主義的根苗並未就此斷絕，仍逐漸生根蔓延。到了1960年代則出現《文星》，接著1970年代初期有《大學雜誌》，先後延續著文人以自由主義論政的傳統。1960年代《文星》雜誌成為自由派在言論市場上的代表刊物，但是相較於《自由中國》，其政治性則大幅減弱；加上推動民主運動的團體亦闕如，1960年代可說是一個沉寂的時代。接著1968年《大學雜誌》在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次，以及蔣經國即將接棒上台的背景下產生。《大學雜誌》在開始的前三年，其性質是校園文化的純知識份子型刊物，屬於非政治化的草創期。經過1971年的改組並政治化後，逐漸成為台灣鼓吹自由民主的園地。《大學雜誌》提出的改革方向，不僅衝擊當時沉寂的言論界，許多主張亦被日後反對運動吸收成選舉政見，尤其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問題，更具時代意義。<sup>95</sup>

然而，1973年以後，隨著蔣經國接班地位鞏固，以及該刊成員的分裂，

<sup>93</sup>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379-380。

<sup>94</sup> 阮銘等著，《民主在台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1），頁93。

<sup>95</sup> 薛化元，《中國現代史》，頁267。

其重要性亦告衰退，已不復當年風光。《大學雜誌》集團發生內部分裂的原因與過程頗為複雜，大體上是「土」、「洋」知識份子意見和態度有別，再加上《大學雜誌》鼓吹學生運動並介入選舉，令國民黨撤回對它的支援。《大學雜誌》屬於一種的「大聯合」式「自由主義集團」，混雜聚集各類的次級意識形態，隨著《大學雜誌》政治批判性的增強，以及對學生運動的支持，使得其成員因彼此背景、立場和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走向不同的道路，導致雜誌集團的分化。首先，在由雜誌內部台籍知識份子所寫成的〈台灣社會力分析〉一文刊出之後，使以外省籍為主的洋系學者退出大學雜誌集團。以台灣意識主控的論述行為模式，成為現代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獨特現象，而在《大學雜誌》開始揭開了序幕。<sup>96</sup>1973年1月，楊國樞辭去《大學雜誌》總編輯一職，《大學雜誌》加速失去政治號召力。其後，《大學雜誌》由於成員思想路線的不同，故而分成幾組派別：<sup>97</sup>

（一）新保守主義派（進入黨政機關者）：《大學雜誌》成員中的權貴後裔，如關中、魏鏞、邱宏達、李鐘桂等，在提拔「青年才俊」的口號下，被當局吸收，有的則納入黨政上層機構，他們逐漸由軟性的批評者變成現狀的辯護者。

（二）學院式的自由派（留在大學任教者）：《大學雜誌》成員中一些留學返國而獲入國立大學執教者，如楊國樞、金神保、王文興、張潤書等，由於個人因素或家世背景不強等因素而未獲政府任用，是以多留在學院裏。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政治壓力的日愈迫臨校園，迫使他們逐漸降低其作為批評角色的色彩。他們參與《聯合報》主辦的《中國論壇》等刊物，發表時論，其言論表現了學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基本面貌。其中楊國樞是《大學雜誌》革新時期的總策劃人，他與台大教授胡佛、李亦

---

<sup>96</sup> 王杏慶，〈《大學雜誌》與現代台灣——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知識分子改革運動〉，收錄於澄社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387。

<sup>97</sup> 此乃根據陳鼓應的分法，請參見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臺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上）〉，《中報月刊》28（1982.5），頁32-35。

園、李鴻禧等被視為自由派代表人物。

與黨外民主運動者相較，他們的言論雖顯得退縮而脫群，但在風吹草動時刻，他們的發言，能有止煞的作用。高雄事件後，政大教授黃越欽亦經常擔負這種任務，而與胡佛、李鴻禧教授主張適度放寬，不贊同戒嚴令長期的延續。自由派的政治立場是反共、反台獨，為國民黨的諍言者。高雄事件後，胡佛等人深受國民黨極右派的打擊。在大陸與台灣的問題上，他們有人主張近似「統一，但不是現在」，也有人提出以「台灣模式」去統一中國。

（三）地方政治派（投入公職選戰者）：在《大學雜誌》改組與變質後，一部分人士轉而參加實際政治，如張俊宏、許信良等，並與地方政治人物黃信介、康寧祥等結合，於 1975 年 8 月創辦《臺灣政論》。該刊總編輯為張俊宏，發行人為黃信介，而社長是康寧祥。

（四）社會民主派：《大學》成員或作者之中，王拓、王曉波、王杏慶、陳鼓應、高準等，參與後來蘇慶黎所接辦的《夏潮》雜誌，和另一些作者陳映真、王津平等，具有共同的社會改革思想傾向。

由《大學雜誌》集團出走的知識份子，除了若干向國民黨靠攏並受重用者之外，其他不被國民黨吸收或拒絕當官的知識份子，分化成幾股不同力量，四散到其他領域傳播各自理念，包括：《人與社會》、《夏潮》、《台灣政論》、《中國論壇》等等。其政治理念亦呈現由左到右、由統到獨的歧異，例如：較具中國意識、左派訴求者，轉移到《夏潮》；台灣本土意識較強、走選舉實踐路線者，則到《台灣政論》延續其理念；至於比較信奉自由主義理念、學院溫和改革派的人物轉進到《中國論壇》。《大學雜誌》集團分化產生各類意識型態群體，其譜系脈絡請參考下表：<sup>98</sup>

---

<sup>98</sup> 王杏慶，〈《大學雜誌》與現代台灣——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知識分子改革運動〉，頁 386-387。

表 3-2 《大學雜誌》集團的分化譜系

意識型態路線	代表人物	代表刊物
新保守主義派 進入黨政機關	關中、魏鏞、 邱宏達、李鐘桂等	《人與社會》
學院式自由派 留在大學任教	楊國樞、金神保、 王文興、張潤書等	《中國論壇》
地方政治派 台灣意識，選舉實踐	張俊宏、許信良等	《台灣政論》
社會民主派 中國意識，左派	王拓、王杏慶、 王曉波、陳鼓應、高準等	《夏潮》

### 三、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的《中國論壇》

197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論壇》半月刊成爲自由派學者集結的大本營，續擔任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傳媒。1975 年，《中國論壇》半月刊是由一群富有時代關懷與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所催生的政論性雜誌，其言論立場帶有自由主義色彩，致力於倡導民主憲政，在當時台灣思想輿論界扮演著重要角色。<sup>99</sup>《中國論壇》半月刊是在戒嚴時期、動員戡亂時期、威權統治時期創刊的，而面對這樣的客觀環境，致力於鼓吹自由民主、憲政改革。該刊對於戒嚴、報禁、黨禁的解除，動員戡亂時期的停止，威權統治的結束，政黨政治與言論自由，都發生了思想觀念的啓蒙作用，以及社會力量興起的激發作用。<sup>100</sup>

造成《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分裂與停刊的因素，實與時代變遷有密切關連。《中國論壇》屬於聯合報系的雜誌，一般說來，其編輯方針和文章內容比較不受《聯合報》的干涉。不過，由於立場與觀點的差距，

<sup>99</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頁 20-21、298。

<sup>100</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

難免還是會有緊張的關係出現。1982年11月，《中國論壇》有一期批判索忍尼辛的專題，因為言論立場與國民黨政府的反共立場有所不同，最後被抽換下來，造成一些編委的離開。此外，亦有編委因為文章出現被刪稿的現象，為此選擇退出。加上1980年代末期，台灣反對運動的台獨主張日益明確，《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群也產生了省籍與統獨情結，不能免除整個大環境兩極對立對立摩擦的影響，內部的意見衝突增加。

1989年4月，知識界成立「澄社」，其成員多是《中國論壇》的編委。澄社認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候選人素質比國民黨籍優秀，使得編委們與聯合報系間緊張關係升高。1990年5月，李登輝總統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人選，激起楊國樞召集「知識界反對軍人組閣行動聯盟」，而其所舉辦的「五二〇大遊行」被《聯合報》刻意選擇偏頗的圖文編輯抹黑，遂有「知識界呼籲社會各界抵制聯合報聲明」發表。這群知識份子包括身兼《中國論壇》編委的楊國樞、韋政通、李鴻禧、胡佛、文崇一、蕭新煌、黃光國、李永熾等人；然而，在《中國論壇》編委會中，也有其他成員支持郝柏村與《聯合報》的處理方式。此內部衝突造成編委會無法再順利運作，聯合報系乃決定以財務困難為由，將原來《中國論壇》半月刊改成月刊發行，將編輯工作交由編輯部全權處理，至此《中國論壇》形同瓦解。之後月刊勉強支撐了兩年，但終究還是在1992年10月停擺，而《中國論壇》所代表的自由主義運動亦正式走進歷史。<sup>101</sup>

#### 四、1990年代以後的「澄社」

1989年4月，《中國論壇》半月刊結束前一年，楊國樞、胡佛、李鴻禧、韋政通、張忠棟、李永熾、文崇一、黃光國、蕭新煌、葉啓政、林俊義、何懷碩等二十幾位自由派學者成立「澄社」，由楊國樞擔任首任社長。由以上名單來看，不難發現其中大多數人皆曾為《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

---

(1992.10)，頁11。

委員。澄社以「第三種聲音」，而不是第三種勢力，來提供民眾判斷兩黨說詞或所作所為是否得當的參考。澄社之所以強調「第三種聲音」，意味著民進黨已經羽翼豐滿，足以直接與國民黨交涉，而不需要自由派學者居間協調。這群不打算黨派化的學者，必須重新自我定位，以確保知識份子獨立批判的立場。澄社決定標榜「論政而不參政」，一方面延續《自由中國》以來的理想，以社會批判來促進自由民主體制的實現；另一方面則要求出任黨政職務的社員皆須自動退社，以確保超然獨立之立場。

澄社一個相當菁英主義取向的論政團體，它以學術成就和批判精神作為吸收社員的必要條件，因此社中成員頗多一時之選。從創社理念來看，澄社和先前《中國論壇》的宗旨並無多大差別，兩者一樣追求自由民主的多元社會，相信經由自由主義式的改革措施可以為社會帶來進步。不同的是，澄社的特色除了標舉自由主義的理念之外，它更以實際行動來證明其自由主義立場。澄社本身並未發行雜誌刊物，主要是由個別成員將批評言論，以評論文章或專欄的方式刊登在各大報紙上，再集結成《澄社報導》、《澄社文存》等系列文集。另外，澄社數度發表立法委員評鑑，並參與各種社運與學運團體所發起的示威活動。從社會參與度來看，澄社比先前的自由主義團體更積極有力。<sup>102</sup>

澄社創立之初，有過一段意氣風發時期，發揮影響政局的力量。然而，隨著憲政改革陸續底定，以及民進黨勢力日益茁壯，澄社能夠發揮的空間便越來越小。加上若干議題凝聚共識不易，使得澄社疲態漸露，趨於消沉。此外，台灣社會的快速多元化，使得自由主義不再是唯一具有論述正當性的綱領，而自由主義論政團體也只是諸多社會力量的其中之一。<sup>103</sup>近年來，由公視所主辦的總統和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會，在協辦單位的名單中，會看到澄社的名號在上面，且其排序順位常在其他媒體之前，可見澄社至今對社會大眾而言，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公信力。

---

<sup>101</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頁 300-301。

<sup>102</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頁 301-302。

### 第三節 《中國論壇》政論主題與言論分期

蔡智賢的〈《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研究指出，《中國論壇》在政治方面的論述主題中，有所謂「泛論國是」部份，係指刊登在每年新舊曆年初、歲末，或重大節日作為反省與展望，或是每當有新政府領導人就任之際，用來反應知識份子對國家發展的建議，此類論述主要表現為「建言式」文體，而其出現的頻率則相當平均，約每一至二年就會出現一次。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隨著政治威權逐年消失，到解嚴之後國家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化，知識份子這種泛論國是的主題，也逐漸從早期的「建言、展望」的語言，轉向為「檢討、批判」文體。<sup>104</sup>如此現象可從各卷期主題的轉變來觀察，因為這些主題的標題定位與逐年的變化趨勢，便能大致看出《中國論壇》就此「泛論國是」的議題上，從建言走向「檢討、批判」的過程。此「泛論國是」文體轉變趨勢可參照下表：

表 3-3 《中國論壇》有關「泛論國是」的卷期主題

卷期	主題
第 1 卷第 1 期	當前的中國與中國人
第 1 卷第 2 期	本省籍學人談國是
第 1 卷第 7 期	新年展望國內外情勢
第 3 卷第 1 期	國是建言
第 3 卷第 7 期	新年談國是
第 6 卷第 3 期	對新政府的獻言
第 9 卷第 4 期	對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的期望
第 9 卷第 7 期	八〇年代的展望

<sup>103</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頁 304-305。

<sup>104</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135。

第 11 卷第 1 期	從中國的歷史文化看台灣的現在與未來
第 13 卷第 2 期	由慶祝光復節看台灣前途
第 19 卷第 1 期	面對未來的轉變
第 21 卷第 4 期	轉型期的困境與出路
第 21 卷第 7-9 期	國家未來十年發展的探討
第 25 卷第 5 期	台灣向前看——當前國家情勢的檢討與展望
第 29 卷第 6 期	1989 年台灣十大問題
第 29 卷第 7 期	站在九〇年代的門檻上：反省八〇年代、認識九〇年代

至於《中國論壇》政論主題中，有關「現實政治觀察」方面，可以 1986 年來話分成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75-1986)以選舉制度與地方自治為主軸，第二階段(1986-1990)則以政黨政治和省籍情結為主軸。

### 一、第一階段（1975-1986 年）：選舉制度與地方自治

《中國論壇》從 1975 年代成立之際，到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以前的政治議題論述方向，偏重在選舉、地方自治等具體的、既有的制度層面之修正與檢討上，而鮮少提到政黨政治的問題。換句話說，《中國論壇》關於政黨政治的討論，大多集中在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在 1986 年民進黨創立之前，觀察《中國論壇》各卷期政治論述主題取向可發現，其主要是在討論政治現代化的基本訴求，以及「選舉制度的研究與反省」與「地方自治」等政治主張的立論上。<sup>105</sup>關於《中國論壇》第一階段(1975-1986 年)各卷期政治議題論述主題，請參見下表：

表 3-4 1975-1986 年《中國論壇》政論主題表

卷期	主題
第 1 卷第 4 期	為增額立委選舉獻言
第 5 卷第 1 期	民主政治的前途

<sup>105</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頁 135-137。

第 5 卷第 3 期	地方公職選舉議題
第 7 卷第 3 期	選舉投票問題
第 7 卷第 5 期	中央民代選舉問題
第 9 卷第 1 期	如何建立民主與法治的政治
第 9 卷第 2 期	台灣省推行地方自治的檢討
第 11 卷第 4 期	選舉活動與選民心態
第 11 卷第 6 期	觀察選舉，檢討選舉
第 11 卷第 12 期	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
第 13 卷第 3 期	選民的投票行爲
第 13 卷第 5 期	成長中的選舉
第 13 卷第 7 期	民主的挑戰與回應
第 14 卷第 1 期	選舉經費的剖析
第 14 卷第 7 期	談鄉鎮長選舉問題
第 15 卷第 7 期	青年人談國是：突破瓶頸、邁向民主
第 16 卷第 2 期	利益團體與民主政治
第 17 卷第 4 期	增額立委選舉候選人、選民動向分析
第 20 卷第 11 期	落實憲政，健全地方自治

## 二、第二階段（1986-1990 年）：政黨政治和認同問題

1986 年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劇烈轉型的關鍵時刻，就《中國論壇》有關政治民主化與政治參與的言論，基本上也可以藉這個時間點分成前後二大階段來看，而以 1986 年 5 月 25 日出刊的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作為象徵性的分水嶺。這一期的兩大座談會主題，第一個主題為「充實國會、維護憲政」座談會，出席的李鴻禧、胡佛、文崇一與陶百川等人，討論主題鎖定在國會即將面臨大幅改革的前提下，如何設計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國會制度問題。<sup>106</sup>另一主題為「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的座談，與會的李鴻禧、蕭

<sup>106</sup> 李鴻禧等，〈充實國會、維護憲政〉（座談會），《中國論壇》22:4=256 (1986.5.25)，頁

新煌、葉啓政、張玉法、呂亞力和瞿海源更直接針對黨外問題所造成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僵局，提出理解與解決之道。<sup>107</sup>因此，我們可以將此一期視為《中國論壇》反映政治時勢變遷的象徵性分水嶺。

黨外人士在 1986 年 9 月宣佈民主進步黨成立，使整個島內政治環境的張力到達美麗島事件後的另一個高點。《中國論壇》的政治主題，到了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之後，正好反應這股黨外政治力量的具體化，以及逐步成形的政黨政治。從 1986 年到 1990 年，《中國論壇》此一階段的議題論述焦點，主要是兩大方向：(1)政黨政治、(2)中國／台灣（省籍）之結。《中國論壇》此後相關政治論述主題，則明顯不以原則性的政治民主化概念立論，而是更進一步扣緊政治環境來具體分析與批判。<sup>108</sup>1986-1990 年《中國論壇》各卷期政論主題，請參見下表：

表 3-5 1986-1990 年《中國論壇》政論主題表

卷期	主題
第 22 卷第 4 期	充實國會，維護憲政
第 22 卷第 4 期	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
第 23 卷第 2 期	解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結
第 23 卷第 7 期	民主要向下紮根
第 23 卷第 10 期	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
第 23 卷第 10 期	政黨政治
第 25 卷第 1 期	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
第 25 卷第 2 期	突破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困境
第 25 卷第 9 期	後蔣經國時代的權力運作
第 25 卷第 10 期	政治開禁，還要面對更多問題

4-15。

<sup>107</sup> 李鴻禧等，〈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座談會)，《中國論壇》22:4=256 (1986.5.25)，頁 16-27。

<sup>108</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頁 136-139。

第 26 卷第 1 期	國民黨內民主化課題
第 26 卷第 6 期	國民黨與台灣前途
第 26 卷第 8 期	總評國民黨十三全會
第 26 卷第 10 期	建立政治文化新典範
第 27 卷第 4 期	台灣政治體檢：透視立法院的政治衝突
第 28 卷第 9 期	選舉的政治、社會遊戲規則論
第 28 卷第 11 期	解讀台灣反對運動
第 29 卷第 3 期	誰掌握更多社會力？國民、民進、工黨、勞動四黨黨綱比較
第 29 卷第 5 期	激情過後看選舉
第 29 卷第 9 期	九〇年代的統獨
第 29 卷第 10 期	兩黨革新與台灣民主：國民、民進黨的改革藍圖

1986 年 10 月，《中國論壇》在二十三卷第二期舉辦「解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結」座談會，而該期的社論亦以此為主題，正式討論省籍認同問題對社會政治環境所帶來的衝擊與調解之道。<sup>109</sup> 這個問題在台灣社會中，隨著政黨政治興起，在 1980 年代中期逐漸抬頭，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因此，1987 年 8 月，《中國論壇》更進一步舉行一場「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大型研討會來討論此一議題。

由於中國／台灣(省籍)之結，影響到台灣人民的認同態度，而認同差異所造成的社會分化，逐漸形成社會內部的不可忽視張力。此發展也開始衝擊到知識份子本身的價值取向，使《中國論壇》編輯委員在此一階段之後，產生不同的文化認同立場。此議題在《中國論壇》的論述主題之中，雖不會出現於 1980 年代初期之前，但是在 1980 年代末期，台灣反對運動的台獨主張日益明確，《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群亦產生了省籍與統獨情結，不能免除整個大環境兩極對立摩擦的影響，內部的意見衝突增加，最後《中

<sup>109</sup> 黃光國等，〈解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結〉(座談會)，《中國論壇》23:2=266 (1986.10.25)，頁 10-39。

國論壇》由於「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摩擦而曲終人散。

陳重生在〈《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研究中，檢視十五年《中國論壇》的政論概況後，將之分為「歌功頌德」（1975-1981）、「回歸憲法」（1981-1986）、「民主優於統獨」（1986-1990）三個時期。筆者將其研究成果整理如下，藉以對照、補充蔡智賢對《中國論壇》的言論分期方式。

### （一）「歌功頌德」時期(1975-1981 年)

當 1975 年《中國論壇》創刊不久，正值中美關係瞬息萬變之際，該刊曾經以一系列的社論，向美國呼籲接受「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說法」，而此訴求與官方的立場相當一致。其他讓《中國論壇》蒙上「歌功頌德」色彩的方面包括：該刊對國民黨的大力支持、對蔣經國總統的擁戴、為軍事戒嚴辯護、強烈批判黨外運動、反共八股文字，以及「揚統抑獨」論調充斥的眾多社論。

雖然在學者的個人立場方面，與社論的風格頗有差異。儘管他們對國民黨亦持肯定期盼的態度，卻不乏勸諫式的改革意見，針對戒嚴、國會結構、政黨政治問題作了溫和的檢討。不過，相較於《中國論壇》旗幟鮮明的社論立場，學者們的聲音便顯得微弱。

### （二）「回歸憲法」時期(1981-1986 年)

隨著自由派學者逐漸影響到《中國論壇》的言論走向，該刊的「歌功頌德」色彩日漸淡化，例如：1981 年 10 月 10 日的「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看法與主張」主題，即是由編委們和發行人集體署名的意見表達，呼籲國民黨早日黨內民主化、落實政黨政治、解除戒嚴、充實國會、開放報禁、採

行彈性外交、以民主建設來消弭台獨與邁向中國統一等。雖然全屬委婉勸諫之作，但與早年風格實已大異其趣。及至 1980 年代中期，《中國論壇》又多次提到憲政結構的原則性問題；且一改昔日對黨外的敵視態度，以「放棄群眾路線，追求議會民主」來督促之；而其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亦變得「含蓄」許多；至於反共八股與揚統抑獨論調，僅散見於官方重要節日的社論上，實與當年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論壇》之所以進入「回歸憲法」時期，主要是因為李鴻禧和胡佛的大力宣揚。每逢國會有意擴增臨時條款時，二人便藉由《中國論壇》的座談會或撰寫文章來鼓吹這些理念：解嚴、國會改選、內閣制的憲法設計、地方自治法制化等等。當黨外漸成氣候之際，《中國論壇》多位學者也予以言論或行動上的支持。

### （三）「民主優於統獨」時期(1986-1990 年)

民進黨成立之後，加速了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腳步，而攸關台灣前途至鉅的自決與統獨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浮上檯面。《中國論壇》除了重申「議會路線」的必要性之外，並希望民進黨能摒棄「台獨的暴力意識」。此外，該刊於 1987 年舉辦一次「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大型研討會，秉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之論述，則凸顯出《中國論壇》的中國色彩。

所謂「民主優於統獨」的說法，尤其是楊選堂、胡佛、韋政通、楊國樞、文崇一等外省籍人士的信念，就連李鴻禧、蕭新煌、黃光國三名本省籍學者亦曾提及。以具體的主張而言，大多數的《中國論壇》成員深具「中國情懷」，期盼不可知未來能見到海峽兩岸的統一；而李鴻禧、蕭新煌二人則傾向台灣自決；至於退出該刊編委會以後的張忠棟，到 1991 年更轉而認同台灣獨立的理念。<sup>110</sup>

<sup>110</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 417。

對照蔡智賢與陳重生的分期方式，可發現同樣以「1986年」為重要轉捩點。在1986年以前，蔡智賢說明《中國論壇》的「泛論國是」議題，從早期的「建言、展望」語言，轉向為「檢討、批判」文體，頗符合陳重生所謂「歌功頌德」和「回歸憲法」時期之特色。至於1986年以後，蔡智賢以「政黨政治」與「省籍情結」為探討主題，亦符合陳重生「民主優於統獨」時期的論述脈絡。由於陳重生對《中國論壇》的言論分期架構，劃分地相當有體系，可為《中國論壇》十五年間的言論走向變化，提供清楚的分析脈絡，因此筆者特別將其分期方式呈現給讀者參照。

## 第四章 《中國論壇》的時代關懷：攸關「自由民主」言論分析

### 第一節 《中國論壇》在同時期政論雜誌的定位

#### 一、1980 年代政論雜誌類型

##### (一) 三種政論雜誌類型：保守派、中間派、激進派

雜誌的影響力雖沒有像報紙那麼大，但也是重要的媒體之一。歷來雜誌在台灣受歡迎的原因，主要是雜誌比報紙更敢於批評政府，而當局對雜誌的言論管制尺度也比較寬鬆。1980 年代期間，反對派政論性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是雜誌成爲黨外人士傳播政治理念的重要管道。由於政府在 1988 年 1 月才解除報禁，加上在此之前的大部分報紙鮮少報導反對派的意見與活動，即使有報導亦未能秉持公正的態度，因此反對派必須仰賴政論雜誌發表觀點，來對國民黨和政府的進行批判。

1980 年，向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立案的雜誌約有 2000 家，其中有 120 家可列爲政論性雜誌。到 1985 年時，雜誌總數已超過 2600 家，但是政論性雜誌的數目大約未變。原因是當時許多批評政府較強烈的反對派政論雜誌，經常遭到查禁、停刊的命運。雖然這些雜誌在被停刊之後，另改名稱重新出刊，且主要編輯人物亦由某一雜誌轉到另一雜誌工作，但是大多數此類雜誌的壽命都很短。台灣政論雜誌的理念和意識型態，從極右派的《龍旗》到左派的《夏潮》，涵蓋各種政治立場。不過，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雜誌，多半是持下列三種不同立場：1、主張維持現狀（保守派）；2、進行體制內、溫和漸進改革（中間派）；3、從事體制外抗爭、立即改革體制（激

進派)。此外，這些雜誌在探討台灣與大陸關係時，則分成統、獨兩派，前者認同大中國，後者則認同台灣。<sup>111</sup>

主要的幾份「保守派」政論刊物是由國民黨發行的，或黨部直接經營，或是透過黨營事業，另外有些是由黨政要人私人發行，而國防部總政戰部也有它的雜誌。例如：《中央月刊》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行的，《雙十園》是省黨部的文宣刊物，《黃河》則由中央委員會青工會所出版，而《大眾》是國防部總政戰部旗下的刊物。上述這些雜誌都為國民黨的政策與利益作辯護，經常批判反對派。另外，由國民黨要員發行且具影響力的保守派雜誌有：《聯合月刊》、《中華雜誌》、《龍旗》、《疾風》和《政治評論》等。

至於帶有「中間派」的色彩，且具國民黨改革色彩的政論雜誌，包括：《中國論壇》與《時報新聞周刊》。這些中間派的雜誌，大體上是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認為應該由國民黨來主導不同程度的改革。<sup>112</sup>

與反對派政治運動有關的政論雜誌，大體上它們普遍表達 1977 年中壘事件後，黨外民主運動人士的共同觀點：倡導政治民主化，主張保護人權、改革政府體制、要求新聞自由與合法組黨。在 1987 年解嚴之後，這些雜誌則反對國安法、人民團體組織法、集會遊行法的訂立，堅持主張全面改造國會，反對大陸代表名額，並贊同台海兩岸為改善關係而進行接觸。然而，這些反對派雜誌即使有共同目標，但在策略運用方面則出現分歧意見。

比較溫和的反對派人物，大多追隨康寧祥的領導。康寧祥曾任增額立委，亦是民進黨的中常委。康寧祥和他的同道出了好幾本政論性雜誌，像《台灣政論》、《八十年代》、《亞洲人》以及《暖流》。這些雜誌雖然批判國民黨，並要求進行政治革新，但是它們所倡導的是溫和漸進式改革，且承認國民黨在改革過程中扮演主導性地位。康系雜誌比較傾向「議會路線」，

---

<sup>111</sup> 田弘茂，《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249-250。

<sup>112</sup> 田弘茂，《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頁 250。

主張透過選舉來達到議會民主，進行「體制內改革」，並不強調「群眾運動路線」、「體制外的改革體制」；儘量避免使用義氣昂揚、富煽動性之激進筆調。大體而言，溫和派黨外人士認同的是西方自由主義所揭櫫的一些政治理想，故康系雜誌也可以歸類於「中間派」雜誌。

不過，大多數反對派雜誌比康系刊物來得強硬，屬於「激進派」雜誌，並承續 1979 年《美麗島》創刊以來所秉持的傳統，強調以街頭抗議、群眾運動路線，來向國民黨霸權進行挑戰。諸如：《關懷》、《深耕》、《生根》、《新潮流》、《新路線》、《新觀點》、《自由時代》、《民主時代》與《蓬萊島》等雜誌，皆在延續《美麗島》的精神，對國民黨政府作毫不避諱的批判。這些雜誌除了主張全面改造政治體制，還大力倡導台灣本土意識，因此被認為是帶有台灣獨立色彩的刊物。屬於此路線的重要人物，包括：邱義仁、林濁水、鄭南榕（在 1989 年初自焚身亡）等。

《美麗島》與承續其激進風格的其他刊物，以及由康寧祥一系所主導的溫和派刊物，都屬於反對派政論性雜誌的主流。在這些主流之外，還有代表左派思想的一些刊物，如《夏潮》(1976.3-1979.1)、《夏潮論壇》(1983.2-1984.11, 1985.12-1986.7)雖批評國民黨，卻明顯主張社會主義思想和兩岸統一。由林正杰和張富忠所發行的《前進》系列，言論立場比《夏潮》系謹慎，較傾向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對改善兩岸關係，採取相當積極的態度。<sup>113</sup>

關於政論雜誌類型的劃分，一般而言可有左、中、右之橫面分類，與老生代，新生代的縱面分類。如果按照這個橫縱標準來觀察，並且列舉馮建三有關《中華雜誌》、《八十年代》與《深耕》這三本政論雜誌的研究成果為例，可以發現《中華雜誌》的發行人與編輯群的年齡層較高，較偏向右派之論政立場；《八十年代》與《深耕》的發行人與編輯群之年齡層較接

<sup>113</sup> 田弘茂，《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頁 250-251。

近，但前者略可歸為中生代，較為左偏而穩重，後者則可略歸為新生代，較為左偏而急進。不過，我們在使用前述的分類標準時，應注意這是為了方便提供一種線索讓我們知悉三本雜誌確實有所不同，而其「左、右」與「新、老」僅是一種相對性的比較，並不能如其字面意義般地具有絕對性；其次，則更應注意，就我國而言，政治的意識型態較為統一，俗云的「左右」與歐美的「左右」有所不同，因此只能方便我們辨認雜誌的差異。<sup>114</sup>綜合以上對 1980 年代政論雜誌的分析脈絡，筆者製作出以下類型表：

表 4-1 1980 年代政論雜誌類型表

認同意識	保守派 維持現狀	中間派 體制內改革	激進派 改革體制
中國意識	《黃河》、《龍旗》、 《疾風》、《中華雜誌》、 《中央月刊》、《大眾》、 《聯合月刊》、《雙十園》	《中國論壇》、 《時報新聞周刊》、 《前進》系列	《夏潮論壇》
台灣意識		《八十年代》、 《亞洲人》、《暖流》	《關懷》、《深耕》、《生根》、 《新潮流》、《新路線》、 《自由時代》、《民主時代》、 《蓬萊島》、

## (二) 三種類型政論雜誌比較

在洪春柳〈中美斷交後國內政論內容分析：「黃河」、「中國論壇」、「八十年代」分析比較〉的研究指出，1978 年 12 月中美斷交，引起國內外的政治震盪；1979 年 3 月 1 日，政府開放雜誌登記後，政論雜誌紛紛創立，擔當立論救國的傳統角色。該論文即擬探討在此特殊國情階段，國內政論

<sup>114</sup> 馮建三，〈政論雜誌讀者型態的比較分析〉，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頁 27-28。

雜誌提出何種主張？不同黨派自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他們的爭論到底是什麼？這些政論對整個國家政治體系有何意義？在時間方面，該論文以中美斷交後三年的時間為限，即自 1979 年 1 月至 1981 年 12 月止。樣本方面，則以黨派色彩為標準，盡量挑出可代表不同黨派的政論雜誌來比較。當時台灣政治環境以中國國民黨為一黨獨大，因此大家習稱中國國民黨以外的份子為「黨外」。此外，另有一批不特別標明黨派色彩，而以自由、民主為信仰的知識份子，可稱之為「自由主義」。該論文斟酌實情，取《黃河》雜誌代表中國國民黨，以《中國論壇》代表自由主義，另以《八十年代》代表黨外。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此後三十多年，國民黨執政台灣、建設台灣，但最終目的仍是以反共復國為念，並視此國策為不容稍懈的歷史使命。然而三十多年過去，另一批政治新生代興起，他們對台灣的感情遠勝於中國大陸，因此他們對台灣自由民主的關心也遠勝於統一復國的信念。由於關心的目標不同，關心的程度各有輕重，所發展出來的政治理念自然有所爭議。關心統一復國者，他們必定強調大中國認同，希望以戒嚴法來維持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關心。關心自由民主者，則強調政治制度化，希望解除戒嚴法的束縛，走向民主的大道，且在憲政體系下求安定。關心台灣認同者，則視統一復國為遠程目標，主張加強台灣的民主自由與本土意識。<sup>115</sup>

該論文依照認同、規範、決策三個部分來比較這三種雜誌：

### 1、 認同部分

(1)中國認同：《黃河》對統一復國所表現態度最強；《中國論壇》次之；《八十年代》則較注重台灣地區的安定繁榮與自由民主的實施。(2 認同：《黃河》極力反對，起而攻之；《中國論壇》態度不明顯；《八十年代》

---

<sup>115</sup> 洪春柳，〈中美斷交後國內政論內容分析：「黃河」、「中國論壇」、「八十年代」分析比較〉，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1983，頁 24-26。

則具此傾向。(3) 認同：三雜誌皆認為嚴重的省籍問題已隨時間消失，且皆主張省籍融合。

## 2、 規範部分

(1)自由權：《黃河》雖肯定自由的可貴，但更重視國家安全、人民團結一心的信念，所以偏向自由權的消極取向；《中國論壇》、《八十年代》皆偏向積極取向，強調社會的多元。(2)自主權：三雜誌皆主張民權參與，但《黃河》在主張民權參與之餘，尚留有部分消極的想法。(3)制衡權：三雜誌皆肯定制衡的信念，尤以《八十年代》對制衡的要求最力。

## 3、 決策部分

基本上，三個雜誌在政策部分的信念大同小異。大同者，在經濟上，都主張工業升級；在教育上，都注重人力發展；在內政方面，要有安定健康的生活環境；在外交方面，要爭取國際友誼。至於決策過程，則主張用人應有制度，行政要求效率。但在這些大同之下，各雜誌對每一問題關懷程度似乎還有一些細節上的差異，只是這些差異尚不至於引起太大的爭論。這些差異為：

在政策本身方面：(1)經濟：《黃河》、《中國論壇》皆以提昇資本技術工業的比重為要，但《中國論壇》更偏重於平均社會財富，保障消費者權益，而《八十年代》偏重農業政策，提高勞工待遇。(2)教育：《黃河》大致主張維持現狀，《中國論壇》偏重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八十年代》偏重民主觀念的培養。(3)內政：《黃河》偏重安定、團結的加強，《中國論壇》偏重社會環境、社會福利，《八十年代》偏重勞工權益、社會保健。(4)外交：對中共的態度，《黃河》原本堅持漢賊不兩立，不接受「三通四流」，絕不進行和談。不過，《黃河》對中共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完全拒絕接觸，也有政論表示可作非官方接觸，逐漸轉向彈性外交的運用。《中國論壇》、《八十年代》主張彈性外交，表示可嘗試對中共主動從事政治、

文化與經濟的反攻。在決策過程方面：《黃河》大致滿意於現狀，《中國論壇》以提高行政效率為重，《八十年代》則對政府用人的制度、國會的行政效率有嚴厲的評論。

以上三個部分的分析，若以篇數分布多寡來觀察的話，在(1)認同部分：《黃河》的篇數最多，強調中國認同，並不同意台灣認同。(2)規範部分：積極取向，以《八十年代》的篇數最多，《中國論壇》亦相當接近；消極取向，則以《黃河》篇數最多。(3)決策部分：則以《中國論壇》篇數最多。由篇數分布情形可見，《黃河》致力於認同的加強，而《中國論壇》、《八十年代》則偏重於規範的建立。綜言之，《黃河》雜誌強調中國認同與維持現狀，《中國論壇》較著重基本人權與政治制度化，而《八十年代》則重視制衡規範的建立與主張台灣認同。<sup>116</sup>筆者根據以上的分析，製作出以下的比較表：

表 4-2 《黃河》、《中國論壇》與《八十年代》政治偏向比較表

比較項目	《黃河》	《中國論壇》	《八十年代》
黨派色彩	中國國民黨	自由主義	黨外
認同部分	中國認同	中間偏統	台灣認同
規範部分	消極自由權、自主權 重視國家安全	積極自由權、自主權 要求制衡權次之	積極自由權、自主權 最要求制衡權
決策部分			
(1)經濟	重視提昇資本 技術工業比重	偏重平均社會財富 保障消費者權益	偏重農業政策 提高勞工待遇
(2)教育	維持現狀	建立現代教育制度	偏重民主觀念培養
(3)內政	偏重安定團結加強	偏重社會環境、	偏重勞工權益、

<sup>116</sup> 洪春柳，〈中美斷交後國內政論內容分析：「黃河」、「中國論壇」、「八十年代」分析比較〉，頁 113-114。

		社會福利	社會保健
(4)外交	拒絕接觸、彈性外交	彈性外交	彈性外交
(5)決定 過程	滿意現狀	以提高行政效率為重	批評用人的制度、 國會行政效率
篇數分布	認同部分最多 (1) 制衡部分最少 (3) 決策部分最少 (3)	認同部分次之 (2) 制衡部分次之 (2) 決策部分最多 (1)	認同部分最少 (3) 制衡部分最多 (1) 決策部分次之 (2)
綜合特色	強調中國認同 維持現狀	著重政治制度化 基本人權	建立制衡規範 主張台灣認同

另外，馮建三曾經針對三種政論雜誌：《中華雜誌》、《八十年代》以及《深耕》雜誌的讀者比較研究，發現《八十年代》的讀者有以下特徵：

(1) 在身分職業方面：他可能是個台灣籍 (93.8%) 的未加入政黨者 (58.0%)，或國民黨員 (42.0%)，而年齡介於三十至三十九歲之間 (56.1%)。其職業主要是民營企業的經理人員或一般職員、工程師、技師、農漁鹽民和工人；

(2) 在閱讀喜好方面：他喜歡閱讀的雜誌多是民間的批判性刊物 (75.8%)，報紙則傾向民間形態者 (73.6%)。他所喜歡的報紙內容很少是中共政治新聞 (1.2%)，認為報紙的政治新聞多是 (很) 不客觀公正 (88.6%)；

(3) 在政治認知方面，與《中華雜誌》相同，絕對多數是以理性式相對奉獻於國家 (93.8%)，而對當前國是則以為民主法治未能貫徹實施是最大隱憂 (72.2%)。其次，《八十年代》讀者有相當高的民主權力取向 (74.0%)；就選舉期間而言，他積極參與的程度比《中華雜誌》讀者高，但略微不及《深耕》讀者。<sup>117</sup>

<sup>117</sup> 馮建三，〈政論雜誌讀者型態的比較分析〉，頁 96-98。

1979年5月和8月，康寧祥和黃信介分別創辦《八十年代》和《美麗島》，代表當時「溫和」與「激進」的兩種黨外運動路線：《八十年代》代表體制內、溫和改革的「議會路線」；而《美麗島》代表體制外、街頭抗爭的「群眾路線」。康寧祥主張以理性溫和問政的改革方式與國民黨溝通協調，而黃信介則主張直接以較激進的策略來反對國民黨不合理的措施，難免影響兩人先前在1975年《台灣政論》奠定的合作基礎，亦使黨外路線出現派別。由於《八十年代》並未與群眾直接結合，而是在幕後糾結一群大專院校學者與新聞記者，從事批判性論政。《八十年代》因為有更多知識份子投入，在論政風格、品質與範圍上，比《台灣政論》時代更加提昇。至於《美麗島》則從小規模戶內活動，發展到大規模戶外活動，且黨外內部成員大都投入《美麗島》街頭群眾運動中，所以《美麗島》成為黨外運動的機關刊物。<sup>118</sup>

黨外立委康寧祥，結合曾於學生時代帶動山地服務的青年醫師陳永興，以及一批年輕人和數位大專院校的學者，籌畫創辦一本政論雜誌。於是《八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6月1日創刊，由康寧祥擔任發行人兼社長，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記者司馬文武（江春男）擔任總編輯，法律顧問有張德銘、林義雄、姚嘉文。陳永興結合了一批大學裡的學者教授擔任該雜誌的幕後智囊及撰稿人，參與編輯工作的人，多屬年輕新生的一代，包括康文雄、史非非（范巽綠）、林進輝、陳忠信、周渝、李筱峰等人，後來林濁水、林世煜也加入編輯陣容。《八十年代》在創刊號中指出：「大家還記得台灣政論所造成震撼人心的熱潮嗎？如今《八十年代》雜誌又有更進步更充實更精彩的新面目，請大家來參與、批評、指導和支持」，同時並刊登一段啓事，聲明前《台灣政論》的訂戶若未收到退款，可與《八十年代》聯繫，以便退款或改寄《八十年代》月刊，因此該刊表明姿態就是《台灣政

<sup>118</sup> 李筱峰，〈知識分子與政治革新運動〉，《中國論壇》23:1=265 (1986.10)，頁75。

論》的延續，只不過限於出版法之規定，必須換個名稱與讀者見面。<sup>119</sup>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以後，《八十年代》遭停刊一年，而以司馬文武發行《亞洲人》(1980.02-04)繼之；不久《亞洲人》亦停刊，又以康文雄擔任發行人的《暖流》(1980.07-08)接棒，而這些刊物可稱為「《八十年代》系列」。《八十年代》於1981年2月復刊，72年4月(第32期)再度被處停刊一年。基本上，《八十年代》的言論較其他黨外雜誌謹慎，但是謹慎並不代表畏懼，而是對現實的瞭解較深。有少數人懷疑《八十年代》過於強調個人本位主義，忽視黨外整體利益，而司馬文武反對此一說法。他認為黨外的整體利益是全民政治和福利國家，須將全民利益和黨外利益結合，然而舉凡國內談勞工、農業、經濟、漁業、社會問題、人權問題，包括黨內刊物在內，《八十年代》談得最多。他不主張將「行動」作為黨外的唯一綱領，因此，《八十年代》除了實證主義外，還強調意識形態。<sup>120</sup>

「八十年代社」曾經整編出版《自由中國》政論選集，可見康寧祥是個比較有長期觀點的政治人物，相當重視1950年代《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言論遺產。在《八十年代》系列刊物發行期間，雖然已經有蓬勃的「黨外候選人聯誼會」一類的政團活動，但黨外其他雜誌頻因觸犯禁忌遭停刊，而《八十年代》系列刊物由於言論較溫和穩健，所以發行時間比大多數黨外雜誌還長。《八十年代》這份雜誌肩負著反映黨外動態、爭取言論自由、批判國民黨統治，以及試探組黨可能的多重功能。此外，它的本土關懷是早年《自由中國》所缺乏的內容，諸如：紀念蔣渭水(一卷四期，1979.9)、批評語言政策的專題(六卷一期，1983.2)等，顯示《八十年代》即使不是主張台獨，至少也有濃厚的台灣意識。<sup>121</sup>

<sup>119</sup> 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65。

<sup>120</sup> 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從日據時期到民國81年〉，頁420-421、423。

<sup>121</sup> 陳儀深，〈中國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延續與沒落〉，遊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北：月旦出版社，1996)，頁200-201。

總結本節有關田弘茂、洪春柳和馮建三對 1980 年代政論雜誌類型與言論取向分析的研究成果，筆者以一個綜合比較表來呈現：

表 4-3 1980 年代政論雜誌言論取向比較表

比較項目	國民黨刊物	《中國論壇》	《八十年代》系列	《美麗島》系列
雜誌類型	保守派	中間派 自由主義	中間派 自由主義	激進派
政治手段	維持現狀	體制內改革 議會路線 協商手段	體制內改革 議會路線 協商手段	體制外改革 體制 群眾路線 杯葛手段
政黨支持	一黨獨大	執政黨改革	黨外組黨制衡	黨外組黨執政
認同意識	中國意識 深藍	中間偏統 淺藍	中間偏獨 淺綠	台灣意識 深綠

## 二、黨外雜誌派別與發展概況

### (一) 黨外勢力組織化

1979 年《美麗島》雜誌創刊後大為暢銷，其中創刊號更再版了好幾次，總發行量則超過十萬本以上，創下台灣雜誌發行的空前紀錄。由此可見，反對派言論已獲得一定的市場，有其存在的空間。雖然黨外雜誌屢遭查禁、沒收、停刊等處分，但是每種黨外雜誌在創刊時，即登記了好幾個類似名稱的雜誌做為「備胎」。因此當遭到停刊處分時，便改以別稱的雜誌進行言論活動，例如台北市議員林正杰所發行的《前進週刊》、《前進廣場》、《前進時代》和《前進世界》等。

1980 年代初期，黨外人士開始議論組黨的可能與方法，認為應該加強黨外勢力的組織化。他們主要採取兩條將黨外勢力組織化的方向：一條是將選舉時的「黨外後援會」變成常設組織，且在 1983 年 12 月立法委員選

舉後，便改以「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名稱設置常設機關。另一條則以「黨外新生代」黨外雜誌為基礎，在強化政治發言力之後，所開始進行意識型態的組織性集結。1983年9月，新生代的黨外政論雜誌編輯組成「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而該會第一任會長為《前進》的創刊人林正杰，但以後逐漸由吳乃仁、邱義仁和林濁水等「台灣民族主義」傾向較強的成員取得主導權。<sup>122</sup>

黨外人士當初為了準備1983年12月的立委選舉，決議籌組「黨外後援會」推舉候選人，卻引發黨外的分裂。當「黨外後援會」籌組時，部分黨外新生代建議，候選人要先經過內部初選通過才能參選，而大老康寧祥則主張應優先保障現任公職人員的競選資格。縱使後來對保障條文作了修改，但是黨外新生代卻自行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sup>123</sup>此次增額立委選舉中，新生代的吳乃仁、邱義仁等人，為了對抗以康寧祥為首的「康系人馬」，全力支持「美麗島系統」人士參選。「美麗島系統」候選人以辯護律師和受刑人家屬為主，包括美麗島大審辯護律師張俊雄、江鵬堅，以及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黃信介之弟黃天福、許信良之弟許國泰、與牧師高俊明(因藏施明德而被捕)的妻子高李麗珍。新生代在其主編的《生根》(即《深耕》之延續)週刊上，推出「美麗島系統連線作戰」報導，大力為他們宣傳。

後來該次選舉成績揭曉，「美麗島系統」的戰果不錯，七人當中有四人當選；但是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等「康系人馬」卻出人意料的大慘敗。尤其康寧祥落選最令人感到意外，引起朝野間、海內外的震撼，甚至有人將康寧祥的落選，與菲律賓在野領袖艾奎諾的遇刺，列為1983年東南亞在野政治界的兩件大事。康寧祥落選有許多錯綜複雜因素，但與長期以來黨外新生代在其主持的黨外雜誌中，對康寧祥的批判有關。可見黨外雜

<sup>122</sup> 若林正文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211-213。

<sup>123</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頁189-191。

誌的言論動向，對黨外輿論的影響，有著不容忽視的力量。<sup>124</sup>

1984年，黨外編聯會首次不在公職人員的保護傘下，創立反對運動的理論性雜誌——《新潮流》，而這即是後來民進黨內部具有嚴密組織的「新潮流派」創始。「新潮流派」的誕生，可象徵在臺灣黨外運動中，「台灣獨立」勢力的產生。<sup>125</sup> 1985年，公政會與編聯會在參與地方公職選舉時，共同組成「1985年選舉中央後援會」。結果該選舉總算挽回1983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挫折，結束了黨外內部的「路線之爭」，接著兩大陣營朝向成立政黨的行動來進行合流。1986年1月，公政會決定在地方設立分會。黨外這一連串的行動，便預告著組織反對黨的準備宣言。

## （二）黨外雜誌五大派系

黨外雜誌的紛紛出現，是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發展的一大特色。黨外雜誌最早先由擔任公職的民意代表所創辦，他們藉由自己的雜誌來宣傳他們在議會中的問政成績，並建立他們的知名度，以突破現實新聞環境的報禁與新聞封鎖等。這些由公職人員自辦的雜誌有：康寧祥的《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統稱「《八十年代》系列」）；周清玉的《關懷》；許榮淑的《深耕》、《生根》、《台灣年代》（稱為「《深耕》系列」）；林正杰的《前進週刊》、《前進廣場》、《前進時代》和《前進世界》等（稱為「《前進》系列」）；……。許多知識青年被這些黨外雜誌社吸引，投入雜誌的編寫與採訪工作。此外，部分黨外人士由於無心或無力參與選舉，或不滿於公職人員的「公職掛帥」心態及其雜誌編輯方向，或想建立自己的聲望，或認為雜誌利潤可觀等因素，也紛紛自辦雜誌，例如：鄧維楨、鄧維賢兄弟主編的《政治家》、《民主人》；鄭南榕所主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

<sup>124</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94-195。

<sup>125</sup>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213。

包括《自由時代》、《先鋒時代》、《民主時代》等；吳乃仁、邱義仁、劉守成等黨外新生代所創辦的《新潮流》等等。而這類黨外雜誌從 1983 年以後更多。<sup>126</sup>

從 1975 年到 1984 年，黨外所發行的刊物就有五十多種之多，其種類名稱相當複雜，不但造成黨外雜誌市場之混亂，更使讀者懷疑代表反對勢力的「黨外」究竟有多少「派系」？因為每一種黨外雜誌都強調自己是代表黨外，是最真實的黨外代言者。由於部分黨外政論雜誌僅出版一期或尚未正式發行，即被查禁或停刊，亦有部分雜誌每一期被查禁，卻仍每期暗中出版。在種類繁多的黨外雜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五種刊物是《台灣政論》、《美麗島》雜誌、《八十年代》系列雜誌、《深耕》系列雜誌、《前進》系列雜誌。由於這五種刊物在黨外雜誌市場中，知名度最高，銷售情形良好，且雜誌的負責人均為具有代表性的黨外人士。<sup>127</sup>以下對分別說明這五種刊物的重要性：

1、《台灣政論》是國內第一本正式代表黨外的政論雜誌，其發行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均為黨外舉足輕重的代表性人物。1975 年底，這本象徵反對勢力興起的政論性刊物，確實引起不小震撼。《台灣政論》是自 1949 年以來，第一份以台灣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論雜誌，且被視為黨外政論雜誌的先驅。不過，1975 年 8 月創刊的《台灣政論》，只出了五期即因「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被國民黨當局下令停刊。《台灣政論》有別於以往黨外的個人英雄主義作風，首次以政論性雜誌，結合民意代表、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改革者，發表時論來要求自由人權、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台灣政論》的組成份子，包括發跡於民間的政治運動家和知識份子，這種在野的「力」與「理」的結合，預告了台灣的自由民主運動即將面臨

<sup>126</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95-196。

<sup>127</sup> 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20-21。

一個新的轉變。<sup>128</sup>《台灣政論》是黨外文獻裡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黨外雜誌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據。

2、《美麗島》雜誌的組織儼然已具有反對黨的雛型，其設於全省十一個縣市的社務委員，表面上是負責銷售該雜誌，暗中卻已成為反對黨的十一個支部，分別在各地吸收成員，擴張勢力。由於當時適逢中美斷交後不久，國際局勢對中華民國和執政黨頗為不利，使得反對勢力急劇擴張，而在《美麗島》雜誌上所發表的言論益形激烈，終發生「美麗島事件」。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將為首與滋事的黨外人士逮捕下獄，勒令《美麗島》雜誌停刊。這份刊物的發行人仍是黃信介，其編輯群、撰稿人則是遍及全省的社務委員，幾乎網羅當時重要的黨外人士，因此《美麗島》雜誌所散播的言論，可說是代表當時黨外的心態與目的；這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黨外政論刊物，是研究國內反對勢力與黨外雜誌的重要資料。

3、「《八十年代》系列」雜誌：包括《八十年代》、《亞洲人》和《暖流》三種雜誌，且是黨外雜誌存在最久的一份政論刊物。這份由「黨外龍頭」之稱的前立法委員康寧祥所辦的刊物，最早嘗試多元發展，亦即在《八十年代》談政治理論、選舉，並搭配《亞洲人》雜誌談廣義的反對文化，而《暖流》則以黨外副刊的形式出現。後來雖因讀者群與市場被其他雜誌瓜分，或受到停刊查禁的處分，《八十年代》系列的三種刊物只能維持一種發行，但這份「老康模式」的政論雜誌卻仍具有一貫風格與水準。因此要研究黨外雜誌，這份發行最久的黨外主流刊物，便最具深入探討之價值。

4、「《深耕》系列」雜誌：包括許榮淑的《深耕》、《生根》、《台灣年代》、《台灣廣場》、《台灣潮流》等，且雜誌社成員係以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為班底。《深耕》系列雜誌的立場特殊，可說是黨外雜誌「台灣化」最徹底

---

<sup>128</sup> 韋政通，〈三十多年來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從「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到黨外的民主運動〉，收錄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頁 369-370。

的一份刊物，尤其《深耕》系列雜誌首先展開批評康寧祥的運動(批康運動)，形成「黨外反對黨外」的內鬨現象，並影響康系黨外人士在 1983 年競選立委連任失敗。《深耕》系列率先對同屬黨外的成員進行批判，導致黨外衝突分裂，而《深耕》系列在這一連串筆戰中也遭致其他黨外人士的不滿與攻擊。1984 年《深耕》系列對此內部批判造成的分裂現象登文道歉，從 4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停刊兩個半月。後來《深耕》系列的編輯群分為兩派，一派以《深耕》延續者自居，發行《台灣廣場》；另一派則創辦《新潮流》週刊。<sup>129</sup>

5、「《前進》系列」雜誌：由台北市議員林正杰所發行，包括《前進週刊》、《前進廣場》、《前進時代》和《前進世界》等。《前進》系列雜誌是黨外的第一家新聞「週刊」，突破黨外刊物一向以月刊、半月刊發行的方式。這份「黨外新生代」林正杰創辦的雜誌，具人力充沛的編輯群，分工精細，專其所司，已略具企業化經營規模。《前進》系列雜誌將黨外政論的層次導至一個新局面，由抽象論述時政，改為對每週發生的重大國內外新聞提出批評，可說代表黨外勢力另一層次。<sup>130</sup>關於重要黨外雜誌發行時間表，請參見下表：<sup>131</sup>

表 4-4 黨外雜誌五大派系發行時間表

黨外雜誌名稱	發行期間
《台灣政論》	1975.8-1979.12
《八十年代》系列	1979.6-1986.02
《美麗島》	1979.8-1979.11

<sup>129</sup> 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從日據時期到民國 81 年〉，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1992，頁 611。

<sup>130</sup> 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頁 21-22。

<sup>131</sup> 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從日據時期到民國 81 年〉，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418-428。

《深耕》系列	1981.6-1986.2
《前進》系列	1983.3-1986.9

### (三) 黨外新生代崛起與「路線之爭」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再出發」的黨外勢力，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集團：1、未被鎮壓的穩健派，如康寧祥等，2、美麗島事件被告關係者，即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3、「黨外新生代」，指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活躍於選舉活動的年輕人、黨工和活動家等。「黨外新生代」約形成於 1975 年立法委員增補選的時候。當時在陳菊引介之下，約有數十個大學生與研究生步出校園，義務幫郭雨新散發競選傳單。不過，黨外雜誌黨工的進一步成長，則與美麗島事件後的「黨外再出發」息息相關。1980 年黨外新生代幫周清玉助選，1981 年周清玉與許榮淑分別創辦《關懷》和《深耕》雜誌。由於受刑人家屬對辦雜誌一事十分生疏，因此新生代自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sup>132</sup>

自 1982 年 6 月起，一部分黨外新生代對黨外中央民意代表的議會功能提出質疑，進而發展成斷斷續續、長達一年多的內部爭議。這波爭議集中在 1982 年下半年，以《深耕》雜誌的新生代為主，而其主要砲轟對象則是康寧祥，引發「批康浪潮」與「路線之爭」。康寧祥等穩健派試圖將黨外活動限定在國會內，然此主張受到開始在黨外雜誌建立基礎的新生代之反彈。相對於穩健派的「議會路線」，新生代則提出「群眾路線」，展開對穩健派大老康寧祥的批判。新生代在其主持的雜誌上，撻伐黨外的溫和派，並對國民黨施予極為嚴厲之言詞攻訐。<sup>133</sup>

<sup>132</sup>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89-90。

<sup>133</sup> 若林正文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6)，頁 209-211。

綜觀黨外此次路線問題爭論，基本上可歸結出三個層次的爭辯：一是杯葛與妥協；二是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三是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之爭。而進行攻擊的一方，往往將這三種觀念予以二元對立的劃分。<sup>134</sup>第一層次的爭辯並未有路線之爭；第二層次的爭辯，在本質上並無差別，因為體制內改革者要求回歸憲政體制，而改革體制者要求改革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最終亦須回歸憲政。因此，只有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之爭，才是真正的焦點所在。<sup>135</sup>不過，這些黨外內部的批判性文字不單單只是路線之爭與觀念互異所致，還有「權力之爭」、「派系之爭」，以及人際間的恩怨等因素。這是黨外內部首度出現的批判聲浪，卻也是黨外運動發展以來，首度針對運動的目標與路線進行公開溝通的起點。

在這些黨外路線之爭的批判文字下，受力最大、最深亦最久的個人，要算是康寧祥了。從 1982 年到 1983 年這一年多來，康寧祥成爲眾矢之的，但他始終不願做正面回應。直到 1983 年 11 月，康寧祥才在其所著《危機與希望》中的〈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一章中，對於群眾路線與議會政治之間是否有衝突表示：

今天論者動輒指誰是群眾路線，指誰是議會路線，難到這兩者沒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嗎？事實上，三十年來的黨外運動就是群眾路線與議會政治配合使用的運動，今天黨外的成就與實力也是群眾路線與議會政治配合使用的累積。因此，在肯定議會路線的同時，我們不應排除群眾運動的價值，因為從理論上說，群眾運動是民主國家應該享有的權利。而且從實際來看，如果沒有群眾運動作後盾，作基礎，那麼在國民黨的歷史性格之下，議會政治更無法推進。如果黨外放棄群眾路線，根本是否定了自己的立場。問題的癥結在於動員能力、策略和可行性。群眾運動具有高度危險性，尤其在新興國家，

<sup>134</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87。

<sup>135</sup> 姚嘉文，《民主、自決、救台灣》（台北：生活文化事業出版，1988），頁 89-90。

群眾運動經常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演變為暴動，從而出現軍事獨裁，使辛苦栽培的民主根苗徹底摧毀。<sup>136</sup>

康寧祥認為群眾運動的效果，亦可以其他方式的社會教育來完成，而非得走向選舉一途，例如透過辦雜誌，使社會大眾得到民主觀念的啓蒙，進而建立民主制度；另外，透過議會政治也能達到群眾運動的部分效果，一方面以議會的手段爭取社會權益的公平分配，二方面藉由在議會的表現，爭取社會對黨外的信任與認同。不論議會政治能夠發揮多少功能，如果台灣將來要走上民主政治，就必須要訓練民主的能力，要熟練議會政治的規範，要培養民主的風度和習慣，即就這個層次來講，我們不僅不應抹殺議會的價值，而且要大大加強培養議會政治的人才，因為沒有議會政治的人才，不可能會產生民主政治，而這種人才是長期培養的，尤其在我們這種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sup>137</sup>康寧祥認為：

走群眾路線和議會路線，需要兩種不同的個性和能力，但是這兩種要求都必需同時加諸於一個黨外從政人物身上，他由群眾運動走向議會，才能轉變角色，在原來的立場上扮演好角色。因此從事黨外民主運動，不能只走群眾路線而否定議會政治，也不能只走議會政治而否定群眾路線。……今天黨外走向議會路線，除了這是台灣走向民主政治必經的層次外，也是為了透過議會的手段爭取選民的權益，並藉由議會的表現使社會大眾能在黨外與國民黨之間做一比較，爭取他們的支持，並從事一種的社會教育。做一個黨外議員，當選不是目的，而是參與的途徑。<sup>138</sup>

由此黨外內部批判聲浪，可看出兩點意義：一是黨外新生代自主性的

---

<sup>136</sup> 康寧祥，〈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於康寧祥，《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83），頁146。

<sup>137</sup>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99-101。

<sup>138</sup> 康寧祥，《危機與希望》，頁146-148。

確立；二是康寧祥等黨外中生代的行事風格，與新生代間大相逕庭。表面上，新生代《深耕》雜誌的批康浪潮，似乎只是觀念或路線之爭，其實包含著權力之爭或派系之爭，甚至更涉及個人彼此間的恩怨。<sup>139</sup>這正說明著，黨外新生代對於自己在黨外運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期許和反省，他們不再甘心於跑龍套的角色，對於黨外「公職掛帥」與「山頭主義」的發展，採取批判，而逐漸形成自主的意識，這對於黨外未來的走向，起了一定的作用。當然，黨外「公職掛帥」與「山頭主義」的組織結構與特徵有其歷史的成因，由於：一、政黨在無法組成下，為建立支持民眾與黨外運動的關係網絡，地方反對人士只能採取個人服務處的凝聚方式，無法透過地方黨部展開組織化經營，久而久之，乃形成以公職人員為核心的個人服務處模式。二、由於組織體系偏重個人服務處式的形態，領導精英與重要幹部之間的關係，並無組織章程之類的正式規定，彼此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及權力結構，成了以各地方公職人員或領導精英為中心的山頭或公職主義。<sup>140</sup>因此，黨外新生代所要打破的即是「公職掛帥」與「山頭主義」的這種權力結構。

另外一點造成批康浪潮的原因，與康寧祥的行事風格很有關係。在1982年到1983年這一年多來，康寧祥始終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康寧祥任憑新生代如何繪聲繪影，分析其心態與作法，始終不願做正面回應，亦未在其雜誌上反駁或反擊。不可諱言，康寧祥具有一個政治家的風度。他一直到了1983年11月出版《危機與希望》一書，才針對黨外新生代對他的批評作出回應。<sup>141</sup>相對於康寧祥給人行事諱莫如深的感覺，黨外新生代卻

---

<sup>139</sup> 黃德福，〈民進黨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收錄於楊泰順編著，《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4)，頁161。

<sup>140</sup> 黃德福，〈民進黨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頁153-154。

<sup>141</sup> 在書中題為〈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篇中，康寧祥對《深耕》所作的批評有了詳細的分析與回答。康寧祥，〈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於康寧祥，《危機與希望》，頁135-151。

講究凡事說清楚，針對黨外運動本身，新生代認為乃所有從事黨外運動的人與事，不應該由少數人決定。1983年，再出發之後的第一次立法委員增額選舉中，康寧祥集團落選，使黨外勢力遭逢公職人員減少的挫折。如此結果消退了黨外勢力內「穩健派」大老的威信，此後在言論上挑戰國民黨的主角便轉移到「新生代」。新生代追隨當選的黨外公職人員發行雜誌，利用公職人員發揮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繼續挑戰言論禁忌。

#### （四）黨外雜誌的戰國時期與沒落

黨外雜誌除了要承受當局的審核取締外，還必須面對其他政論雜誌的競爭，尤其是1979年3月當局解除雜誌登記的禁令之後，大量黨外雜誌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各據一地，勃然而興，而這樣的傾向在1983年《前進》週刊創刊後尤為明顯，令黨外雜誌進入「戰國時期」。此時黨外雜誌由於出現市場重複，造成彼此激烈競爭，加上選舉與選舉之間的中空期，部分黨外新生代主導的黨外雜誌，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在編輯方針難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至於黨外雜誌「市場取向」所具體表現出來的結果，便是雜誌的「週刊化」，以及內容取向的轉變。

在雜誌的「週刊化」方面，此時黨外雜誌的出刊日期朝向「週刊」的型式發展，展現相當旺盛的攻擊火力。1983年3月14日創刊的《前進》週刊，是黨外有史以來的第一份週刊形式之刊物，以「最接近事實的新聞刊物」自我標榜，對黨外突破報禁跨出了第一步，而該創刊號的銷售情況極佳，於是帶動了日後《生根》等許多雜誌的跟進，宣告黨外雜誌開始進入「市場取向」、「新聞取向」的時代。不過，如此演變卻引發彼此間的激烈競爭，在此情況下，各黨外雜誌的特色風格漸失，已無心於運動路線、理念架構的探討。<sup>142</sup>

<sup>142</sup> 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在內容取向的轉變上，大致有三個面向：1、1970年代黨外雜誌偏重於政治意見、改革理想、關懷社會、批判傳統，甚至以教育民眾為編輯宗旨。但隨著檯面上政治人物的積極介入，有關政治人物介紹與政情分析的報導文章大幅增加，具有明顯「選舉掛帥取向」，使雜誌帶有若干選舉海報色彩，導致多數黨外雜誌在凸顯黨外候選人，批判國民黨同時，陷於選舉泥沼而不自知，甚至還刊登對黨外內部互相批判、攻訐的文字，自相殘殺；2、為了迎合社會大眾的口味，各家黨外雜誌社偏向於報導一些高層內幕、歷史秘辛，採取比以往更激烈、大膽的言論，經常大舉揭發前所未有的政治禁忌或權貴秘史，甚至開始販賣小道消息，挖掘執政黨與蔣氏父子的內幕，展開人身攻擊，指責他們生活糜爛腐化，巧用伎倆來維護既得利益。如此以爆炸敏感性文字吸引讀者，極盡扒糞、揭瘡疤之能事，可見其銷路掛帥的心態相當明顯。基本上，這對整個黨外運動的提升，並沒有太大的助益；3、黨外雜誌有明顯的「台灣化」傾向，例如勤於發掘非官方解釋的台灣史料、立即反應國際社會對台灣的任何舉動或討論、對中共評述文字的減少等等。<sup>143</sup>

黨外雜誌編輯內容的改變與強烈市場取向，已暴露出內部的困窘與危機。首先，雜誌社難以進行運動路線、理念架構的闡釋與宣傳工作，亦無法對政經、國際問題做深度分析；其次，社務結構傾向「私有化」，被政治人物拿來累積自身政治資源，經常遷就個人的利害與立場，將黨外雜誌界推向惡性競爭、相互推擠，甚至攻擊、詆毀立場不同的對手，掩蔽了理性的政策批判；其三，黨外雜誌缺乏本身的運動觀，誠如黨外人士蘇多所說：「肥了利潤，瘦了運動」。<sup>144</sup>在1983年至1985年之間的黨外雜誌，跟之前的《美麗島》、《八十年代》，或者是更早的《大學雜誌》乃至《自由中國》

---

1995，頁20。

<sup>143</sup> 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頁19-20。

<sup>144</sup> 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頁20。

等雜誌，以知識份子論政的編輯內容迥異，不可同日而語。

如此的轉變引起不少的批評，除了以執政者立場為主的文章之外，在《夏潮論壇》的〈黨外雜誌的昨日、今日、明日——總評黨外十本刊物〉一文亦提到：

總結黨外雜誌今日的情境，我們基本上認為從去年(1983)黨外在選舉中受挫到今年開春以後，黨外刊物競相以週刊化及市場取向化的現象，是在一個消費型態的政治及社會條件下，政治及社會資源的分配關係及其結構，所自然形成的強大支配與整合力量的必然結果。易言之，黨外雜誌實已在不自覺的客觀條件制約下，被整合到一條消費文化取向的不歸之路上去了。<sup>145</sup>

由於黨外雜誌的市場化與惡性競爭，終究讓黨外雜誌走向末路。雖然這些黨外雜誌不避諱敏感問題，常遭情治單位查扣、查禁，但是敏感的問題談論越久，其敏感度便相對減低，有助於提高民眾對政治禁忌的接受程度。從爭取言論自由的觀點來看，這情形在突破言論自由的限制上，仍有相當的正面意義，不得不說這是一項貢獻。由於黨外人士不斷透過雜誌與議會的發言，乃至於發動街頭群眾運動衝擊固有的黨國體制，迫使國民政府推動一連串的改革，終於讓台灣的政治體制產生變化。<sup>146</sup>1983 年到 1985 年間，黨外雜誌由戰國時期步向沒落的命運，而以黨外雜誌各據一方黨外人士，爲了找到另一片發展的新天地，便從原先的分裂轉爲合作，開始積極進行反對黨的籌設，因而有 1986 年民進黨的成立。

<sup>145</sup> 本刊編輯部，〈黨外雜誌的昨日、今日、明日——總評黨外十本刊物〉，《夏潮論壇》9：2 (1984.10)，頁 31。

<sup>146</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96-198。

## 第二節 政治自由主張：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

### 一、戒嚴與人權保障

#### (一) 社論觀點

1977年6月,《中國論壇》針對若干海外人士抨擊台灣的人權問題,在〈揮著人權的石斧〉社論中,認為這些「企圖損害中華民國的人」乃「共黨、共黨的同路人,以及一些『台獨份子』」,由於用盡方法而不得逞,企圖將人權當作武器,在海外揮舞叫囂。<sup>147</sup>整體而言,這篇社論有兩大中心思想:第一、爲了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寧」,某些人權必須受到限制,因而「戒嚴法」、「政治犯」等等是可以被容許的;第二、中華民國在面臨反共鬥爭的特殊環境下,仍能兼顧絕大多數「守法」國民的人權,其「成就」值得海內外一致肯定。

不過,到了1981年雙十節,該刊所推出的「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看法與主張」主題中,編委會聯名發表了〈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一文,對戒嚴、軍事統治等問題提出迥然有別的論點:

戒嚴的實施主要在排除民主憲政所遭遇到的立即威脅,所以在性質上是緊急時期的特殊軍事統治措施,但主要的目的則在排除脅,謀求憲政常軌的恢復。根據戒嚴法的規定,在戒嚴的接戰區,無論民政、司法皆可由軍事機構取代或指揮,憲法所保障各項人民自由,亦可隨時以命令限制,因之,戒嚴的目的既在憲政常軌的恢復,當然應儘可能配合情勢,不使自身即成爲對憲常軌的妨礙。

最後,這篇由編委會學者群集體擔綱的文章更進而呼籲政府解除戒嚴:

我國宣布戒嚴已三十餘年,政治情勢已有若干的變遷,我們覺得政

---

<sup>147</sup> 社論,〈揮著人權的石斧〉,《中國論壇》42(1977.6.25),封面裡。

府應對戒嚴的實施作一徹底的檢討，原則上，應勿再使軍事機關執行民政及司法的業務，而在本島宣布解嚴，以恢復憲政。實際上，我國憲法已授行政機關處理緊急處分權，且毋須立法機關的事先通過或事後追認。有此授權，行政機關已足能因應特殊的緊急情勢，且在運用上尚較戒嚴為靈活易行。我們今日各級政府及各級法院皆能正常行使職權，這已充分表示戒嚴已不符實際的需要了。<sup>148</sup>

1986年民進黨成立、蔣經國對外表示將儘速解除戒嚴令以後，《中國論壇》才又對政府制定或修改「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以及「人民團體法」等所謂動員戡亂時期三大法的問題略表意見。1987年6月，該刊發表一篇〈審慎釐訂集會遊行法規〉的論壇，建議政府認識此種新客觀情勢，因勢利導，絕不可不分青紅皂白，以維護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為藉口，制定嚴苛法規，以免被民眾攻訐渲染成「換湯不換藥」或「越解越嚴」。<sup>149</sup>

1987年7月，《中國論壇》以一篇名為〈解嚴後的社會〉的論壇文章，希望我們的社會在正常法律體系下正常運作，以維持社會秩序，不過，「這種秩序應該是開放的，只要不使用暴力，任何國民都可以想他所該想的，說他所願說的，做他所願做的；沒有思想犯，也沒有政治犯。」<sup>150</sup>「行政體系只有合法的特權，不能利用特權去壓迫人民」。<sup>150</sup>接著該刊在同年12月的〈解嚴後的第一個光復節〉論壇表示：「我們很不忍心看到解嚴這樁大好的舉動，不幸變質成為『解組』的前兆；我們更不願意讓保守勢力用解嚴後的『失序』現象，當作要求一進三退的藉口。」<sup>151</sup>

## （二）個別作者觀點

<sup>148</sup> 楊選堂等，〈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7-11。

<sup>149</sup> 論壇，〈審慎釐訂集會遊行法規〉，《中國論壇》281（1987.6.10），封面裡。

<sup>150</sup> 論壇，〈解嚴後的社會〉，《中國論壇》284（1987.7.25），封面裡。

<sup>151</sup> 論壇，〈解嚴後的第一個光復節〉，《中國論壇》290（1987.10.25），封面裡。

## 1、 李鴻禧

1979年12月，李鴻禧在〈人權理念的回顧與前瞻——慶祝國際人權日〉對台灣的長期實施戒嚴，以及「特務統治」所造成的侵奪人權現象，如此論述：

……對於人權最具直接的影響者，還是治安及情報機關之肥大化。現代國家最顯著之特徵，乃是利用世界性的緊急狀態之持續，制頒緊急權立法，並擴張治安及情報機關以強化其權力。……在軍事獨裁國家或民主政治仍未發達的國家，則更借為持治安名義，制定繁多蕪雜的特別治安法規，對思想、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都加以重重限制。這類所謂「治安立法」，罪刑構成要件每每規定的不具體明確，俾使情報機關借條文涵義廣泛、條件曖昧之處，濫用治安權力，使民主憲政之保障人權機能，變形變質，終至崩蝕潰腐，喪失殆盡。

在文章的最後，李鴻禧衷心呼籲說

我國為順應世界人權思潮，仿襲西方歷經數百年孕育而成之體制，於制頒之憲法中釐定頗為詳密之自由與人權條項。但行憲三十年來，格於戡亂戒嚴之現實，以及國人對人權理念未能正確認識，保障基本人權理念之宏揚，保障基本人權制度之建立，仍有待吾人多方的努力；尤其人權思想的培育，更不可輕忽。<sup>152</sup>

1985年10月，李鴻禧在〈戰後台海兩岸推展法治之比較——兼談法學底研究〉中，將長年戒嚴體制對法治、人權之戕害，整理如下：

……我們基於戡亂和行憲的雙重錯綜任務，長年實施戒嚴體制；而依目前情勢，何時解嚴又難以預料。在戒嚴的緊急體制下，國民的

---

<sup>152</sup> 李鴻禧，〈人權理念的回顧與前瞻——慶祝國際人權日〉，《中國論壇》101（1979.12.10），頁21-27。

基本自由與人權，像思想與價值之自由，言論、講學、著作與出版之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祕密通訊之自由，集會與結社之自由，罷工、集團交涉之自由，乃至於身體自由和不受軍事審判之自由等等；現實上都不能不受到相當的限制或束縛。與西方英、美、法、義等國，固然難以相比；較諸東方之日本、印度、香港等也落後不少；甚至恐怕也比不上烽火不熄的以色列或黎巴嫩。值得國人冷靜而客觀地檢討省思一番。<sup>153</sup>

到了解嚴之後，1987年9月，李鴻禧特撰〈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長文，對戒嚴時期人民身體自和不受軍事審判之自由作了一番回顧，同時對解嚴後三大法——國安法、人團法和集遊法之制定表示疑慮。李鴻禧指出，不可否認的，在戒嚴後期之一、二十年間，台灣情治機關濫用國家權力、嚴重危害人身自由之情形，頗有改進；過去人民遭受祕密逮捕之情事，已少有傳聞；但是仍有諸多不如一般民主憲政先進國家之處。即以美麗島事件被告的刑求問題、陳文成案、江南命案等近七、八年來戕害人權甚鉅之事實而言，一方面導致國內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另則引起國際社會暨人權組織的批評。所幸這一、二年來，政府大幅假釋、釋放叛亂犯，1987年又宣告結束戒嚴體制，普遍獲得各種國際人權組織的讚揚。其次，雖然軍事審判因無戒嚴體制之依據而援引適用，當然不會再發生昔日侵犯基本人權的問題；可是綜觀國安法及當時研擬中的其他二法，李鴻禧說到：

……這一「國安法」在解嚴後會扮演何種憲政角色，是值得國人注意的。目前政府執政黨研擬中之「人民團體組織法」、以及「集會遊行法」，是否會因條文規定過苛，甚至違反憲法保障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之意旨，使解嚴後人民之集會結社自由，與戒嚴時期一樣受到

<sup>153</sup> 李鴻禧，〈戰後台海兩岸推展法治之比較——兼談法學底研究〉，《中國論壇》241

諸多限制；這是民眾應多注意的。同樣的，在有部分反對人士，認為以「國安法」代替「戒嚴法」是「換湯不換藥」，甚至懷疑「人民團體組織法」及「集會遊行法」之釐定，會使比「戒嚴」更「嚴」的情況下，政府執政黨對今後制定限制人民基本自由與人權之法律，更應臨淵履冰、心懷敬謹；以免影響民眾之信賴，失去民眾之支持。<sup>154</sup>

## 2、 林嘉誠

1981年1月，林嘉誠在〈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首次就戒嚴體制作了若干評論：

由於台灣地區宣布戒嚴長達三十餘年，目前社會秩序尚稱良好，未有緊急戰事發生；因此，為了確保人民自由權，社會各界對於戒嚴問題，見仁見智意見不一。戒嚴問題與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均密切相關，而上述自由又是民主國度人民最基本自由，執政當局如何在兩者之間作最適當的安排，而真作保障自由權，實有待虛心檢討。<sup>155</sup>

1984年2月，林嘉誠在〈為政治權力運作的制度化構思〉表示，台灣地區長達三十餘年戒嚴，根據戒嚴法制許多行政命令，人權與治權的區分顯然傾向後者。以我國政經環境，應有能力配合人權擴大化的世界潮流，放寬自由權範圍，並樹立自由權的限制由人民代表制定法律規約之，非有特殊理由不要輕易限制自由權，治權的大小由人民代表立法授權，治權嚴

---

(1985.10.10)，頁196。

<sup>154</sup> 李鴻禧，〈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中國論壇》287(1987.9.10)，頁29-35。

<sup>155</sup> 林嘉誠，〈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中國論壇》127(1981.1.10)，頁6。

守分寸，不要過分逾越。<sup>156</sup>

林嘉誠對於戒嚴體制下法令常態化之重視，具體表現在解嚴前後的規範研議上。1987年5月行政院完成「集會遊行法」草案，接著林嘉誠在6月便寫了一篇〈集會遊行的立法規範問題〉，揭櫫集會遊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立法原則，同時介紹國外實例，藉收攻錯之效。林嘉誠認為：

我國現行戒嚴法、違警罰法、刑法妨害公共秩序罪、妨害公務罪，均對於集會限制有所規定。可是上述規定，均十分含糊，授予行政部門太大裁量權，反而使法令無法有效執行。未來立法方向，除了考慮技術可行性之外，對於集會自由的本質，集會自由與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相關性，均宜一併思考。……由外國實例可知：一、除明顯妨害公共秩序，否則不得禁止黨外集會遊行；二、核可機構不得有太大裁量權；三、一視同仁不因人而異；四、肯定集會自由價值及其重要性；五、立法時的基本共識十分必要。<sup>157</sup>

### 3、 胡佛

1979年10月，胡佛在「如何建設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座談會上對戒嚴問題有所檢討，尤其是平民適用於軍事審判法的情形。胡佛認為憲法中既已規定「緊急命令權」的行使，來應付緊急狀態，另在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又規定「緊急處分權」的行使，凡是遇到國家有緊急事故，無論經濟的、政治的都可以引用；有了這個武器在手中，已經足夠應付緊急狀態了，非必要事事運用「戒嚴法」。就目前情況而言，胡佛認為凡是觸犯刑事法令的案件都可以交由法院處理。他說到：

當 Martial Law 宣布時，可停止人身保護令狀，處戰亂時期一般司法審判無法進行，軍事審判才可考慮，這祇是一個不得已的臨時措

<sup>156</sup> 林嘉誠，〈為政治權力運作的制度化構思〉，《中國論壇》201（1984.2.10），頁29。

<sup>157</sup> 林嘉誠，〈集會遊行的立法規範問題〉，《中國論壇》281（1987.6.10），頁37-39。

施，只要司法機關仍可審判或能恢復運作，人民即不能由軍事機關去審判。<sup>158</sup>

1984年10月，胡佛在〈政治的高調與低調〉表示：

我們要在憲政的基礎上，建立國家的法治體制。這樣的體制是將憲法放在最高結構層次，任何有違憲法的規定，我們皆覺得會破壞整體政治結構的完整，不僅會造成行為標準的混淆，而且會一直往下影響到特權的流行，以及決策功能的紊亂與低落。我們主張對戒嚴法的實施加以檢討，並不是為了改善國際的形象，而實在強化政治結構的功能，使真正發生規範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產生社會的公信力。<sup>159</sup>

#### 4、張忠棟

1984年6月，張忠棟於〈統一之前我們如何自處？〉對戒嚴提出檢討：

我們有憲法，我們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憲政，和中共的獨裁極權全然不同。然而不容諱言的，在過去三十幾年之中，由於非常時期的理由，戒嚴一直實施，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限制，……和民主憲政的目標有違。時至今日，問題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們必須嚴正指出，政治沒有制度，就會造成政治腐化和政治無能，就會造成政治的動盪，野心分子和外在的敵人都將乘虛而入。唯有民主憲政的確立，我們的政治才會走上軌道，我們才会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我們才可以維持長期的政治穩定。也唯有民主憲政的確立，我們才可以超越共產極權，為中國未來統一提供最理想的模式。<sup>160</sup>

1988年6月，張忠棟特撰〈錯誤的戒嚴情結〉一文，原因是自解嚴以

---

<sup>158</sup> 胡佛，「如何建設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97（1979.10.10），頁45。

<sup>159</sup> 胡佛，〈政治的高調與低調〉，《中國論壇》217（1984.10.10），頁19。

<sup>160</sup> 張忠棟，〈統一之前我們如何自處？〉，《中國論壇》217（1984.10.10），頁10。

後，街頭示威活動增加，部分人士眼看社會出現失序現象，不免憂心忡忡，因而主張再行局部戒嚴。張忠棟對此頗不以為然：

解除戒嚴不但是蔣先生的決定，最後也是國民黨的政策。四十年的戒嚴，已經使人民感到相當厭倦，最近幾次選舉之中選民的逐步轉向可以窺其端倪，戒嚴終於解除，民主憲政決定全面實施，實為國民黨再出發、再創造的機會。然則戒嚴解除不久，國會改選猶無具體方案，地方自治法制化還看不見頭緒，大家對於民主憲政究竟如何推行還在焦慮之際，忽然又說有人主張恢復戒嚴，怎不令人會問：國民黨究竟要何去何從？國民黨要人民支持，是要支持你的戒嚴呢？還是支持你的民主憲政？<sup>161</sup>

### （三）綜合評析

綜觀本節所述，《中國論壇》在 1977 年 6 月發表的〈揮著人權的石斧〉社論，對戒嚴、政治犯等問題之辯解不遺餘力，恰與該刊早期的「歌功頌德」風格相符。1979 年，李鴻禧與胡佛率先就特務統治和軍事審判之濫用作了委婉批評，揭開《中國論壇》檢討戒嚴體制之序幕。不過，大體而言，在 1987 年解嚴之前，《中國論壇》除了 1981 年雙十節編委會聯名呼籲當局解除戒嚴的文章外，其他社論並未多作著墨；而作者群裡則以李鴻禧、林嘉誠、胡佛和張忠棟等人均有為文探討。解嚴以後，有關國安法、集遊法和人團法的研擬爭議，《中國論壇》社論僅略表意見，而以李鴻禧、林嘉誠二人較有具體批判。至於張忠棟則對部分人士「恢復戒嚴」的想法予以嚴正駁斥。

---

<sup>161</sup> 張忠棟，〈錯誤的戒嚴情結〉，《中國論壇》305（1988.6.10），頁 1。

## 二、新聞管制與言論自由

### (一) 社論觀點

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在戰後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國民黨當局對質疑政權合法性、反共基本國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理想，或是具有台獨傾向的言論，都絕不寬貸。官方透過報禁、新聞檢查達到管制人民言論之目的，使得新聞自由始終未能具體落實。<sup>162</sup>解嚴和報禁開放之後，言論空間雖較昔日擴大，然而，國民黨政權長久以來對傳播資源(尤其是電子媒體)的壟斷、介入和干預，仍時有所見。這不僅與民主社會中，媒體應為社會公器之原則相違，也阻礙了政治改革的腳步。<sup>163</sup>如何謀求傳播資源的重新、合理分配，實為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過程中待突破的關鍵問題。

所謂「報禁」，有廣、狹二義，前者包括「限證」、「限張」和「限印」，後者僅指「限證」，實施日期為 1951 年 6 月 10 日，一般通稱的報禁即為此義。<sup>164</sup>過去政府係以「節約用紙」、「報紙家數已達飽和」、「避免惡性競爭」、「戰時需要」等理由，並援引若干被評為違憲或過時的行政命令與法規，來回應外界的質疑，但真正的原因毋寧是「防止『不當言論』之廣泛流通」。<sup>165</sup>長期實施報禁的結果，一方面兩大報系寡頭壟斷了七成市場，另則保護了黨政軍所控制的多份報紙，而其違背憲法所載：「人民有言論...出版之

---

<sup>162</sup> 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252。

<sup>163</sup> 鄭瑞城，〈一九九〇年台灣十大問題評析(九)——傳播媒體的問題〉，《自立晚報》(1991.3.10)，第 17 版。

<sup>164</sup> 李瞻，〈我國「報禁」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收錄於氏著，《新聞學原理》(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8)，頁 343-386。

<sup>165</sup> 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頁 87-100。

自由」，殆無疑義。<sup>166</sup>

1981年，《中國論壇》第一四五期主題「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看法與主張」中，該刊編委會曾經發表〈「報禁」應予開放〉一文。首先他們自民主憲政的精神闡釋報禁之害，「如果一個國家不能讓私人自由的辦報，就無法有力的說服他人，這個國家是新聞言論自由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不具備新聞言論自由，也就不能有力的說服他人這個國家是實施民主憲政的。」亦即，剝奪或限制人民知的權利與大眾傳播的權利是很難使人相信，這樣可以與民主憲政並行不悖的。對於政府所持諸多理由，諸如「報紙數量已經夠了」、「節約」、「避免形成淘汰性的競爭」，他們則以市場供需、加強官方報紙經營與政府詞窮逐一批評。報禁開放後所可能出現的不當言論流傳問題，這群學者的看法是：

民主法治是不怕批評的，民主法治是不怕考驗的，只要政府能朝民主法治的方向邁進，反對派的批評，便如海德公園肥皂箱上的批評，只是民主政治的插曲。況且這樣的批評也是政府施政的鏡子，有助於政府與公意的溝通，政府施政的改進，也有助於政府化解民瘼民怨，爭取民心。…反之，如果政府只是藉報禁來遮掩批評，批評便會流為耳語運動，便會以訛傳訛，造成更大的損害，也使政府無法在耳聰眼明的有利地位上防範這樣的損害。

顯然他們主張以疏導代替防堵的方式來面對反對人士的批評，以免民怨潰決，後果反倒不堪設想。而從「民主法治」一詞亦可嗅出這篇文章的「折衷」味道：一方面基於民主理念，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另一方面則允

許政府取締違法言論與掌控媒體，並訴諸社會公意制裁：

無論如何，政府擁有司法權力，可以防衛與制止不當的新聞言論侵害；無論如何，政府擁有足夠的宣傳工具與大眾傳播工具，可以對

---

<sup>166</sup> 李金銓，〈建立報業的遊戲規則〉，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129-140。

抗不當新聞言論；無論如何，這個社會已是開放的，有相當高知識水準的社會，不當的新聞言論即令可以譁眾也不能取寵，社會大眾已有足夠的獨立判斷能力，而這能力可以使不當新聞言論受到公意的制裁。<sup>167</sup>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報》系老闆王惕吾早從 1977 年起便倡言開放報禁，<sup>168</sup>而就在《中國論壇》第一四五期刊出上文前不久，時任《聯合報》總編輯的張作錦也曾以該報為例，分析限印政策下對報業帶來的財務損失。<sup>169</sup>由此看來，《中國論壇》在此時主張開放報禁，固然是自由派學者崇尚民主的象徵，但未嘗不是有該刊所屬報系既得利益的呼應和支持。

台灣的新聞檢查在戒嚴時期是由行政部門和軍方的警備總部共同執行，而其依據則是一些「疊床架屋，重複累贅」的法規。當中，「懲治叛亂條例」在早年曾使許多媒體工作者以「叛亂」入罪，造成傳播界的白色恐怖；<sup>170</sup>而「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亦頻頻為官方引用，使得政論雜誌遭到停刊、查禁或扣押者不計其數，發揮甚大的控制力量；1985 年起，當局較傾向於循司法途徑處理政治性雜誌的言論問題，但因法院未能脫離國民黨影響而獨立審判，涉案的反對派人士每每以「誹謗罪」繫獄。<sup>171</sup>1981 年，《中國論壇》在前述那篇〈「報禁」應予開放〉文章中，亦曾批評雜誌的取締問題：

……雜誌內容在那一種情況下應予取締，現在事實上只有空泛的原則，尤其取決於有關方面的自由心證式的裁決，這是很不妥當的。

<sup>167</sup> 楊選堂等，〈「報禁」應予開放〉，《中國論壇》145 (1981.10.10)，頁 30-31。

<sup>168</sup> 王惕吾，「開放社會中的新聞事業」座談會發言，《中央月刊》9：11 (1977.9)，頁 26-27。後來此文經 1983 年 12 月號《聯合報系月刊》轉載，可見代表該報系的既定立場。

<sup>169</sup> 張作錦，〈談報紙的限張和限印〉，《聯合報》(1981.7.13)，第三版。

<sup>170</sup> 相關案件可參見南方朔，〈我們曾有過一個黑暗年代——新聞文化人被政治壓迫的那段歷史〉，《新新聞週刊》98 (1989.1.23-29)，頁 68-70。

<sup>171</sup> 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頁 256、259。

更可疵議的是，取締雜誌不是管理雜誌登記發行的主管機構，而常出自治安機關之手。這便不是法治的常規。……不祇關係到言論自由的大問題，而且關係到標準判斷問題，……除非牽涉到「立即而顯現」的危險，雜誌的取締是極易形成行政權力的濫用，至於如果雜誌內容犯了誹謗罪，那也是應循由司法途徑來解決的。<sup>172</sup>

1983年，《中國論壇》有感於海外台獨人士對國民黨政權的嚴厲批判，而當局卻又本著「報喜不報憂」的原則，多方對國內大眾隱瞞，於是發表〈新聞言論自由的問題〉社論，指政府低估了本身獲得公意支持的「資本」，也低估了大眾審思明辨的能力：

……現在有一些「台獨」分子及其同路人，在海外散佈攻訐詆毀執政黨與政府的言論與消息，其荒謬、惡毒、陰險、歪曲、虛偽、會使任何稍具常識、稍懂實情、稍具良知，稍為客觀的人，都為之反感厭惡，排斥駁斥。但是執政黨及政府都對之多方忌諱掩蓋，不肯、不敢使民知之。只是擔心大眾知道自己挨了罵，而不能讓大家知道罵的人包藏禍心，別具陰謀，強姦民意；也不能讓大眾知道自己受了委屈冤枉。這實在是非常失策，非常不聰明的做法。

其次，《中國論壇》有也重申「保障合法，取締非法」之主張：

人民有言論自由，憲法有明文規定，從而，人民批評時政，表達主張，執政黨與政府雖然可以少順我者喜之，逆我者惡之，但不宜使用任何直接間接的手段，干預、妨礙，限制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也不宜使用權力，通過任何方式打擊發表言論者，使人懼於發表言論。……但是，如果發現有任何違反法律、危害國家社會安全與全民整體利益的言論，政府應拿出魄力，斷然訴諸於法與公意的裁判。

173

<sup>172</sup> 楊選堂等，〈「報禁」應予開放〉，《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31。

<sup>173</sup> 社論，〈新聞言論自由的問題〉，《中國論壇》190(1983.8.25)，封面裡。

1984年，國民黨新任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在新聞界的歡迎茶會上表示，他希望今後能使傳播機構成為民眾的喉舌，使執政黨政策與民意結合，為謀求全民更大的幸福而紮根。《中國論壇》社論〈容忍才有理性，自由才能創新，平等才可溝通〉，即以黨內外的溝通為例，再度對報禁表示質疑：

……溝通必須有平等的立足點，言論方面也要有公平的機會，方能收效。……今天黨外雜誌的言論走偏鋒，如平心靜氣的檢討，不能不說，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主要是因我們在言論方面缺乏公平的機會所導致。假如沒有報禁，如此言論品質，如何能與人競爭？<sup>174</sup>

1987年2月5日，時任行政院院長的俞國華指示新聞局，對於報紙的登記與張數應以積極的態度重新加以考慮，在兼顧新聞自由與報業善盡社會責任的原則下，儘速訂定合理的規範或辦法，以促進我國今後報業的發展，邁向一個資訊健全的新時代。實施幾達四十年之久的報禁，終於在各方期盼下宣告解除。《中國論壇》隨後發表〈「報禁」開放的省思〉社論，針對新聞自由的開放程度及其管理問題，進行一番思考。為了盡可能兼顧新聞自由、社會責任與國家安全，該刊指出：

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新聞業應為與立法、司法、行政並列的「第四權」，但以往置於行政權之下的狀況，事實證明已是弊多利少；今後應多以立法規範和司法處理，形成種四者相互制衡式作用，才是健康發展。當然，「三權」也好，「四權」也好，最後和最高的「權力」應是國民，未能作此一權力結構安排和不能尊重民權，則民主自由都屬空論。……大家也要認識到，不要太迷信新聞自由就是政治民主的保證。……有許多國家原來非常有新聞自由，政治變化的結果，新聞自由也被扼殺；發展能均衡和齊頭並進，則政治民主與新聞自

---

<sup>174</sup> 社論，〈容忍才有理性，自由才能創新，平等才可溝通〉，《中國論壇》215 (1984.9.10)，封面裡。

由能相得益彰，成良形循環。<sup>175</sup>

《中國論壇》對驟然解禁後的新聞自由遠景仍存戒慎之心，唯恐成爲脫疆野馬般漫無紀律，因此主張由新聞界與立法、司法、行政四者相互制衡。該刊所標舉的尊重「民權」理念，亦即「閱聽人」權益，的確甚爲緊要。過去閱聽人對報業所能產生的影響可說是相當有限，原因出在雙方關係僅止於被動消費與提供資訊。因此有學者建議報禁解除之後，閱聽人應設法形成各類型壓力團體，或積極運用、參與既存之相關壓力機制(如新聞評議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來制衡報業。<sup>176</sup>

## (二) 個別作者觀點

### 1、 李鴻禧

1977年，李鴻禧展望台灣民主政治前途時曾經表示，如果我們能讓報紙的篇幅加多，開放報禁，使輿論的功能擴充，讓人民更能在開放的社會多發表意見，則各級政府裡官吏顛預、倨傲的官僚作風，必然會被輿論洗滌殆淨。<sup>177</sup>雖然當時李鴻禧所主張的開放報禁，僅著眼於增張而未觸及更重要的限證問題，但畢竟是最早在《中國論壇》提出這項呼籲者。在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發展的一大特色，便是黨外雜誌的勃然而興。由於黨外雜誌不避政治禁忌，動輒觸怒當道，屢遭查禁。1984、1985年間，接連發生多起相關訴訟案件，其中包括親國民黨的教授馮滬祥控告黨外《蓬萊島》雜誌案、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胡益壽控告黨外市議員林正杰案、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關中控告《雷聲》雜誌發行人雷渝齊案等，深受各界關注。

<sup>175</sup> 論壇，〈「報禁」開放的省思〉，《中國論壇》274(1987.2.25)，封面裡。

<sup>176</sup> 參見鄭瑞城，〈公眾的角色與報業發展〉，《聯合報》(1987.9.16)，特別第二、三版。

<sup>177</sup> 李鴻禧，「當前問題的探討：(一)民主政治的前途」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49(1977.10.10)，頁12。

李鴻禧便於《中國論壇》發表〈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長文，除了以國外的類似案例作借鏡，釐清誹謗之界限外，更力陳言論出版自由之重要性。他表示，在民主共和之政治體制下，主權平等地屬於全體國民，不再專屬於某個人、家庭、集團、黨派或階級。執政黨派或在野黨派、政府或民眾、支持現行政治體制之思想理念者或其反對者、各種不同宗教信仰者，以及抱持各種不同思想價值的人，都應享有言論、出版等意見自由，並應以之為不可或缺之基本人權或政治權利。李鴻禧進而指出：

……有些開發中國家，……執政者卻濫用「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或「國家安全」等涵義曖昧、範圍廣泛之「概念」，來堵塞人民之言論出版自由。他們常抽象泛稱「異己意見」為妨害「社會秩序」、有礙「公共利益」或危及「國家安全」，而使之沈默或消滅。……使言論出版自由徒具形骸、名存實亡。……民主憲政上未聞因保障言論出版自由以致國家社會衰亡之史例，但是因壓制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以致民心離去，導致政權覆亡之史實，卻是罄竹難書呀！<sup>178</sup>

其次，李鴻禧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雖然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不過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人民之自由權利，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得以法律加以限制。然而，不但「增進公共利益」之涵義廣泛；而「維持社會秩序」概念之外延，更是無垠無涯；尤其在現代國家中，政治、社會、經濟或軍事都是變遷日亟，戰後世界幾乎是在危機連續狀態下，各國經常都有各式各樣的緊急危難，「避免緊急危難」之概念，尤難以界定，容易被濫用或惡用來限制自由與人權；若再加上「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這

<sup>178</sup> 李鴻禧，〈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上)〉，《中國論壇》226(1985.2.25)，頁37-43。

種可以包羅萬象之條件；則何事能與「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等四條件完全沒有關連？李鴻禧說到：

……我國一方面，長年實施戒嚴體制，而出版法對言論出版之管制尺度，遠比一般民主憲政先進國家嚴格；出版物之查禁取締並非透過司法審判，係由一般行政機關實施；甚至軍事戒嚴機構，也可依據相關戒嚴法律或命令，以抽象曖昧之理由，查禁取締出版物；言論出版自由頗受限制。同時另一方面，我國法院並無日本法院析擁有之「違憲審查權」(Judicial Review)，對法律之限制自由權是否違憲，無權審查……<sup>179</sup>

言論出版自由，乃是一切形式的自由之母，也是其他自由不可或缺之前提條件，李鴻禧希望國人能力謀改進，貫徹民主憲政，亦即呼籲當局莫因政治意見之相左而壓制反對人士。日後當李鴻禧憶及這段黨外雜誌的取締風波時指出，由於此類雜誌專門以揭發政治人物之家世、歷史、私生活，甚至刻意予以渲染醜化、譁眾取寵，既未能客觀真切批評時政，又無益於推展民主憲政與政黨政治，僅熱中渲染醜化政府執政黨及其中樞人物，自然會引起政府想加以防堵取締之意欲。

不過，根本問題在於政府長年戒嚴，使軍事情治機關之警備總司令部，常常援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所賦予之行政命令權力，輕易隨意以「混淆視聽」、「打擊民心士氣」等含義曖昧的理由，查禁反對黨派之政治評論雜誌。這種作法必然刺激反對黨派雜誌而提升其激烈抨擊攻訐程度；相對的，軍事情治機關就再運用其國家緊急權力，甚至逾越應守的憲政限制，惡用諜報手段事先密採書刊雜誌內容，在書刊雜誌印刷裝訂之前，就到印刷廠查禁刊物。

---

<sup>179</sup> 李鴻禧，〈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中)〉，《中國論壇》227 (1985.3.10)，頁 55。

李鴻禧強調，縱使依前舉「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行政命令，得以查禁之書刊必須是其內容「與軍事有妨害者」；但衡諸事實，軍事情治機關所查禁者，類多為評論政治之在野黨派雜誌，內容少有涉及軍事、更談不上「與軍事有妨害」，而且查禁亦過份頻繁。結果使得在野黨派雜誌批評時政更是激烈，惡意醜化諷罵的內容增加，形成壓制與反抗的兩極對抗。情治機關為逾越法律之取締，在野黨派雜誌也不依法而刊印發售，雙方講暴力、反理性惡性循環不已。李鴻禧雖然增加對黨外雜誌內容的若干批評，但是其析論主要目的在批判國民黨政府濫用戒嚴時期的新聞檢查。李鴻禧總結指出：

不可否認的，在野黨派之雜誌內容足以訾議之處當然不少；可是，軍事情治機關偏頗政府執政黨，幾乎全盤地查禁在野政治黨派之政論雜誌，扼殺人民之言論出版自由，更受各方面指責詬病。在國內增多了人民對政府執政黨之怨懟不信，在國際斲傷了國家與政府形象，留下深厚的不良後遺症。<sup>180</sup>

解嚴以後，戒嚴時期管制出版物的若干法令自然失效，警總也退出新聞檢查的執行工作，連同隨之而來的報禁開放，均標識著台灣新聞自由的一大躍進。不過，「懲治叛亂條例」及「妨害軍機治罪條例」中規範「內亂」、「洩漏軍機」等罪的條文，依舊成為行政部門或軍方取締言論之憑藉，相關案件仍多，備受各界非議。例如《自由時代》系列和《新潮流》雜誌，自解嚴、創刊後屢遭官方查扣停刊，理由幾乎全是「宣傳台獨意識」。<sup>181</sup>直到1991年5月「獨台會」案爆發，在「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民意壓力下，施行達四十餘年之久的「懲治叛亂條例」方告廢止。此外，出版法與廣播

<sup>180</sup> 李鴻禧，〈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中國論壇》287 (1987.9.10)，頁33。

<sup>181</sup> 相關案例詳見游賢達，〈查扣的手由哪裡伸出？〉，《新新聞》周刊124 (1989.7.24-30)，頁20-21；董孟郎，〈跑軍事新聞的記者，請你注意〉，《新新聞》周刊124 (1989.7.24-30)，頁22-23。

電視法也是今日亟須檢討的法規。李鴻禧即表示，由於我國現行的出版法、廣播電視法等，對言論出版自由之限制較一般民主國家嚴苛得多，解嚴後應否修改或廢除，抑或政府新聞機關應本解嚴後憲法常態，對言論出版自由之侵犯敬謹其事、自惕自誠，值得我們深思、實踐。<sup>182</sup>

根據 1986 年傳播學者的調查研究指出，國人最常接觸的兩大媒體是報紙與電視，<sup>183</sup>而國民黨政權對這兩大媒體的掌控由來已久。在報禁實施期間，台灣共有三十一家報紙，其中國民黨黨營的是《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等五種，省政府發行的為《台灣新生報》和《台灣新聞報》，而軍方則掌握《青年日報》、《忠誠報》、《台灣日報》等七家。由此不難發覺，黨政軍所控制的報紙數目接近囊括一半。其次，台灣適合廣播、電視使用的頻道資源，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由國防部管理使用，剩餘的頻道資源也先後撥給既有的廣播及電視台發展其網路系統，阻絕了新電台的成立。以電視而言，自 1971 年起即維持三家不變，當中，中視為國民黨黨營文化事業，台視的股份裡面以省政府所屬金融行庫居多，而華視的資金則泰半來自國防部；雖然三台皆有部分民股，但大都為黨政關係良好的企業界名人或退役將領持有。易言之，國內的電視台係由黨政軍勢力所聯合壟斷。

國民黨對媒體的操控有其長久的歷史，該黨總裁蔣介石當年便是將報業與廣播電視定位成政府的宣傳者。<sup>184</sup>過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即文工會)與各報總編輯、採訪主任之間關於新聞處理的電話聯絡，則近乎命令式的干涉。<sup>185</sup>由此可見戒嚴時期，文工會基本上是新聞與言論尺度

<sup>182</sup> 李鴻禧，〈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頁 34。

<sup>183</sup> 潘家慶、王石番、謝瀛春，〈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1986)〉，出自《新聞學研究》第四十集(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8)，頁 70-74。在該研究的 1487 位受訪者中，每天都收看电视的民眾佔 66.5%，每天都閱讀報紙者有 64.7%，而每天都收聽廣播、閱讀雜誌的人則僅為 22.5%和 2.7%，可見民眾最常接觸的媒體是電視和報紙。

<sup>184</sup> 李瞻，〈國父與總統蔣公的傳播思想〉，收錄於氏著，《新聞學原理》(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8)，頁 15-27。

<sup>185</sup> 楊憲宏，〈黨器官宣傳員與愛國〉，《台灣春秋》2：5 (1990.3)，頁 224。

的最後決策單位。解嚴之後，媒體多不願再扮演宣傳者的角色(官方直接掌控者除外)，又因新聞局接收原屬警總的部分新聞管制工作，權力大增，相形之下，文工會的權力位階因「於法無據」而逐漸下降。不過，三家電視台仍為國民黨所壟斷，文工會對於言論自由的管制仍有極大主控權。<sup>186</sup>

對於台灣傳播資源分配嚴重扭曲一事，李鴻禧也曾作了評論，他指出，在戒嚴時期，黨政軍獨占或壟斷電視、廣播之所有權，同時直接或間接地大量經營報紙，再加上備受質疑的報禁政策，當然會造成壟斷大眾傳播事業、妨害大眾傳播自由之結果。而其諸多理由，如「頻道過分密集、難以撥出新頻道」等亦屬推諉搪塞之說辭，當然沒有多少說服力。此外，他特別對軍方大力撥用國防經費，來擴張報紙雜誌、電視廣播事業之經營嚴加抨擊。由於憲法在第一三八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黨派之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憲法第一三九條也明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因此李鴻禧在 1987 年時指出，既已解除戒嚴，報禁也開放在即，如何連同電視、廣播一起解禁，如何約束軍方只在軍營辦報、並應遵守憲法第一三八、一三九條規定，超然黨派之外，是值得政府、執政黨、軍方與民眾，客觀冷靜、嚴肅審慎加以檢討改進的。<sup>187</sup>又因軍方強調「對敵鬥爭」的言論意識，如早年《自由中國》言論事件、「鄉土文學運動」、「圍剿黨外言論」事件，即均由軍方發起，肅殺之氣歷經四十年不變。李鴻禧的上述疑慮，顯然其來有自。

## 2、 林嘉誠

1979 年 7 月，林嘉誠在〈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中指出，政治消息傳播型態的政治參與，在競選期間以外是最普遍的政治參與，而民主國家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其目的便在於確保此種型態的政治參與

<sup>186</sup> 楊森，〈「新聞黑手」面臨角色轉變的新挑戰〉，《財訊》95 (1990.2)，頁 169-173。

<sup>187</sup> 李鴻禧，〈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頁 34。

正常運行。他說到：

我國目前報紙不能自由登記發行，現有的報社應該立於超然立場對於反共的各種意見此例刊登，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使另一方民意建議無法公開表達，政府當局則應酌量情況開放報紙發行。政治性雜誌期刊也應自由開放發行，除非觸犯刑章，否則不要輕易停刊撤銷發行，政治消息傳播行為可以使民意公開表達，積極上發揮政治溝通的功能，消極上避免民情平時無法宣洩，而累積到選舉期間一發不可收拾。<sup>188</sup>

此文乃發表於黨外政治動作頻仍、刊物屢遭查禁或停刊的美麗島事件前幾個月，在社會漸趨兩極對立之秋，藉由檢討國內政黨政治，順帶提出報禁和政論雜誌的取締問題。其語氣雖平和且著墨有限，但仍不失其代表性。

1985年2月，林嘉誠在〈蛻變中政局的觀察與評估〉，曾對當時黨外雜誌競相以所謂「國民黨學」的言論內容為標榜，極力挖掘國民黨政治人物的秘辛醜聞，引起執政黨不悅的現象略作評論。他表示查扣刊物達到高峰，各種文字官司此起彼落，黨內外這種相互激盪，所形成劍拔弩張局面，絕非愛好民主人士所樂見。林嘉誠批評如下：

無可諱言，國內新聞政策仍有待努力，刊物取締標準宜有明文規定，方能令人心悅誠服。可是黨外刊物突破言論尺度的方式，仍有諸多自我檢討之處，以市場為取向，投讀者的低俗所好，大量報導內幕，對於民主自由的助益不多，有限人力投入創辦周刊，人手不足，採證下筆難免有顧慮不周或草率行事之嫌，所引起的誹謗、查扣的事件，當然與日俱增。<sup>189</sup>

1987年俞國華指示新聞局研究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之後，林嘉誠在〈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之後〉文中，對台灣的新聞自由問題重新評估。他

<sup>188</sup> 林嘉誠，〈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中國論壇》92(1979.7.25)，頁45。

<sup>189</sup> 林嘉誠，〈蛻變中政局的觀察與評估〉，《中國論壇》225(1985.2.10)，頁34。

認為，戒嚴令一旦取消，有關報紙言論尺度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有關規定之外，剩下以出版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條為主；我國刑法、特別刑法有關言論責任追訴的規定不少，出版法不必再多此一舉。所以他建議，為因應報紙的開放登記與張數，有必要思考往後言論的責任由誰裁定，除了依照現行法律裁定外，目前相關法律條文不夠清楚之處，應該考慮修正或逐步樹立判例。報紙的停止發行、撤銷登記，與新聞自由密切相關，不宜由行政部門裁定，改由司法部門裁決。<sup>190</sup>

### 3、 李祖琛

在《中國論壇》較常提及媒體問題者首推李祖琛，這也適足反映了他的新聞學背景。當李祖琛於 1985 年對報禁加以評論時，曾期盼政府面對社會現實環境的因應，能夠檢討法令的限張、限證政策，絕不可因噎廢食、自縛手腳。李祖琛認為媒介多元化的出現，事實上也是世界潮流，同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準所在。當吾人侈談電傳視訊、有線電視與直播衛星等新式傳播科技時，對於傳統印刷媒介若無明快果斷的政策，那無異是有悖常理、本末倒置。<sup>191</sup>李祖琛在報禁問題方面僅談及此，但對政治力干預新聞自由之探討較多。

如前所述，國民黨政權昔日擁有報業市場的大半報紙，這些官方報紙在報禁政策的長期保護下，曾經風光一時。然而隨著兩大報系的崛起，市場結構丕變，自難永保優勢；尤其這類報紙以政治宣傳和批鬥異見為言論走向，陷入僵化的格局中，1980 年代開始即與社會脈動脫節日遠，終至漸趨沒落。至於能在報業市場中舉足輕重者，無疑仍為《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sup>192</sup>雖然二者皆係民營，惟其董事長王愷吾和余紀忠均曾是

<sup>190</sup> 林嘉誠，〈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之後〉，《中國論壇》277 (1987.4.10)，頁 53-54。

<sup>191</sup> 李寒冰，〈民生報發行突破卅萬份引起的省思〉，《中國論壇》240 (1985.9.25)，頁 9。

<sup>192</sup> 曾熾卿，〈一九九〇台灣報業趨勢——兩大報仍將壟斷報業市場〉，《財訊》95 (1990.2)，頁 119-124。

國民黨中常委，到 1988 年十三全會時才離任，卻又分別由女兒王效蘭和余範英出馬當選中央委員，繼續躋身國民黨的權力核心。此種報老板與執政黨之間利益相互結合的現象，令識者引以為憂，擔心媒體與執政者分享利益的做法是「公器私用」。<sup>193</sup>正由於兩大報都已被吸納到國民黨的權力圈中，因此儘管在處理台灣政治議題與海峽兩岸關係的新聞方面，《中國時報》系採取較開明的風格，而《聯合報》系則相對地顯得保守，不過大體上均支持國民黨政府。有研究者分析指出，《中國時報》系代表國民黨內改革派的觀點，而《聯合報》系較偏向軍方與情治系統。<sup>194</sup>

對於台灣這種畸形的媒體特質，李祖琛也迭有質疑。他曾以「十信案」<sup>195</sup>和 1985 年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訪美為例，批評媒體為了「配合政府」、「社會安定」等理由對新聞報導尺度自我設限；<sup>196</sup>也曾建議傳播政策制定者和媒體經營者，將社會運動未經剪裁過濾、完整的納入報導範圍，避免其缺乏宣佈管道，以致於走上街頭，越演越烈。<sup>197</sup>換言之，因為強調意識型態統一和重視社會共識，使得媒體成了政令宣導者，或是社會控制之利器。李祖琛認為：

以我國短短二三十年間晉身新興工業國家之林，大眾媒介於提供資訊來源，發揮群體決策，整合社會衝突等固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過於突出經濟發展，強調社會安定和諧的結果，相對上也使得

<sup>193</sup> 楊憲宏，〈退報——一種潛藏的社會運動〉，《當代》32 (1988.12.1)，頁 119-121。

<sup>194</sup> 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頁 245。

<sup>195</sup> 1984 年年底，由立委蔡辰洲所負責的十信不良放款持續增加，並涉嫌以員工與眷屬充當人頭向十信冒貸，而於 1985 年 2 月爆發擠兌。「十信案」是過去三十多年來影響最大、牽連最廣、虧損最鉅、波及無辜受害人最多的金融弊案。此案導致兩名財政部長先後下台，且因受牽連而被調職、記過、約談的官員不計其數。詳見王克敬，〈信託公司弊案引發金融風暴，致使財經當局嚴防資金私用〉，《自立早報》「台灣十年專題」(1989.12.25)，第九版。

<sup>196</sup> 李祖琛，〈大眾媒介不應只是療傷止痛〉，《中國論壇》237 (1985.8.10)，頁 9。

<sup>197</sup> 李祖琛，〈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中國論壇》263 (1986.9.10)，頁 21。

大眾媒介發展上受到壓抑與扭曲，就角色扮演言，成為執政權威當局與既得利益階層維持霸權之統御工具；就實際發揮之功能言，僅能消極檢討社會發生之弊端，無能積極發揮看守監督之預警效果。……不是以迂迴筆法、剪接效果報導所謂事件「真相」，就是在各種有形無形壓力下臨事而懼草草以終，主管機構禁制政策加上業者自我設限，使得新聞自由等崇高理念形諸口號……<sup>198</sup>

1987年，李祖琛在〈大眾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文章中提到：

回顧國內的大眾媒體，電視媒體與廣播媒體頻道受到嚴格的管制固不待言，即令報紙所出現有關政治異議者之言論也不成比例，有關國內政治反對運動之報導也甚為稀少，國內報業對於政府始終只能扮演溫和理性的諫諍角色，而無法發揮超然獨立的自主色彩。

他認為基本上，不管在選舉或非選舉期間，就傳播媒體資源的擁有與運用而言，黨外長久以來一直是處於劣勢之狀態，這使得其在推展政治反對運動時經常陷於欲振乏力的困境裡。<sup>199</sup>

雖然李祖琛不吝對黨外人士「仗義執言」，但也擔憂朝野之間出現兩極化的現象：

……權威當局擁有之媒介，往往不願正視台灣意識的現實性，而少數異議分子主持之媒介，也未能對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不可分性理性認知思索，使得問題爭執暗潮洶湧更形糾葛不清，雙方幾無妥協重疊之餘地，只是徒然加深權威當局與異議分子之間的猜忌與對立，一般社會大眾也因此惶惑不安，不知此一問題如何有一妥善而明確之出路？<sup>200</sup>

該文所謂的「少數異議分子主持之媒介」，應是指八〇年代中期盛極一時的

<sup>198</sup> 辛築，〈建立超然理性的輿論力量〉，《中國論壇》273(1987.2.10)，頁7。

<sup>199</sup> 李祖琛，〈大眾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中國論壇》274(1987.2.25)，頁33。

<sup>200</sup> 辛築，〈建立超然理性的輿論力量〉，頁7。

黨外雜誌而言。至於「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間的糾葛爭議，則係由當年黨外陣營裡的一場論戰(1982-1984年)揭開序幕。<sup>201</sup>李祖琛乃有感於官方和黨外的言論立場各走極端，對「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釐清、平衡於事無補，因此將居間調和之責任寄望於其他中立超然的媒體，俟自由化、民主化之後，言論市場沒有禁忌，朝野雙方便可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對話溝通，達成理性的共識。

表 4-5 《中國論壇》有關「言論自由」文章篇目表

作者	篇名	時間	主旨
楊選堂等 社論	「報禁」應予開放	1981.10.10	疏導代替防堵，折衷做法
	新聞言論自由的問題	1983.8.25	保障合法，取締非法
	容忍才有理性，自由才能創新， 平等才可溝通)	1984.9.10	黨內外缺乏平等溝通
	「報禁」開放的省思	1987.2.25	新聞界與立法、司法、行政四權相互制衡
李鴻禧	「當前問題的探討：(一)民主政治的前途」座談會發言	1977.10.10	增張而未觸限證，輿論洗滌官僚作風
	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上)	1985.2.25	言論出版自由關係到政權存亡
	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中)	1985.3.10	在戒嚴體制下，法院缺乏違憲審查權
	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	1987.9.10	查禁越嚴，反對越烈；檢討出版法、廣播電視法
林嘉誠	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	1979.7.25	積極溝通與消極宣洩
	蛻變中政局的觀察與評估	1985.2.10	黨內外相互劍拔弩舉；黨外刊物市場化

<sup>201</sup> 詳見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之後	1987.4.10	行政裁定改成司法裁決
李寒冰	民生報發行突破卅萬份引起的省思	1985.9.25	檢討限張、限證政策
	大眾媒介不應只是療傷止痛	1985.8.10	媒體不該為「配合政府、社會安定」而自我設限
辛築	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	1986.9.10	完整報導社會運動，以免缺乏宣佈管道，走上街頭
	建立超然理性的輿論力量	1987.2.10	強調和諧共識使媒體成為政令宣導、社會控制利器；中國 VS.台灣意識
李祖琛	大眾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	1987.2.25	黨外處於媒體資源弱勢

### (三) 綜合評析

綜觀本節所述，1977年李鴻禧、1979年林嘉誠發表開放報禁的言論，是最早在《中國論壇》呼籲當局者；迄1981年雙十節(《中國論壇》創刊六週年)聯名發表的〈「報禁」應予開放〉文章中，這項訴求已成為十五位學者的共同心聲。《中國論壇》在此時主張開放報禁，固然是自由派學者崇尚民主的象徵，另一方面，在《聯合報》系因限印政策所帶來的財務損失的情形下，但未嘗不是受到所屬報系既得利益的呼應和支持。其中十五位連署者之一的楊選堂，除了身為該刊發行人外，同時是《聯合報》總主筆，便成為擔任編委會與《聯合報》之間的中介橋樑。誠如李金銓所言：「自由學界與報團儘管動機南轅北轍，卻淹沒於共同爭取解禁的旗幟下。」<sup>202</sup>

到了1980年代中期，李、林二人均曾對黨外雜誌的取締風波作過針貶，解嚴後並進而檢討出版法、廣播電視法等法規之修廢問題，頗能契合時代的脈動。及至李祖琛進入該刊編輯部，以其新聞學角度審視媒體所受

<sup>202</sup> 李金銓，〈說什麼，不說什麼？——再看字裡行間·再聽絃外之音〉，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271-272。

到的結構性限制，評論可謂中肯之言。林嘉誠與李鴻禧相較，兩人皆對朝野雙方有所批評，均堪稱中立公允之論。不同的是，李鴻禧較能體諒黨外雜誌處境，而以新聞檢查政策之不當譴責國民黨政權，希冀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相反地，林嘉誠對刊物取締標準僅抱持期待，未多置一詞，而對於黨外雜誌的言論與經營，卻詳析其缺失。由此亦可略知兩位學者的論政風格差異所在。

《中國論壇》編委會自 1981 年，亦即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結束次年起，呼籲政府開放報禁，並重視言論自由的爭取與保障，而以司法為最後仲裁之依歸，值得吾人加以肯定。然而，該刊對於國民黨政權掌控媒體，公器私用，未能嚴加批判，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當報禁開放之後，除了李鴻禧曾抨擊國民黨政權——尤其是軍方壟斷或獨占傳播資源之不當、主張重新加以分配外，其他作者雖亦認知到問題之嚴重性，但卻沒有持續、積極地批判。《中國論壇》既贊成人民應享有合法的完全言論自由，又主張政府應斷然取締違法的任何言論。該刊認為執政黨與政府對於言論自由帶有雙重標準，一方面缺乏容忍透過合法方式批評的胸襟，另一方面卻容忍了一些違法、激烈的言論。《中國論壇》這種視台獨人士為毒蛇猛獸，卻又爭取言論自由的微妙心態，應與該刊早年「揚統批獨」的社論風格，以及內部學者「民主優先於統獨」的立場有關。《中國論壇》的「恐獨」心態，也連帶影響到其對言論自由之捍衛。

### 第三節 民主理念內涵：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

#### 一、國會改選問題

### (一) 社論觀點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之際，適值國民黨召開四中全會，許多人便憂慮此一時間上的相合，是否會影響該會的氣氛，進而影響及國民黨的決策。關於這個問題，《中國論壇》發表一篇〈哀矜勿喜，民主是從——我們對「美麗島事件」的一些感想〉社論，滿懷信心地說：

……國民黨畢竟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有飽經大風大浪的歷練，美麗島事件未能稍微改變他們主要的方向。因此本月十四日四中全會閉幕之日，蔣主席乃一再強調追求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並保證在適當時機恢復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名額，以擴大憲政功能，貫徹實施民主憲政。我們深信，無論外在局勢如何艱難，無論社會上有任何波瀾，執政黨永遠能夠把握分際，堅持可大可久的正確方向。……希望執政黨積極推動，引導全國向民主的大方向加速前進。<sup>203</sup>

這篇社論所謂「在適當時機恢復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名額」等，若與1978年黨外的「從速恢復選舉」與「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諸多訴求相較，可謂小幅度的回應。《中國論壇》一方面對於黨外有關選舉制度的改革主張表示支持，同時也充分信賴國民黨「把握分際」的能力，希望國民黨能引導全國邁向民主大道，而該刊溫和改革的立場實已昭然若揭。

1980年6月，政府宣布因中美斷交而延期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將於年底恢復辦理並增加名額。7月，《中國論壇》於〈值得讚揚的明智決定——對恢復選舉的看法與期望〉社論中表示，雖體諒政府在動員戡亂時期未全面改選國會之苦衷，不過：

---

<sup>203</sup> 社論，〈哀矜勿喜，民主是從——我們對「美麗島事件」的一些感想〉，《中國論壇》102（1979.12.25），封面裡。

蓋選舉不舉行，不但民主憲政無法正常運作，而且可以說是民主憲政根本的否定。不僅如此，我國目前採用增額選舉的方法，來解決在動員戡亂時期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無法全面改選的難題，原是不得已中的辦法，若再因國家緊急狀況，拖延下去而不舉行，不但無法解決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人事上新陳代謝的問題，更無法滿足在我們社會富庶了之後，一般人政治參與慾望升高的需要，……<sup>204</sup>

對於該次選舉增加名額的意義，同年8月《中國論壇》刊登〈理解當前國運，審慎參與選舉——對有志競選者的獻言〉進一步說明：

我國現在的中央民意代表絕大多數長年未經改選，三十年來這些代表，鞠躬盡瘁、老成凋謝者，日有所增；續留國會者，也都年屆耄耋；體力上已不可能經常奔馳民間各階層，俾能確實瞭解各地真正民意所在，精神上也不易有充沛之餘力，去研讀國內外重要書籍文獻，吸取最新知識，以應付排山倒海而來的新時代的新問題，價值觀上，尤易囿於自己所熟稔之價值意識及思想型態，對新價值、新思想，比較不易接受；使整個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的議事功能，呈現「機能老化」現象。這次擴增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顯然有促進中央民意代表機關「新陳代謝」的作用在內，其意義也極重大。<sup>205</sup>

1981年雙十節，《中國論壇》編委會在聯名發表的〈健全「國會」發揮「國會」功能之道〉表示：

由於長期的無法舉行總選，而致人事的代謝，除了服從生物的規律以外，一直未能與政治社會的變遷配合，從而處於長期的停滯狀態之中。……以修改臨時條款的方式，舉辦增補選及增額選舉，多少

---

<sup>204</sup> 社論，〈值得讚揚的明智決定——對恢復選舉的看法與期望〉，《中國論壇》114（1980.7.25），封面裡。

<sup>205</sup> 社論，〈理解當前國運，審慎參與選舉——對有志競選者的獻言〉，《中國論壇》116（1980.8.25），封面裡。

突破了以往長期的停滯狀態，……

不過，這些新委員相對於舊委員來說，仍是屬於少數，且舊委員由於沒有改選之虞，不必面對選民的壓力，自然不大會主動體察民意變動的反應，因此很容易變成一股龐大的保守力量。關於憲法「法統」問題，這群學者希望政府應落實憲法法統的「法」字，避免使憲政制度的運作流於「人統」：

……我國憲法「法統」的存續，不是寄託在「人」的身上，而是在「法」制的運作上面，換言之，只要我們的憲政制度能夠繼續運作，「法統」就屹立不移。……試問將來有一日老委員凋謝殆盡，豈非「法統」就從此斷絕？任何人的回答，一定俱是否定的。<sup>206</sup>

1982年11月，《中國論壇》在社論〈政治的智慧〉指出，立法委員老成凋謝的速度，已使問題拖不下去了，再拖則將出現開不成會的困境；其次，社會政治參與要求的高漲，已到了大家認為不能長久拖延下去的地步；同時，全民政治常識水準的提高，也形成一種求新求變的共識，產生了對現實政治的空前壓力。更重要的一點，這問題拖延下去，對政治安定與和諧團結，會有不利的影響。<sup>207</sup>

## （二）個別作者觀點

### 1、李鴻禧

1979年10月，李鴻禧在「如何建設民主法治的政治」座談會提到，國內有些學術界和政界人士，認為如使老成凋謝的中央民意代表席位，在台灣改選了，會使中央民意機關的「地域代表性」，由「廣博無疆」縮小為「海外孤島」，而中央民意機關也就變成只能代表台灣選區的民意，當然就

---

<sup>206</sup> 楊選堂等，〈健全「國會」發揮「國會」功能之道〉，《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12-13。

<sup>207</sup> 社論，〈政治的智慧〉，《中國論壇》172（1982.11.25），封面裡。

會大大斲傷「法統」的尊嚴。李鴻禧對於這種以訛傳訛的謬誤，相當感慨。他特以「法定代表說」來為在台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提供理論基礎，強調：

我們既然由中央政府來辦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選出的代表不論出諸台灣、福建或什麼選區，這些中央民意代表都代表整個國家的人，而非只代表台灣、福建等選區，這又怎會影響「法統」？「法統」重點必在「法」治(Rule of Law)，若必須堅持以古老的「委任代表說」的「地域代表性」，來搭架「法統」理論的架構，那二十、三十年後，當中央民意代表老成凋謝後，「法統」的憲法理論依據，是會令人感到難以建立的。<sup>208</sup>

1980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恢復舉行並擴增名額，李鴻禧於同年11月發表〈認清選民投票意向，瞭解選舉時代背景——年底選舉之動態剖析〉，認為這將有助於國會的新陳代謝：

……目前恰逢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絕大多數長年未經改選；三十年來，這些代表鞠躬盡瘁、老成凋謝者，日有所增；續留國會者也多年屆耄耋，體力上已不可能經常奔馳民間各階層，俾能確實瞭解現時各地真正民意之所在；精神上也不容易有充沛之餘裕，去研讀國內外重要書籍文獻，吸取最新知識，以應付排山倒海而來之新時代的新問題；特別是容易囿於長年來自己所熟悉之價值意識及思想形態；對新價值、新思想，比較不容易接受，以致整個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之議事功能，常常成為國人所關切的問題。這次政府執政黨決定如此大幅度地擴增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顯然有促使中央民意代表機關新陳代謝的作用，……<sup>209</sup>

---

<sup>208</sup> 李鴻禧，「如何建設民主法治的政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97（1979.10.10），頁47。

<sup>209</sup> 李鴻禧，〈認清選民投票意向，瞭解選舉時代背景——年底選舉之動態剖析〉，《中國論壇》123（1980.11.10），頁11。

將上面引文對照先前同年 8 月《中國論壇》刊登的那篇〈理解當前國運，審慎參與選舉——對有志競選者的獻言〉社論，不難發現它正是由李鴻禧所執筆。

1982 年 11 月，李鴻禧於「如何加強立法院的功能及其運作」座談會上，再從「委任代表制」(Delegated Representation)和「法定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來分析「法統」一詞。李鴻禧指出，法統的立足點應是在「法」的基礎上，而不是立足於特定的人物身上，否則就應改稱「人統」而非「法統」。他表示，縱令將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全體成員鞠躬盡瘁、老成凋謝以後，從台灣再選出來的代表，依「法定代表制」的法理，還是代表整個中華民國，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李鴻禧認為：

所以有「問題」，主要的恐怕還是「政治上的考慮」，因為如果我們這裡沒有大陸各省的代表，總覺得容有不足，深怕被稱為「台灣獨立共和國」，但事實上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為縱使大陸選出的代表都沒有了，我們的國號還是沒有變，國旗也還是沒有變，何況，執政黨在提名中央民意代表時，能適當推派各省籍的精英出來競選來沖淡這種顧慮。以執政黨三十多年來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政治支持，應該可以有效的掌握它的「多數地位」，穩定它的政治優勢，安心從事提名候選人時兼作省籍安排的工作，……<sup>210</sup>

隨著中央民意代表的老成凋謝，各種擴大遴選方式的主張紛紛出現。1983 年 5 月，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正式建議，藉由修改臨時條款的途徑，擴大遴選至淪陷地區，對象並及於國大代表。同年 6 月，李鴻禧眼看上述主張已至「浮濫無度」，因此在〈憲法基本概念之澄清——從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談起(下)〉三度力陳「法定代表說」要義，駁斥保守人士的「法統情結」及「台獨疑慮」。其次他指出，民主憲政體制之基礎，在於「主權

---

<sup>210</sup> 李鴻禧，「如何加強立法院的功能及其運作」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72

在民」的原理，即由人民選出民意代表，代表民意；若民意代表出諸遴選，則已不足言民主憲政。他認為「避開民主選舉過程，只用一紙臨時條款之修訂，就可使遴選變成民主選舉而具有民主憲政要求之代表性，無論如何是難以自圓其說的。」<sup>211</sup>

1987年1月，李鴻禧在〈合法性與正當性〉指出，國會未經改選的最大弊端，乃其「代表性」欠缺、所立之法「合法性」薄弱：

台灣戰後面對中國大陸淪陷的嚴酷事實，絕大多數立法委員在不用改選情況下，三、四十年來繼續行使其立法權能；他們不僅不經選舉、沒有選民，而其「代表性」受到議論，而且由於這些資深委員都已年屆耄耋，已不能深入民間探求民瘼，克盡凝聚人民「公意」之厥職；因此，立法之「合法性」確是未臻充分。<sup>212</sup>

1987年12月，李鴻禧在「台灣向前看——當前國家情勢的檢討與展望」座談會指出，執政當局之所以不願全面改選國會，原因在於一旦如此，民意代表將直接遭受選民的壓力，而所訂的法令必須合乎公平正義原則，方能再次當選；不過，我們現在的立法過程，乃是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利用黨鞭的力量來約束立法委員贊同通過，法令的「公平」、「正義」性，自然令人懷疑。如果能藉著解嚴，趕緊全面改選國會代表，使結構合法，程序也合法，在此情形所訂的法令必然有正當性，法律的威嚴也才能建立起來。<sup>213</sup>

## 2、胡佛

---

(1982.11.25)，頁 21-23。

<sup>211</sup> 李鴻禧，〈憲法基本概念之澄清——從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談起(下)〉，《中國論壇》186 (1983.6.25)，頁 39-40。

<sup>212</sup> 李鴻禧，〈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國論壇》272 (1987.1.25)，頁 1。

<sup>213</sup> 李鴻禧，「台灣向前看——當前國家情勢的檢討與展望」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93 (1987.12.10)，頁 25。

胡佛亦是《中國論壇》編委會內有關憲政問題的權威。1980年2月，胡佛在一場「選舉罷免法要更好——對『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草案』的看法」座談會表示：

我最近也聽到一些不實在的傳聞，如政府對高雄暴亂事件的處理，是想藉政治事件來影響選舉，這當然絕不可信，為了破除這一類的中傷，政府最明智的做法，便是把選舉罷免法訂得更完備更進步，以表示跟那個事件毫無關連。選舉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正常道路，高雄事件只是一個暴力的不幸事件，不可扯在一起，混為一談。<sup>214</sup>

1986年5月，在「如何建設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座談會中，關於國會的新陳代謝及調整，胡佛主張先建立一個原則性的彈性架構：

……在增訂的憲法條款中，明定全國過半數以上的省（市）如不能舉行選舉時，其選舉辦法由法律定之。……由法律決定，也就是授權行政院、立法院合作研擬。這就是彈性授權法律解決問題的方式。胡佛認為憲法是原則性的根本大法，民意代表的產生，憲法是應當有所規定的，但目前中國尚未統一，所以憲法對民意代表如何產生的規定，無法適用，因而不能不加保留。如果反攻大陸，全中國過半數以上的省（市）皆能實行選舉時，則憲法原有的規定就可馬上適用，這個彈性的架構可隨時配合政治發展來適用法律及憲法。至於中央民意代表的名額問題，胡佛主張將其規定於選罷法內，本著化解省籍隔閡的原則，讓人口結構自然反應外省籍者，而採取小選舉區制。因為胡佛指出小選舉制比較容易反應人口結構，有利於兩黨政治，而美國制度就是如此。<sup>215</sup>

1990年3月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以後，隨即籌備召開國是會議來回

---

<sup>214</sup> 胡佛，「選舉罷免法要更好——對『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草案』的看法」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06（1980.2.25），頁11。

<sup>215</sup> 胡佛，「如何建設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56（1986.5.25），頁46-47。

應民間的憲政改革要求。同年4月，胡佛在「國是會議與憲政改革」座談會中，對國會改選問題作了新的評估：

……李登輝總統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時，就是國會全面改選的開始。但是，依據憲法規定，第一屆國代要做到第二屆為止，不一定是六年任期。解決這個困難必須先完成第二屆的選舉，由中央選委會根據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來辦理選舉民代。依據人口總數，職業團體現況，以及上一屆增額國代選舉的情況計算，大致可以在台灣選出六十名左右的第二屆國代，則第一屆國代的任期便自然告終。……採取法定代表制，……因此，第二屆六十名國代選出後就能代表全體，假若將來大陸可以加入選舉，則不斷選舉替換即可。而第二屆國代所擔負的任務是結束第一屆國代，更大的任務在修訂憲法。<sup>216</sup>

換句話說，一旦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則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便無理由持續下去；透過第二屆國代之選舉與集會，修訂憲法中有關國會結構和改選之設計，將可解決懸宕已久的「萬年國會」問題。

### 3、林嘉誠

1979年7月，林嘉誠在〈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這篇文章中，認為國會的全面改選，乃增進國民之參政機會的方式之一。<sup>217</sup>接著1981年1月，林嘉誠藉〈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表達對國會長久未改選的批評：

……由於我國遭逢非常時局，立法機構未能定期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與民意無法緊密相連，立法機構所制定法律是否充分反映民意，是否完全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往往引起社會部分人士的異議，而產

---

<sup>216</sup> 胡佛，「國是會議與憲政改革」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350（1990.4.25），頁8。

<sup>217</sup> 林嘉誠，〈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中國論壇》92（1979.7.25），頁44。

生對法律的置疑。出版法與選舉罷免法，制定之後，均曾經引起部分人士的批評，即是顯例。<sup>218</sup>

1983年1月，林嘉誠在「青年人談國是(一)——突玻璃頸，邁向民主」座談會中，表示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遠比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的改選來得重要，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政治方針與政策決定。可是執政黨因為分裂的情勢，三十幾年來中央民意代表不曾改選過，這對民主政治的發展當然相當不利。<sup>219</sup>

1988年1月，林嘉誠在〈政治改革祇進無退〉對於是否設置大陸代表的問題，認為：

由台灣地區選出大陸代表，毫無法理基礎，祇見其弊未見其利，可以由政黨自行向選民負責，以不超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名額(立監兩院、國民大會因性質不同，比例不必相同)，依政黨獲票率，由政黨依比例提名擔任國會議員。或將這些名額改由台灣地區全體選民投票產生，真正才能人士較易脫穎而出，地方派系無法操縱，賄選的可能性降低。<sup>220</sup>

1988年4月，林嘉誠在〈國會改選的幾個大問題〉指出資深中央民代四十一年從未改選，於情於理均無法得到民眾的諒解。林嘉誠回顧四十餘年來國會改選之法理問題時，認為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1954年由第一屆中央民代繼續行使職權的釋令，此時此際已不合時宜；而1972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的修訂，則使第一屆資深中央民代的任期獲得更充分的保障。拜臨時條款的法律保障所賜，若干資深代表振振有辭，一副得「法」

---

<sup>218</sup> 林嘉誠，〈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中國論壇》127(1981.1.10)，頁6。

<sup>219</sup> 林嘉誠，「青年人談國是(一)——突玻璃頸，邁向民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75(1983.1.10)，頁13。

<sup>220</sup> 林嘉誠，〈政治改革祇進無退〉，《中國論壇》295(1988.1.10)，頁57-58。

不饒人的姿態。關於國會改選的困境，林嘉誠提出以下的解決方案：

執政黨的充實國會方案，的確面臨法理的困境，除非大法官會議另行解釋，或由總統依臨時條款授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及逕行選出第二屆國大代表，否則國大代表的充實問題，不易解決。<sup>221</sup>

#### 4、張忠棟

張忠棟乃最早在《中國論壇》檢討國會改選問題者。1977年3月，張忠棟在〈那裡是中國的光明大道？〉指出，政府遷來台灣之後，雖然繼續努力維持憲政，但因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能改選，老成又多凋謝，使中央民意機構不易發揮憲法所賦予的監督功能。<sup>222</sup>

1978年5月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前夕，《中國論壇》特推出「對新政府的獻言」主題，內含張忠棟所寫的〈年輕人求新要變——寫在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就任之前〉。談到國會改選問題，張忠棟說：

年輕人希望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充實，而且應該大幅度的充實，主要的理由就是民國三十七年最早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平均年齡都已高達七十歲，……以他們平均七十歲的高齡，如何能夠完全了解年輕人的要求，代表年輕人的利益？……基於種種的意念，年輕人肯定未來六年是最具關鍵性的時刻，新政府在這段時期之中如能大量有效的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則國家政治的生機蓬勃，活力充沛，全國的民心也就知所歸趨。<sup>223</sup>

換句話說，年輕人希望中央民意機構生生不息，甚至希望自己有機會能進入其中，直接維護本身的利益。張忠棟將年輕人的這些希望，總結為中央民意機構的新陳代謝問題。

---

<sup>221</sup> 林嘉誠，〈國會改選的幾個大問題〉，《中國論壇》301（1988.4.10），頁51-53。

<sup>222</sup> 張忠棟，〈那裡是中國的光明大道？〉，《中國論壇》35（1977.3.10），頁10-11。

<sup>223</sup> 張忠棟，〈年輕人求新要變——寫在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就任之前〉，《中國論壇》63（1978.5.10），頁14。

1979年11月，張忠棟以〈恢宏開放，積極進取——四中全会前夕向執政黨進一言〉明言：

在中央民意代表問題方面，其增補選的恢復與名額的擴大，尤其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我們今天必須考慮年長的民意代表是否有足夠的精力發揮議事監督的功能？新舊民意代表能否有足夠的時間作健全的配合銜接？最後我們法統的實際運作是否會難以為繼？由於這些方面的考慮，時間可說十分緊迫，我們相信愈早讓更多的新血輪注入中央民意代表機構，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向老一輩的代表學習，讓他們幫忙推動立法監察的工作，我們的憲政才能有更健全的成長。<sup>224</sup>

在1989年1月的〈國民黨台灣執政四十年〉這篇論文中，張忠棟對於國會改選問題總結如下：

中央民意機構的衰老，早在七〇年代已經受到批評，可是國民黨不但未加徹底改造，並且有意無意使其淪為工具，完全喪失監督制衡的功能。因此民間普遍的印象，監察院的老人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重大的貪汙瀆職案件都沒有人管，立法院的老人是表決部隊，完全配合黨的要求，根本無視社會的需要。一九八二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授予警察緊急逮捕權與緊急拘留法，封殺黨外候選人當選機會，這些都是立法委員只管黨意，不顧民意的最佳說明。<sup>225</sup>

## 5、黃光國

1979年1月，黃光國的〈革新與團結〉曾自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指出，「黨外人士在過去十數年間的所作所為，很明顯的是一種針對執政黨的某些措施感到不滿，而要求改革的『社會運動』。」而發生這項社會運動的

---

<sup>224</sup> 張忠棟，〈恢宏開放，積極進取——四中全会前夕向執政黨進一言〉，《中國論壇》100（1979.11.25），頁10。

主要原因，便是三十年來中央級民意代表的長期無法改選。黃光國以權力分配、參與、認同、整合與合法性等諸多危機，來說明國會未經改選之併發症：

由於政權長期掌握在這批終身職的民意代表身上，我們社會中的權力無法再作公平、合理的分配，於是我們便面臨了所謂權力分配危機 (distribution crisis)。由於過去十餘年來，台灣經濟繁榮，民生無虞匱乏，教育水準提高，人民參與政治的慾望也不斷提高，可是許多才俊之士卻因為人事管道阻塞而感到「請纓無路，報國無門」，於是我們便面臨了所謂參與危機 (Participation crisis)。由於大多數的新生代無法經由直接投票的方式，選出代表參與政府的決策，許多人對政府產生了冷漠感或疏離感，於是我們又面臨了認同危機 (identity crisis)。由於中央民意機構無法向政府充分的反映人民的意見和各個利益團體的需求，我們再面臨了整合危機 (integration crisis)。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當外國政府對我國中央民意的「代表性」感到懷疑時，我們更面臨了合法性危機 (legitimacy crisis)。<sup>226</sup>

1979年1月，黃光國在「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指出：

在我國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三十年前在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平均年齡已經高達七十歲。年齡的老邁，使得他們無法發揮「代表民意」的功能，幾次的增補選，也無法為中央民意機構注入充裕的新血。直到六十九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選出七十六位國大代表 (佔全體國代名額百分之六)，七十位立法委員 (佔立委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三)，及監察委員三十二人 (佔全體監委百分之四十三)，

---

<sup>225</sup> 張忠棟，〈國民黨台灣執政四十年〉，《中國論壇》319 (1989.1.10)，頁67。

中央民意機構才開始呈現出生機活潑之象。在未來的十年中，終身職民意代表老成凋謝的速度勢必要加快，將來幾次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即使增額民意代表的名額固定不變，它們在整個國會中所佔的比率還是會一次比一次增加。<sup>227</sup>

從黃光國此文所提供的 1969 年首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數據，我們可看出國民大會在當時雖然是最大的中央民意機關，但改選幅度卻是最小的，只佔全體國代名額百分之六；反倒是人數最少的監察委員，改選比例最大，佔了全體監委百分之四十三。由此可見，想要透過增補選的方式，讓年邁的資深中央民代「自然淘汰」，仍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

到了解嚴之後，1987 年 10 月黃光國在〈「中國結」與「台灣結」：對抗與出路〉主張國會應全面改選。他表示，在文革結束之前，中國大陸竹幕深垂，外界對其所知有限，執政黨自然可以對國內外宣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的政府；在台灣的中央民意代表，亦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然而，隨著中國大陸開始對外開放後，這種說法越來越站不住腳了。他如此說：

中共對外開放之後，從大陸出來的移民、留學生和訪問學人愈來愈多。愈瞭解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台灣的民眾愈可能懷疑執政黨所堅持的「法統」之說：四十年前在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今天如何能夠代表全中國的「民意」？<sup>228</sup>

在政府頒布的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中，雖然比照政務官，給予資深代表十分優厚的退職金，但因採取「自願退職」的辦法，以致成效不彰，

---

<sup>226</sup> 黃光國，〈革新與團結〉，《中國論壇》79（1979.1.10），頁 37-38。

<sup>227</sup> 黃光國，「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32（1981.3.25），頁 34。

<sup>228</sup> 黃光國，〈「中國結」與「台灣結」：對抗與出路〉，《中國論壇》289（1987.10.10），頁 16、18。

最後並成了 1989 年年底大選中，國民黨遭到空前挫敗之重要因素。1989 年 12 月，《中國論壇》便將國會改選問題列入「一九八九台灣十大問題」排行榜的政治改革工程中。黃光國發表〈治絲益棼的國會改革困境〉一文，指出國民黨中央正面臨了一個鉅大的兩難困境：到底是將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問題繼續拖延下去？抑或修法逼退？而黃光國認為：

如果要繼續拖下去，團民黨將來便必須面臨「失掉政權」的危機：蓋資深中央民代已經變成眾矢之的，也變成台灣實施民主憲政的最大絆腳石。資深民代一日不退職，國會一日無法全面改選，國民黨就要面臨逐日增強的壓力，在下次選舉中，便可能流失更多的選票。如果國民黨在未來選舉中無法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選票，其執政基礎便可能發生動搖。<sup>229</sup>

在要求國會改革的壓力日增下，1990 年 5 月 1 日，李登輝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以兩年為期修訂憲法。這使得國會改革問題初露曙光。1990 年 6 月，大法官會議針對資深中央民代任期作出釋憲案，認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應於 199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終止行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適時辦理全國性之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1991 年 4 月，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議修憲，通過憲法增修條文。1991 年 12 月舉行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以及 1992 年 12 月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總算完成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改革工程，正式宣告「萬年國會」終結，回歸憲政常軌。<sup>230</sup>

### （三）綜合評析

綜前所述，1977 年，張忠棟是最早在《中國論壇》針對國會結構問題

<sup>229</sup> 黃光國，〈治絲益棼的國會改革困境〉，《中國論壇》342（1989.12.25），頁 10-12。

<sup>230</sup> 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編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0），頁 270-271。

提出批評者，之後李鴻禧、胡佛、林嘉誠和黃光國亦分別有所針貶。至於《中國論壇》的社論，在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之際和 1980 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前，開始發表若干意見；而其內容則肯定政府恢復選舉、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名額，對於國會所將帶來的新陳代謝作用，以及擴大民主憲政的功能。在 1981 年雙十節的聯名文章中，《中國論壇》編委會則進一步希望政府能落實落實憲法法統的「法」字，避免使憲政制度的運作流於「人統」。

張忠棟認為年邁的中央民代喪失監督制衡政府的功能，以及舊民意代表難以代表新民意的歸向。黃光國指出資深中央民代無法發揮「代表民意」的功能，而國民黨對國會改革的問題拖延，可能會動搖政權的執政基礎，將使國民黨面臨「失掉政權」的危機。涉及具體的方案規劃，則以李鴻禧、胡佛與林嘉誠三位法政學者較能侃侃而談。有關如何改革國會的法理問題，李鴻禧再三力陳「法定代表制」的憲政觀念，駁斥保守人士的「法統情結」與「台獨疑慮」；而胡佛與林嘉誠二人皆主張透過「增訂憲法條款」來解決國會改選問題。至於資深代表的退職問題，林嘉誠主張透過大法官會議重新釋憲的方式，或是由總統依臨時條款授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選出第二屆中央民代以解決之，而胡佛亦曾提及後一方案。

## 二、政黨政治發展

### (一) 社論觀點

1979 年 10 月，《中國論壇》在一篇〈對執政黨的兩點厚望〉的社論中，提到在堅守民主陣營的原則下，應該朝向兩黨或數黨的民主正途邁進。由於當時黨外運動日趨茁壯，《中國論壇》或基於珍愛民主幼苗的心裡，不願看到少數黨政要員否定政黨政治的偏頗言論，為社會的兩極化傾向火上加

油，故希望國民黨早日落實政黨政治。<sup>231</sup>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論壇》發表了一篇〈哀矜勿喜，民主是從——我們對「美麗島事件」的一些感想〉社論，文中首先指出，美麗島人士一向高談民主、法治、人權，卻在高雄以演講、遊行「煽激成暴力攻擊，打傷憲警」，該刊感到萬分的痛心，接著《中國論壇》提出兩點感想：

無黨籍人士這兩年在政治上崛起，若由正道發展成一股制衡的力量，是有益於民主體制實現的。然而其中有些人存心偏激，以煽惑無知群眾的感情為能事，接著出刊「美麗島」雜誌，三日舉行一小會，五日舉行一大會，終於釀成高雄的暴力事件，引起群情的憤慨，為民主造成最大的諷刺。我們一向認為民主不可情緒用事，與暴力尤不相同，任何憑藉情緒乃至鼓動暴力的人，他們都不配談民主，甚至還會嚴重損害已有的民主成績，美麗島的事件，不幸正好印證了我們的想法。……

我們講求民主，同時也須講求法治，對於違法犯紀的人，我們固然希望依法制裁，尤其希望用法適中。犯罪有主從，法律有寬嚴，美麗島被捕人士之中，或者罪證確鑿，實有判亂意圖與行為者，自然不必稍予寬貸，其餘情節較輕，且有悔改意向者，便應另作個別處置，不宜一體對待。至於進一步清除一切不同的意見，則尤與民主相違。民主貴在容忍，貴在將不同意見透過合法的途徑達成最佳的綜合，所謂集眾智為大智，集眾謀為大謀，此時若以美麗島少數人士言論行為的偏激，便更進一步大張撻伐，則恐志士消沈，忠言不顯，無益於民主，更非國家之福。<sup>232</sup>

---

<sup>231</sup> 社論，〈對執政黨的兩點厚望〉，《中國論壇》101(1979.12.10)，封面裡。

<sup>232</sup> 社論，〈哀矜勿喜，民主是從——我們對「美麗島事件」的一些感想〉，《中國論壇》9：6=102(1979.12.25)，封面裡。

可見《中國論壇》贊成「民主」，但是反對「暴力」；同時也不贊成某些人所主張的一律嚴辦、進一步清除一切不同的意見，認為應兼顧「法治」與「民主」。

在 1981 年雙十節的〈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看法與主張〉主題中，《中國論壇》編委會學者群建議國民黨政府早日制訂「政黨法」，落實多黨公平競爭原則，以彌補政黨政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他們說道：

……在我國現今極其特殊的環境裡，現實上「一黨獨大」是有助於保持政權安泰，也較便於拖行既要「行憲」又要「戡亂」的錯綜艱難的時代任務。也許執政黨基於這種考慮，近幾年來對在野人士所提「開放黨禁」、「准許新設政黨」的要求都以戒嚴戡亂為由加以批駁拒絕。然而，由於近二十年來經濟飛躍成長，教育又頗發達，社會已漸趨多元化，而社會多元利益需要透過各種不同團體，來做合理的協調，這種社會結構變遷的現實，勢必逼迫執政黨在「一黨獨大」現實和「多黨競爭」的理想中，考慮重新做適當的調衡。……建立「多黨公平競爭」，來克服中共「一黨獨裁專制」，最具關鍵性意義。……特別是目前正逢民、青兩黨，迭聞閱牆、積疲不振；而黨外人士「在高雄美麗島事件」後，面臨青黃不接的時候；國民黨正宜早日研擬「承認」及「規範」政黨及政黨活動的法規，既可及早培養執政黨新生代在有利的環境下，從事多黨公平競爭；又可促使溫和改革的在野制衡力量成長，借以防阻過激反對勢力興起。<sup>233</sup>

1986 年，國民黨當局雖然表示與黨外誠意溝通的立場並無改變，但面對黨外日益頻繁的群眾活動，亦聲稱不排除研究採取法律行動的可能性，實際上取締黨外雜誌的工作仍未稍停。處此朝野尖銳對立的情勢下，《中國論壇》的〈朝野應多努力尋求政治和諧〉論壇文章，再度強調政治和諧的

---

<sup>233</sup> 楊選堂等，〈加速中國國民黨的現代化、民主化〉，《中國論壇》145 (1981.10.10)，

重要性。該刊認為，我們已瀕臨相當危急之時機，執政黨與在野黨派均應努力自我克制，其忠告如下：

……黨外之急進派系不可自我陶醉於其所煽起的群眾激情，而應冷靜地體認如果引發了黨內外再次劇烈衝突，必將造成難以收拾及恢復的浩劫；同時黨外之各方領袖人物，更應該摒除今年年底參與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一己的利害判斷，抑阻黨外繼續發動街頭群眾，而應運用各種溝通管道，不論是立法院、省市議會、縣市議會或其他政治溝通聚會，與執政黨溝通理解，據理力爭。彼此努力走向現在民主政治寬容妥協之道。……

同樣的，政府執政黨也應充分認識，目前黨外並未成為正式能整合、有組織、有紀律之政治黨團；因而，黨外雖有一部分人言論或行動越軌，但不能歸咎於黨外全體。事實上，黨外既已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選民支持，其反對批評意見自應受到相當的尊重。因而，政府執政黨不應汲汲於運用治安藉口及國家公權力，想加以抑壓消除；相反的，要儘速使黨外能正式組織為政治黨派，俾其能整合內部，建立紀律；然後，能寬容忍讓黨外之批評責難，就其所提合理而有建設性意見，儘量加以接受採行。畢竟，民主政治是多元的政治，在野黨派之反對批評，原就蘊涵不少民間之聲音與民眾潛在之不滿情緒。這正是政府執政黨最寶貴之政治防腐藥劑，豈可肆意抹煞消除。<sup>234</sup>

《中國論壇》呼籲黨外急進派人士能懸崖勒馬，切莫因群眾路線而使朝野兩敗俱傷，尤希望溫和派能扮演起「撥亂反正」的角色；該刊也督促國民黨當局尊重黨外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落實民主改革，早日讓黨外組黨。

## (二) 個別作者觀點

### 1、張忠棟

張忠棟是《中國論壇》中，首位肯定、同情黨外人士者。1978年選舉期間，張忠棟在「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座談會便提到：

……我想從去年十一月的地方選舉之後，執政的人應該重新估計這批人的實力，在政治建設方面做到更大的民主和開放。<sup>235</sup>

1979年11月，張忠棟在〈恢宏開放，積極進取——四全會前夕向執政黨進一言〉提到：

我們的政黨究竟應當如何發展？對於此一問題，個人並無一定的成見，既不認定非走兩黨政治的道路不可，也不以為國民平均非達到某一標準，即不足言兩黨政治，我所關心的，還是如何切實向民主與法治的方向努力。國民黨長期執政，對國家社會有一定的貢獻，在目前內外艱困的狀況下，它必然是一種穩定的力量，同時展望未來，恐怕也不是其他的政治團體可以輕易取代。<sup>236</sup>

由上文可見，當時張忠棟仍寄望由國民黨引領全民邁向民主法治的大道。張忠棟亦主張讓黨外勢力有公開的、正當的政治活動機會，因為若不開放政治活動，它一樣會暗中活動著，執政當局難以管理或控制；如果開放政治活動，有一個健全的政黨法律的話，就可以讓他們有正常的活動。不過，此一建議隨即因12月發生的美麗島事件而擱置。

直到1984年蔣經國連任總統、內閣進行改組之際，張忠棟在「揭開歷史的新頁——對新內閣的建議和展望」座談會中，重新呼籲制定政黨法，開放政黨合法活動，以達到政府與民間的聯繫。張忠棟主張從議會發言、

---

<sup>234</sup> 論壇，〈朝野應多努力尋求政治和諧〉，《中國論壇》258（1986.6.25），封面裡。

<sup>235</sup> 張忠棟，「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73（1978.10.10），頁58。

<sup>236</sup> 張忠棟，〈恢宏開放，積極進取——四全會前夕向執政黨進一言〉，《中國論壇》

參選機會和言論自由等途徑，來使非國民黨人士多在政治上發揮作用，其中則以開放政黨活動是最積極的作法。<sup>237</sup>由於當時正值「黨外公政會」剛成立不久，張忠棟再次提出開放政黨活動的聲明，應是為公政會的合法化請命。

1986年，張忠棟在〈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指出，胡適不同意該刊所稱「有了反對黨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之說法，並認為最好不用「反對黨」這個名詞，應由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等一批書獃子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而政府和執政黨也就不必害怕。<sup>238</sup>換句話說，胡適一生談反對黨，卻從來不談群眾性，而只想到它是知識份子和社會精英的結合。身為研究胡適思想的歷史學者，以及長期關切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知識分子，張忠棟對此自然有所感觸。

張忠棟在1987年胡適逝世二十五週年前夕，寫了一篇〈紀念胡適逝世廿五週年〉文章，就反對黨問題作了歷史對比與思考。張忠棟指出，時代不同，環境有異，現在台灣的社會經濟條件，與胡適生前所見者已大相逕庭，今天的政治民主要求，也明顯超出他當年的理想。張忠棟將民進黨的成立，視為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此後吾人政黨政治的思想和胡適所考慮者即有迥然之別。民進黨已獲得百分之三十選民的支持，並富有強烈的「草根性」和「群眾性」。他們要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也當仁不讓要做公平競爭的政治對手。他們不肯甘心永遠在野，也想透過選舉爭取執政的機會，甚至在若干縣市之中，已經聲稱是執政黨。因此張忠棟認為：

時代是向前走的。胡適過去鼓吹民主自由，受到很多挫折，受到一些限制，但也肯他一定的貢獻。今天時移勢易，大家談民主自由，

---

100 (1979.11.25)，頁 11。

<sup>237</sup> 張忠棟，「揭開歷史的新頁——對新內閣的建議和展望」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08 (1984.5.25)，頁 17-18。

<sup>238</sup> 張忠棟，〈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中國論壇》265 (1986.10.10)，頁 113。

必然走到胡適前面，有更新的想法，存更多的要求。<sup>239</sup>

日後張忠棟「不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地這隨雷震、傅正等前輩的腳步，加入反對黨的行列，多少正是基於上述的觀察與體認。

1989年1月，張忠棟在〈國民黨台灣執政四十年〉回顧說：

國民黨用選舉活動的限制，用……「美麗島事件」之類的逮捕判罪行動壓制反對力量，並沒有很好的效果。「美麗島事件」之後，軍法大審和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反而激起更多人對黨外的同情。一九八〇年增額中央民代恢復選舉，一九八一年的地方選舉，一九八三年的增額立委改選，在這幾次選舉中，「美麗島」被捕人士的家屬、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以及黨外的新生代紛紛參選，周清玉、許榮淑、方素敏等人並且都以高票當選。更進一步，黨外開始發展組織，先於一九八四年成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復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宣布組織民主進步黨。<sup>240</sup>

## 2、李鴻禧

在《中國論壇》上較常思考反對黨問題者，李鴻禧也是其中之一。1981年，李鴻禧在名為「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的座談會上表示：

在目前我國極其特殊的環境裡，現實上「一黨獨大」是有助使政權保持安泰，俾藉以完成既要「行憲」又要「戡亂」的錯綜艱雜的時代任務的，然而今後台海兩岸既是一時之爭而又是千秋之爭，我們要在台灣實施民主憲政的經驗，來做為建設未來新才國的一種模式；……目前包括民青兩黨在內的在野政治人士，絕大多數認識執

<sup>239</sup> 張忠棟，〈紀念胡適逝世廿五週年〉，《中國論壇》247（1987.2.25），頁1。

<sup>240</sup> 張忠棟，〈國民黨台灣執政四十年〉，《中國論壇》319（1989.1.10），頁68。

政黨的歷史貢獻，以及其執政在今日的意義，而著眼於「制衡」而非立即輪替；同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憑其尤榮的歷史政績，和現階段的客觀現實狀況，特別是擁有極多黨員，縱令跨大步子實施多黨公平競爭，也不難獲得多數民眾擁護，維持其傳統的優勢。

接著他呼籲國民黨：

儘早研擬有關「承認」及「規範」政黨與政黨活動的法規，使多元社會利益，能透過各朝野政黨，依據政黨法規，做成合法及合理的調衡。……並促使溫和改革的在野制衡力量成長；在防阻過激的反對努力興起上也有其必要。

上述「一黨獨大」的現實與「多黨競爭」的理想之間的折衷論調，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原來這和前面提過的那篇 1981 年雙十節編委聯名發表的〈加速中國國民黨的現代化、民主化〉文章，不僅意見一致，甚至連用字遣詞也幾乎完全吻合，顯然該段文字係出自李鴻禧之手。此外，李鴻禧還希望執政黨能努力「尊重少數」，在野黨派則謙沖地「服從多數」；朝野相互寬容忍讓，減少情緒性之對立，增加理性之討論與調協。他並以 1913 年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於日本東京所做的「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福利」演講，來勉勵朝野各黨派人士，奉行多黨公平競爭是中國政黨政治的最高原則之遺訓；並希望全國各黨派都能絕對尊重現行中華民國憲法。<sup>241</sup>

李鴻禧在 1981 年 3 月的「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中，除了呼籲國民黨制定政黨法規、奉行多黨公平競爭原則外，同時還對在野人士提出諍言：

第一、在野人士相互間，應先養成彼此寬容忍讓、調整妥協的民主風度；過去在野黨派力量本就有限，而內部卻派系林立，各不相讓；

---

<sup>241</sup> 李鴻禧，「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

不但因內部分裂而削弱其政黨原有之功能，而且不易使民眾對之信賴支持；若在野政治人士內部都不能民主忍讓，何能以之求諸執政黨？第二、……排去「為反對而反對」的情緒，而作理性可行的批評和建議。第三、在野人士應認清自己所代表之民意——選票所顯示——畢竟是「少數意見」，對自己的政治見解在訴諸大眾的同時，也應有「服從多數」謙沖與柔軟性；對「執意堅持到底」的事項，必須審慎斟酌、敬謹其事。第四、在野政治人士應努力於消除容易引起朝野對立、僵持不化的因素，譬如偏執的特殊觀點、狹隘的地域偏見、長年兩極對立的朝野共有的偏見等。<sup>242</sup>

1984年在「揭開歷史的新頁——對新內閣的建議和展望」座談會上，李鴻禧再度對黨禁問題有所檢討。他指出，政府（特別是運作政治的執政黨）如果不能與在野各黨派人士聯繫溝通，就各種政治問題找出「最大的公約數」，而抱多元社會各種政治黨派的歧見留著，不去解決，一定會增加各種政治意見的衝突，以後就容易形成有力者抑壓、無力者抵抗對立的暴力惡性循環。李鴻禧強調：

強有力的軍警等治安機構抑壓不同政治黨派，成功了，可能會導致軍事政府的成立，是一種很不好約政治；相反的，抑壓不成功了，就會變成暴力革命，引起社會的惡性循環。

因此他建議，為了使各種不同意見能凝集、綜合，對集會結社的自由應予尊重，最好應考慮開放黨禁，尤其要制定政黨法，使各種政治活動都有一定的法律規範。<sup>243</sup>李鴻禧與張忠棟不約而同地提出此項呼籲，無非皆是希

---

《中國論壇》132(1981.3.25)，頁23-24。

<sup>242</sup> 李鴻禧，「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頁26。

<sup>243</sup> 李鴻禧，「揭開歷史的新頁——對新內閣的建議和展望」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

望「黨外公政會」能免於遭到取締的厄運。

1986年5月25日，在《中國論壇》所舉辦的「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座談會上，李鴻禧就黨外公政會的被取締問題評論指出：

目前執政黨所持之黨禁的理由是國家處於戒嚴時期，必須要絕對地安定、團結；但我個人認為這一理由是不充足的。如果說是如此，那麼政府為何不停止所有的政黨活動？此外，如以中共的統戰為理由，那也是不夠充分的，何以能保證中共的統戰不會及於民、青兩黨甚而執政黨，而只及於黨外人士？……至於「政黨」登記，執政黨以「黨外」沒有登記所以為非法；但是民、青兩黨與執政黨也沒有登記，而政府的答覆卻是這三黨共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所以早於憲法而不需登記。這種說詞，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是無法被接受的，因此目前黨內外的對峙，真正的原因不在於法律，而是政治上的問題。<sup>244</sup>

也就是說，國民黨「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牽強理由，實令李鴻禧無法苟同。

三個月以後，朝野之間的對峙益烈，而溝通工作更是遙遙無期。1986年8月，李鴻禧便又寫了一篇〈建立溝通、討論妥協的現代政治體系——溝通理論的序說〉長文，討論溝通與政黨政治問題的文章，為反對黨催生。該文涉及政黨政治問題的觀點頗多，表面上雖是學術探討，實則蘊含寓意。李鴻禧表示，由於政黨在現代政治理論體系中，以凝聚多元社會的不同民意，提出各種問題，俾供包括政黨黨員在內之全體民眾溝通、討論與妥協出「公意」，為其重要功能，因之，政黨不能單一而需要呈複數存在。同時，要使選民有充分的選擇執政政黨、選舉國會議員之自由，必須要有言論、

---

208 (1984.5.25)，頁 26。

<sup>244</sup> 李鴻禧，「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56（1986.5.25），頁 19。

出版、集會與結社相當自由之客觀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不僅不能獨尊某一政黨而罷黜其他一切政黨，抑且不能獨尊某一思想主義而罷黜其他一切思想主義。」易言之，應容許各種不同的政黨及思想主義作公平公正的競爭。接著李鴻禧開始討論國會中的政黨政治這作，他指出，現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國會，都是由多數政黨共存而呈現其多元性的：

……有多數黨或聯合的多數黨存在，同時又有少數黨或聯合的少數黨存在；而且少數黨或聯合的少數黨，並不因為居於少數的不利地位，就被多數黨或聯合的多數黨予以消滅。……只有毫無議事功能的少數黨供作政治花瓶，而由多數黨控制一切的國會，乃是失去多元異見的討論功能之集會，已不足言為國會，只配稱為行政登錄機關而已。……不僅國會內部結構成員，無論如何必須是對立和相互齟齬爭議的；而且國會議員進行討論辯難的思想價值觀，也必然是相互對立抗爭的。

此外，李鴻禧認為應注意建立法制，使國會中政黨的結構編制能更合理合適，最好能以國會組織法或政黨法，限制每次大選中，不能獲得總投票數額一定比例以上票數——比如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以上的政黨，繼續登錄為國會政黨，以防泡沫政黨產生各種難題；同時，促使國會能走上兩黨政治，或至少成兩個聯合政黨之政治。最後他強調：

純粹的兩黨政治，業經英美政黨政治史，檢證其優越可行。縱令因國情的不同及歷史文化因素而形成多黨政治時，也須借國會組織法之設計導引，使多數黨能相互聯合成兩個聯合政黨，以避免「一黨獨大」，多數在野黨零散分立而不發生作用，造成「眾星拱月型」的「一黨獨大」政治。<sup>245</sup>

李鴻禧這篇文章乃刊登於 1986 年朝野溝通中輟數月後，由其以「溝通」為

---

<sup>245</sup> 李鴻禧，〈建立溝通、討論、妥協的現代政治體系——溝通理論的序說(上)〉，《中

題並力陳「兩黨政治」之優、「一黨獨大」之弊看來，該文的弦外之音不言可喻。事實上，在先前黨內外溝通期間，李鴻禧當時曾對黨外作更直接的聲援，而他本即是數位黨內外溝通的中介學者之一。

在 1987 年 1 月的座談會中，與會的陶百川、楊國樞、李鴻禧與胡佛均根據自由民主之政治學理，對台灣剛誕生的政黨政治提出具體反省。陶百川呼籲儘速訂定政黨法來規範政黨政治運作，而李鴻禧與楊國樞對於倉促成軍的民主進步黨提出反省與建議，並呼籲由不同派系組成的民進黨，必須先學習綜合、妥協意見的在野黨文化。<sup>246</sup>從這裡的立論脈絡可看到知識份子試圖扮演「第三勢力」的論述位置，嘗試從客觀、學理的觀點對政黨政治加以批評的想法。

1987 年 9 月，李鴻禧在〈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回顧戒嚴時期台灣人權問題，並對黨禁戕害民主發展的概況作過檢討。他認為雖然集會和結社自由是人民最重要的基本人權，亦是實踐民主政治不可或缺之手段，而憲法亦有條文明確予以保障。但是在長年實施戒嚴體制下，依戒嚴法第十一條規定，戒嚴地域的最高司令官對認為與軍事有妨害的集會結社，得停止解散之。不過，實際執行起來卻更為嚴格：

實際上，政府及軍事治安機關對集會結社，不問是否與軍事有妨害，都採相當警戒限制之態度。特別是與在野黨派之活動有關的集會，經常加以阻撓取締，以防在野黨派與群眾接近、爭取民眾之支持。尤其是在選舉活動前，在野黨派舉辦之以「民主講座」為名，提出政治批判政治訴求為實的集會，更不惜動用軍警治安實力，加以防止或扼阻。<sup>247</sup>

---

國論壇》262 (1986.8.25)，頁 29-30、33-34。

<sup>246</sup> 楊國樞等，〈陶百川、楊國樞、胡佛、李鴻禧談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座談會)，《中國論壇》23:10 (1987.1)，頁 8-25。

<sup>247</sup> 李鴻禧，〈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中國論壇》287 (1987.9.10)，

1988年，李鴻禧在〈革新政府執政黨結構，回歸民主憲政體制〉提到國民黨的長年執政，具有國家政治捨我其誰的強烈意識，甚至在整個政黨中，堅持「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老舊革命觀念者仍大有人在。在這種濃厚的革命政黨觀之下，對外形成「一黨獨大」的結構和運作，壓抑反對人士組成新黨，或對既有在野黨予以分化的事例。<sup>248</sup>

### 3、胡佛

1977年，胡佛在〈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認為一個政黨若排斥其他政黨的存在或競爭，這與政治現代化的理想就不盡相符。他說：

各黨及與人民之間，皆應站在平等的權力地位。……政黨的政見及執政人選，必須經過人民的選擇。如民意不同意，即表示不受人民支持。亦即現代化的政黨應將基礎建築在民意上，失去人民信任的，即不能執政。<sup>249</sup>

1981年，胡佛在「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表示，政黨的功能在於組織政見，提供人才；像這樣性質的政黨，在國家之下，可有好多個。它們在政見與人才上彼此競爭，最後則取決於民意，而這種政治才是正常的政黨政治。胡佛進而指出：

過去國民黨對民社黨及青年黨兩黨的關係是輔導重於其他，假如未來國民黨能以人才和政見取勝，讓其他政黨站在平等地位來競爭，那麼，對國民黨而言，也可收攻錯之效，也就是促使國民黨的政見能不斷地與民眾在一起，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另一面，也可使國民黨優秀的黨員能進入政府執政，以維護優勢的地位。……我懇切地

---

頁 34。

<sup>248</sup> 李鴻禧，〈革新政府執政黨結構，回歸民主憲政體制〉，《中國論壇》300（1988.3.25），頁 17。

<sup>249</sup> 胡佛，〈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中國論壇》52（1977.11.25），頁 16-17。

希望執政黨以開闊的心胸與嶄新的觀念來推動政黨政治，調整政黨之間的關係。<sup>250</sup>

1986年，就台灣民主政治的現實發展而言，是個關鍵性的階段。醞釀已久的黨外政治力量，不斷尋求走向組織化，與國民黨宣稱打壓的政治壓力之間，形成一股緊張的拉距。在民進黨成立前後，陶百川、胡佛、楊國樞、李鴻禧四人，扮演著朝野溝通的中介角色，而其中有三位正是《中國論壇》編輯會委員，對台灣政黨政治的奠基亦留下貢獻，輿論界遂有「自由派」學者的稱號。當時陶百川、胡佛、楊國樞、李鴻禧分別與執政黨及黨外人士接洽會晤，對雙方態度了解之後，成爲一座意見交換的溝通橋樑。

1986年5月10日，國民黨與黨外在陶百川等人的邀請下，首度進行溝通。經過商談後，作出的共同決議，是以中華民國憲法做爲處理組黨事宜的基本原則，且雙方均表示有信守的誠意。同時，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宣告成立，象徵黨外正式走向全國性組織的開始。9月28日，黨外人士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9月30日，四位中介人士發表聲明，希望朝野雙方謹慎行事，應以和諧安定的原則避免激烈衝突，盡量進行協調，使民主憲政真正落實。胡佛指出：

自從促進溝通以來，因各種事故的產生，使得進展遲緩，不如預期，他們曾一度考慮是否繼續進行溝通，現鑒於時局的急需，社會的寄望，以及執政黨及無黨籍人士仍一再表示皆具有溝通的誠意，他們將不顧個人的毀譽與成敗，繼續促進溝通，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努力。<sup>251</sup>

---

<sup>250</sup> 胡佛，「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32（1981.3.25），頁21-23。

<sup>251</sup> 《中央日報》訊，〈本黨政策會發表聲明正告無黨籍人士，莫輕易嘗試任何違法激烈之行動〉，《中央日報》（1986.10.1），收於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縣：國史館，2000），頁592-595。

1986年10月，胡佛在「回歸憲政：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座談會裡，提到黨內外溝通中的憲政共識問題時，希望黨外能認同中華民國憲法，而此項呼籲乃透露出他對黨外台獨色彩之疑慮。他說：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認同的問題，本省同胞與外省同胞，台灣與大陸關係如果不能在憲法的基礎上作一整合，未來的政治發展則未見樂觀。現在黨內外溝通，仍然必須扣緊一個關鍵點，那就是憲政的共識。我們必須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溝通才行。中華民國憲法包含兩個觀念，一是中華民國的觀念，二是規範的觀念，能有這樣的共識基礎，政治發展才有前途。<sup>252</sup>

#### 4、楊選堂

其實最早在《中國論壇》談論在野黨問題的是楊選堂。1977年的地方選舉，黨外大有斬獲，同時發生中壢事件。楊選堂隨即發表〈一喜一憂〉評論，喜的是全體選民熱烈的參與及對民主政治的嚮往，憂的事情則為當天民眾焚毀警局及警車的暴力行爲。他說：

人們或者強調民主的權利，而忽略或者根本否定了法治所要求的義務，甚至發生破壞法律的言行。……

人們或者同時強調民主法治，而不能同時循民主法治的正當途徑來爭取與維護民主法治；卻使用了對抗民主法治的手段，來尋求不正常的公正與公平。<sup>253</sup>

1979年間，由於青年黨主席李璜回國召開該黨會議，民社黨主席之一的蔣勻田則「回歸」中國大陸，在野黨一時成爲海內外矚目的焦點。1979年8月，楊選堂隨即發表〈在野黨自處之道〉，他質疑爲何台灣經歷了三十

---

<sup>252</sup> 胡佛，「回歸憲政：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66(1986.10.25)，頁57。

年的和平時間，還不能發展一個或數個健全而有作為的在野黨？或者說，爲什麼在野黨在台灣這民主憲政的局面下，竟然壯健不起來？楊選堂指出：

可能有人說，這是執政黨不讓在野黨發展，阻遏或是壓制在野黨活動的緣故。這話初聽似乎很動聽、有理由的；其實，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野黨本身不夠長進。何況，說句公平話，執政黨也並沒有怎樣為難在野黨，反過來說，如果在野黨真有理想，真有作為，真能擇善固執，團結奮鬥，是無人也無力量可以阻遏其發展的。……最怕的是在野黨既不能積極的自強，又不能「安貧樂道」的守住政治理想善於自處，循至互相傾軋，不唯不加強團結，反而鬧分裂運動，那就不祇在執政黨看來，只是政治上的點綴品，在人民心目中，更是毫無分量可言了。<sup>254</sup>

楊選堂認爲民、青兩在野小黨乃「咎由自取」，不能怪任何人，尤其和國民黨無涉。此一論點實與前述李鴻禧、胡佛所稱國民黨對兩小黨進行壓抑、分化和輔導的說法大相逕庭。

1979年9月，楊選堂在〈相爭而和諧〉中表示：

民主政治的競爭是理性之爭，不是意氣之爭；是民意政治，不是暴民政治；是在競爭中取勝於對方，而不是排斥對方的競爭；是依循法律的和平競爭，而不是破壞法律的暴力衝擊。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來維護政治競爭的和諧。<sup>255</sup>

楊選堂樂見黨外人士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政治競爭，但仍強調其一切以法律爲依歸的說法，更反對有任何的「暴力」行爲。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後，1980年國民黨當局決定恢復辦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並擴大選舉名額。楊選堂便以〈民主憲政的再

---

<sup>253</sup> 楊子，〈一喜一憂〉，《中國論壇》53（1977.12.10），封底裡。

<sup>254</sup> 楊子，〈在野黨自處之道〉，《中國論壇》94（1979.8.25），封底裡。

<sup>255</sup> 楊子，〈相爭而和諧〉，《中國論壇》96（1979.9.25），封底裡。

開展〉一文讚揚這項決定，同時對美麗島事件作了若干回顧。他指出：

「美麗島暴力事件」誠然是非常不幸的，對於民主憲政的推展，具有危險性的挑戰，因為它可能促使某種「反撥」觀念的抬頭，強調維護國家社會安定與安全的理由，而使民主憲政的腳步停頓甚或倒退。令人欣慰鼓舞的是，執政黨與政府很開明的應付了這一挑戰，並沒有因此而躊躇猶豫，反而順應輿情民意的制訂了選舉罷免法，並定於本年十二月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尤其擴大了選舉的名額，這都使海內外關懷民主憲政前途的同胞，為之喜出望外。……

同樣可欣慰鼓舞的，乃是民主憲政的推展，經「美麗島暴力事件」的挫折後，除了極少數的海外「台獨」分子外，海內外同胞都能以更冷靜、更理性、更現實的來看國家民主憲政的問題與前途。大家都認識到，民主憲政的推展，必須遵循一定的制度與軌道；不論看法如何，主張如何，但是必須是非暴力的。這種非暴力與反暴力的認同，不祇是有利於國家社會處此反共危境中的維持安定與安全，更有利於國家社會現代化的實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雖然有許多不同的標誌，而不以非民主的暴力來推展民主，則是基本的指標。<sup>256</sup>

楊選堂擔憂「反撥」觀念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抬頭，一旦遇著他心目中所謂「以非民主的暴力來推展民主」的黨外人士時，楊氏不免顧慮「反共危境」中的「安定」與「安全」問題，以及國家社會的現代化前景。

## 5、林嘉誠

在林嘉誠的文章中，也有兩篇涉及政黨政治問題。1979年7月，正值黨外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時刻，林嘉誠在〈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

---

<sup>256</sup> 楊子，〈民主憲政的再開展〉，《中國論壇》116（1980.7.25），封底裡。

檢討台灣的政治參與現況：

政治團體有凝集政治意見與結合政治利益的功能，政治現象是這些代表性政治團體在公平合理的競爭過程中，達成協調折衷與均衡。允許具有代表性人士組成政治團體，可以加速政治的對話與相互了解，減緩衝突緊張壓力，增進團結。……我國由於歷史因素、現實環境等影響，政黨型態十分特殊。執政的國民黨一枝獨秀，其他在野的青年黨與民社黨力量十分懸殊，反而逐漸引起注視的一股號稱無黨無派的社會人士勢力日益抬頭。……由他們所獲得選票比率與支持贊同他們主張的人士分析，他們的活動是不可忽視的。

然而，林嘉誠並未主張開放黨禁，他的建議是：

欲在此時此地提供參與政黨的機遇，主要由二方面著手，第一，執政黨內部的民主化，使更多的黨員能在黨內扮演更積極角色；第二，疏導無黨無派社會人士的政治情緒，使其力量用於積極的政治建設，而不致流於成為破壞政治與社會安定的因素。<sup>257</sup>

於黨外時代中，林嘉誠算是最常在《中國論壇》為文探討黨外政團的發展問題者，且往往緊跟著對選舉的分析而來。1981年年初，時值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和辯護律師紛紛高票當選民意代表不久，林嘉誠在〈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中，對此有以下評語：

所謂黨外人士，在近十年來異軍突起，令人無法視而不見。他們的崛起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有密切的關係，雖然高雄事件的發生，令人扼腕，可是，由年底選舉過程與結果顯示，他們仍是僅次於執政黨的政治勢力。在經歷高雄事件的教訓之後，黨外人士此次選舉所採取的策略與顯示的形象，似乎溫和理性不少，設法將他們納入

---

<sup>257</sup> 林嘉誠，〈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中國論壇》92（1979.7.25），頁45。

民主政治運作常軌，對國內未來團結將有實質而深遠的號召。<sup>258</sup>

1980年的選舉雖使得黨外陣營開始復甦，但在1982至1983年間，黨外勢力的發展亦曾一度受挫。1982年6月起，部分黨外雜誌以5月中旬黨外立委放棄杯葛警總一事<sup>259</sup>做為導火線，對黨外中央民意代表的議會功能提出質疑，進而發展出長達一年餘的「路線之爭」，其中包括「杯葛」與「妥協」、「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等爭議，同時掀起密集、持續的「批康」風潮。<sup>260</sup>迄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之前，黨外新生代先行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即「編聯會」），並在選舉中全力支持「美麗島系統」的人士參選，以和康寧祥等黨外主流勢力醞釀中的「黨外中央後援會」分庭抗禮，而後援會本身亦因參選人數眾多，互不相讓。種種因素輻輳之下，終至影響到黨外陣營的整體戰績，尤以康寧祥等「主流派」人士的落選，最受島內外各界震驚。<sup>261</sup>相對地，國民黨則大獲全勝。

關於上述選舉結果，林嘉誠1983年在〈七十二年立委選舉結果的政治觀察〉分析指出，就黨外政團的致命點而言，由於其內部的爭議，造成「參與爆炸」，降低當選率，雖然整個獲票率並未降低，甚至還有部分選區擴大了新的票源。此一現象表示黨外支持者仍願意支持黨外政團，黨外政團應發展這些基礎；但是，黨外內部協調力的不夠，彼此過份暴露內部缺點，必會影響擴充票源的機會，也使此次選舉收益甚微。黨外溫和改革者全軍覆沒，美麗島連線也有半數出局，說明黨外主要支持者並未明顯傾向任何

---

<sup>258</sup> 林嘉誠，〈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中國論壇》11：7（1981.1），頁8。

<sup>259</sup> 康寧祥，〈立法院「杯葛」風波〉，收錄於氏著，《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83），頁153-156。

<sup>260</sup> 康寧祥，〈主體意識的紛爭—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錄於氏著，《危機與希望》，頁135-151。

<sup>261</sup>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頁189-195。

一方，黨外未來如欲東山再起，內部的高度整合與成員的協商能力，將成爲必要條件。林嘉誠如此表示：

黨外政團在立委選舉的挫敗，馬上產生在立法院制衡功能的降低，此種現象除了立法院的內部運作有直接影響之外，最主要的意義，在於黨外政團是否因此更忽略了議會民主的功能。過去若干黨外菁英即使在立法院有卓越表現，還是引起若干黨外人士的不滿，如今，黨外在立法院影響力更爲降低，執政黨在國會影響力相對提昇，黨外政團可能將黨外活動從立法院擺回其他地點。整個黨外路線與策略，將議會問政的重要性加以刪減，如此，黨外政團與執政黨的關係是否會傾向緊張，對整個國內民主化運作的利弊得失何在，深值正視。……此時此刻，黨外人士務必運用高度政治智慧，由此次選擇中吸取教訓，新當選者、過去對黨外有貢獻者、黨外新生代、黨外刊物主事者、黨外各級民意代表，大家坦誠的交換意見，爲黨外未來尋找出路，多方了解民意的結構與傾向，掌握政治環境的特色，剖析黨外內部的問題，群策群力爲黨外未來的發展方向，找出定位。執政黨、學者專家有義務從旁協助，使受到震盪的黨外，早日恢復常態，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正面角色。<sup>262</sup>

1985年，林嘉誠在〈蛻變中政局的觀察與展望〉中，針對公政會的取締問題，作了一番評論：

民主國家，人民本有集會結社自由，我國處於特殊情況，乃有「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此種與民主國度不同的法令繼續生效。……內政部長宣布欲取締黨外公政會，其中法律依據、政治現況與政治後果，的確需要三思而後行，幸賴政府並未馬上行動，而是採取溝通程序，最後又答允公政會易名登記。由較長遠的觀點而論，愛好

---

<sup>262</sup> 林嘉誠，〈七十二年立委選舉結果的政治觀察〉，《中國論壇》197（1983.12.10），

民主的自由人士，當然希望有朝一日達到完全的結社自由，目前所依據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改為社會團體法，將同一地區同一性質以一團體為限的規定取消。多元化社會，團體的成立是十分正常的，如同雜誌登記一樣，政府應該依法授理，不因人而異，也不因團體性質而異，凡是合法，合於規定的團體均准予成立。

對於黨內外的溝通結果，林嘉誠則認為：

在四位極富聲望的自由派學者調解之下，執政黨作了一項令人額手稱慶的決定，准許黨外人士以政治建設研究會名義登記成立新團體。了解國內政治的人士不難想像，執政黨此種作法相當不易，對於緩和黨內外的政治對峙也有助益。……持反對易名登記的黨外人士，所持理由較為牽強，是否冠上黨外二字並不重要，焦點應在未來新社團如何運作。反對者高談政治理想與民主原則，本是無可厚非，可是實際政治既然如此，能夠有所轉圜，何必原地踏步堅持不變。<sup>263</sup>

## 6、韋政通

1986年年底，在民進黨剛成立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期間，韋政通傾向支持黨外人士。除了韋政通自己以外，還包括楊國樞、李鴻禧、張忠棟等多人，都曾經對康寧祥表示過支持的態度。1987年2月，韋政通於「談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座談會發言說：

……在這次選舉時，我們幾位朋友不但簽名支持一位黨外的立法委員候選人，而且還寫短文支持。……當初我會去支持一位黨外的朋

友，是因為在台灣，黨外遭受到很不公平的選舉規範。<sup>264</sup>

對於黨外勢力的歷史發展及貢獻，1988年韋政通在〈儒家與台灣的民主運動〉曾總結如下：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中壢事件」，使台灣的民主運動走向一個新的階段。在此之前，主導運動的，大體上以知識分子為主，之後，民間的政治運動家紛紛崛起，一直居於運動的領導地位。事件起因於選務糾紛處理不公，遂引發「二二八」事件以來罕見的一次群眾暴動。這一天午夜，五項地方公職選舉揭曉，黨外人士獲得空前勝利，即使在不公平的選舉法令嚴格限制下，黨外仍能獲得約百分之三十的選票……鼓舞了更多的反對人士在嗣後的各項選舉中熱烈參選之外，最重要的是事件之後，因民間的街頭政治活動日多，掃除了長期籠罩在台灣社會的政治恐懼的陰影，使以往視為禁忌的一些政治性敏感話題，都可以公開談論，為往後的民主運動做好了相當程度的心理建設。這方面的進展，雖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又發生「高雄事件」，並未受多大影響，在「高雄事件」軍法審判期間，經由公開辯論和報紙的大幅報導，反而使黨外人士的觀念、想法，有機會傳到社會每一角落。……近十年來黨外政治運動最大的成就，是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成立了「民主進步黨」，這不僅是在台灣，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為它純是發自民間的一股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沒有這種力量，一黨獨霸的政權，很難自動走向民主，近兩年的改革，比以往任何時期的速度都加快，就是這股力量與國民黨政權互動的結果。

不過，韋政通固然對黨外運動甚為肯定，但同時也批判了當年一些黨外雜誌的「反智」言論：

---

<sup>264</sup> 韋政通，「談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74（1987.2.25），

黨外政治運動中的反智現象，與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反智現象，有同也有不同，傳統的反智主要是為了迎合帝王、討好權貴，現在是為了迎合群眾、討好群眾，對象雖不同，而其只是為了滿足己身的利益，不惜「曲學阿世」，並放棄知識分子的職責，正是一致的。這種現象，不論古今，都與崇尚理性、自尊尊人的民主精神嚴重相悖。<sup>265</sup>

1989年，韋政通在〈科學、民主、反傳統——以「台灣經驗」反省「五四」〉回顧四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歷程時認為，《自由中國》後期有關反對黨問題的密集討論，不僅為反對黨的成立提供理論根據，也為台灣民主運動的未來，指出清晰且重要的目標，而這一點為「五四」時代倡議民主者所未及的。<sup>266</sup>

### （三）綜合評析

綜觀本節所述，1979年間，《中國論壇》社論和張忠棟均曾呼籲國民黨落實政黨政治或制訂規範政黨活動的法規，但是不久之後因美麗島事件發生而告中斷。1981年此項訴求再度為該刊編委會學者群連署提出，且李鴻禧、胡佛等人也陸續有所建言。雖然胡佛與張忠棟、李鴻禧相較，有關政黨政治的論述量較少，但其所指陳的民、青兩在野小黨之問題，正和李鴻禧的看法遙相呼應。胡佛亦希望就戒嚴、黨禁等屬於政治規範的問題進行檢討，建立共識。至於民社、青年兩小黨遲遲未能壯大的問題，胡佛和李鴻禧皆歸因於國民黨之壓抑；而楊選堂卻主張是因為在野黨不夠自立自強、互相傾軋，與前者立足點堪稱南轅北轍；至於林嘉誠則認為這是受到歷史因素和現實環境之影響。

---

頁 12。

<sup>265</sup> 韋政通，〈儒家與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國論壇》313（1988.10.10），頁 40-41。

<sup>266</sup> 韋政通，〈科學、民主、反傳統——以「台灣經驗」反省「五四」〉，《中國論壇》327（1989.5.10），頁 60。

1977年，楊選堂雖然是最早在《中國論壇》評論黨外運動的撰稿人，但大多是批判貶抑；而張忠棟則是首位肯定、同情黨外人士者。美麗島事件之前，楊選堂將黨外人士定位成「暴力集團」，並且稱許執政黨的「民主」風範。1978年張忠棟則是首位肯定、同情黨外人士者。至於張忠棟等人均期盼國民黨政府能貫徹民主憲政，並呼籲不同政治立場者彼此寬容，切莫為社會帶來兩極化的衝突。

自1978年黨外反對運動日趨壯大之際開始，《中國論壇》即對其有所貶抑。在美麗島事件之前，該刊心目中的黨外陣營乃一慣用激情言論煽惑民眾、流於暴力的團體。到了黨外公政會時代，《中國論壇》終能肯定黨外人士長期推動台灣民主改革之貢獻，惟對部分急進派抵制溝通、訴諸群眾運動的行為深表反感，或許是美麗島事件的「夢魘」依舊未除之故；另一方面，由被動呼應國民黨當局的有限度改革，進而主動援引黨外的政治訴求來向政府建言，並逐漸視黨內外兩造為對等的政治團體，亦是一大轉變。林嘉誠個人的諸多意見基本上與《中國論壇》社論相符，不過，林嘉誠對於黨外陣營的內部問題之分析能力，實非《中國論壇》社論得以望其項背。或許正是因為由瞭解而產生同情，使得林嘉誠評論黨外急進派人士時，也較《中國論壇》社論立場溫和。

到了1981年年初，李鴻禧、林嘉誠開始對黨外運動的復甦與內部問題進行探討，其他如胡佛、韋政通等人也陸續作了觀察，而胡佛則希望黨外能揚棄台獨思想或認同中華民國憲法。1986年之前，雖然《中國論壇》沒有出現新的社論，但是學者個人（如張忠棟、李鴻禧等）則為黨外公政會的合法化、開放黨禁出了不少心力。在公政會的取締問題方面，胡佛等四位學者曾扮演著黨內外協調溝通的中介角色；後來，李鴻禧和林嘉誠等人復進一步提出公政會合法化之必要性。

民進黨成立以後，《中國論壇》社論（1988年改版取消）仍念茲在茲地呼籲民進黨揚棄「群眾路線」和「台獨暴力意識」，並希望該黨能改變過

去那種「爲反對而反對」的黨外心態，早日蛻變成一現代政黨。在學者個人部分，張忠棟、李鴻禧、胡佛、林嘉誠、韋政通等人皆以言論或行動來支持肯定民進黨；不過，楊選堂和黃光國二人，一樣對民進黨的台獨傾向有所疑慮，呼籲該黨「民主優於統獨」、「認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 第五章 結論

本章「結論」，第一節總結《中國論壇》半月刊對台灣自由民主的時代意義，期能將《中國論壇》的角色與定位突顯出來，予以適切的歷史評價。第二節討論《中國論壇》半月刊的局限，以及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環境。

### 第一節 《中國論壇》的時代意義

本節將呈現《中國論壇》半月刊的時代意義，而論述核心有兩大面向：首先藉由縱面向跨時代的垂直比較，說明該雜誌在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脈絡中的傳承角色；接著透過橫面向同時代的平行比較，探討其自由民主主張的實踐情形，以及與時代的互動關係。

#### 一、思想脈絡：《中國論壇》與戰後台灣自由主義傳承

從 1949 年的國民政府遷台到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都是圍繞在政論雜誌中展開的，例如：1960 年《自由中國》雜誌企圖組建中國民主黨，然未獲成功；1970 年代初，《文星》和《大學雜誌》促進了政治革新運動的興起和發展；1970 年代末的黨外運動，亦以一系列的雜誌為基礎，而其中最早的是 1975 年創刊的《台灣政論》。政治反對運動在政論雜誌的培養下發展壯大，多少繼承了「文人辦報」的傳統，而這傳統的起點是梁啟超 1905 年在北平創辦的《中外公報》。在這個傳統下，政治領袖在新聞記者隊伍中產生，因此雜誌便成為提供新思想的主要來源。<sup>267</sup>

---

<sup>267</sup> 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 287。

雜誌為何會與台灣的反對運動產生息息相關的密切關係，實有其普遍因素，也有與台灣特殊的政治文化有關者。一般來說，辦雜誌所需的啟動經費較少（相較於報紙與廣電），亦較有彈性，可視情況調整出刊方式，從週刊、半月刊、月刊到叢書均可，一旦查禁，也可用另一個名稱遞補，故以整體效益而言，對反對派人士是較為有利的。其次，在政府當局看來，雜誌的傳播性不如報紙和廣播，因此對政權的威脅性較小，影響的範圍也有限；加上處理善後較為方便，能夠隨時查扣、查封，不同於廣電一經播出乃無法收回。此外，雜誌可以當作釋放社會上反政府意見的管道，而此管道對政府來說，是較安全且最易於管制的。<sup>268</sup>

在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程裡，自然是以報章雜誌來扮演啓蒙批判的角色。自國府遷台以來，台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探討國家發展的論述，先後刊載於《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等刊物。至於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發展思想的開展，一般是以《自由中國》雜誌為發軔，後繼有《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刊物，以及論政團體「澄社」。按照時間先後來劃分的話，依序是：(一)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二)1960年代的《文星》、(三)1970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四)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的《中國論壇》；(五)到了1990年代以後，台灣已經沒有以宣揚自由主義為宗旨的雜誌，只剩下論政團體「澄社」標榜自由主義的信念。

《中國論壇》有別於早年《自由中國》、《文星》和《大學雜誌》純知識份子的「文人辦報」，可說是首次由「報團」（聯合報系）結合一群知識份子進行論政的方式。從《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半月刊，乃至到「澄社」，這條主張西方憲政主義式自由民主思想脈絡上，《中國論壇》半月刊的集結與經營階段具有關鍵性意義，亦即從先前的「文人辦報」模式，轉型為和報團合作的「企業經營」，最後再過渡成更具社會

---

<sup>268</sup> 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參與度「論政社團」。<sup>269</sup>

1975年10月10日創刊的《中國論壇》，曾經是台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集結起來發表言論的刊物，伴隨台灣發展走過十七個年頭，在1992年10月10日出完第三百六十五期後，便正式從歷史中退下。《中國論壇》這份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集結的書生論政刊物，雖然銷售市場狹小，但在聯合報系雄厚財力下，撐了十七個年頭。《聯合報》不計盈虧地持續贊助《中國論壇》，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論壇》像是《聯合報》的一塊「租界」，編輯方針和文章內容比較不受干涉。不過，這群努力對台灣社會問題提出針砭的知識份子，由於立場與觀點與聯合報系的差距，難免會有緊張的關係出現。長期累積下來的意見衝突難解，終究導致《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停止運作，結束了一頁知識份子與傳播媒介分分合合的滄桑史。<sup>270</sup>

一份雜誌在台灣要生存下來並不容易，特別是像《中國論壇》這樣一份「書生論政」的雜誌，市場更是狹小。《中國論壇》能在年年虧損下，屹立十七年而不倒，實在是因為有聯合報系的雄厚財力支持。當年聯合報系願意出資延攬知識分子籌辦，曾使人揣測是否要與同年創辦的《台灣政論》互別苗頭。不管此臆測是否屬實，如同《中國論壇》第四任編委會召集人韋政通所說的，到底有無此事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在一個威權的時代裡，努力扮演知識份子「言論發表的窗戶」此一角色，對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的介紹，或對台灣社會問題的針砭，都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

《中國論壇》是由一群富有時代關懷與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所催生的政論性雜誌，其言論立場帶有自由主義色彩，致力於倡導民主憲政，在當時台灣思想輿論界扮演著重要角色。若為《中國論壇》定位的話，可

---

1995，頁18。

<sup>269</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2-13。

<sup>270</sup> 餘曉雯，〈這扇飄送書香味的窗戶終於關上了——「中國論壇」歷來扮演的角色與停刊的原因〉，《新新聞周刊》291(1992.10.3-9)，頁74。

以說《中國論壇》是一份自由主義的刊物，其言論立場是知識份子為民主而倡導、批判，屬於一種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的「書生報國」表達方式。<sup>271</sup>編委會召集人韋政通這樣說：

《中國論壇》在一個極權的時代裡，努力扮演知識分子「言論發表的窗戶」此一角色，對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的介紹，或對台灣社會問題的針砭都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sup>272</sup>

關於「《中國論壇》到底是不是一本自由主義立場的雜誌呢？」的問題，或許這個問題應該反過來提問，變成「如果從自由主義在台灣發展的觀點來看《中國論壇》，那麼這本雜誌的位置在哪裡？」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發展，因為經過《自由中國》時代那種積極的、公開的實踐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政治理想，但卻遭致政權迫害的經驗，對年輕一輩的自由思想學者在選擇實踐路線時，產生相當的警惕與影響作用，因此從《大學雜誌》階段開始，「自由主義」往往成爲一個相對而言，隱而不顯的意識型態基礎。《大學雜誌》時代的自由主義，配合威權政權的權力交接，產生策略性的轉變，改以「革新」與「現代化」的訴求，來作為自由理想的實踐策略。

《中國論壇》的理想與實踐方向，主要是延續《大學雜誌》所強調的「革新」之基本方向。革新是溫和的，並不使用革命手段，因此是「改革」而不是革命。這個改革主義是進步主義的基礎，亦內含著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它是逐漸的，而不是要把它打爛掉再重新開始的那種，所以是著重效果取向的。<sup>273</sup>1975年以後的台灣社會，整個論述環境較早期以《自由中國》或《文星》雜誌為爭自由之言論代表的階段，已有相當之改進；加上《大學雜誌》時期知識青年的集結基礎，使得政治「革新」的立論有了初

<sup>271</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 (1992.10)，頁6。

<sup>272</sup> 原載於《新新聞周刊》第291期，轉引自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11。

<sup>273</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頁99。

步的基礎與言論空間。進入《中國論壇》階段，就知識份子爭取自由民主之社會實踐的發展過程而言，它所代表的階段性意義，主要是在相對寬廣的言論空間結構上，進行更多元的知識論述；同時，它也將知識分子爭取自由民主的言論主張與策略，透過相對於早期《自由中國》之「自由主義」言論主張而言，較為溫和與細緻的「現代化」、「多元化」論述具體展現出來。「現代化」與「多元化」相較於「自由主義」的直接訴求，在政治敏感上，較為溫和；在具體論述上，相對於早期自由主義者主要焦點均關注於憲政體制之民主自由的立論，則更具體關注到社會的各種不同層次。不可否認地，這也是知識份子對於「自由民主」概念的更細緻化表現。

從 1950 到 1970 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爭自由民主的知識論述，基本上是延續大陸五四時期爭自由民主的思想傳統；不過，此精神傳統也隨現實政治環境的變化，而在內容上更為具體，更加貼近政治現實的反映。從《自由中國》到《文星》，甚至到《大學雜誌》的發展，可說在這個精神傳統底下，因應不同時代環境，展現不同詮釋態度與表現方式。因此知識份子爭取自由民主的思想與論述，不能片面地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理念型來作為絕對標準，而是應該更貼近社會現實基礎來看，這些爭自由民主的思想如何在台灣社會中被孕育出來。如果要將《自由中國》、《文星》以降的知識份子爭自由的過程視為一精神傳統的話，則可以將它視為一廣義的自由主義，或是自由派。若不將之視為一傳統，亦可將之視為一個強調憲政民主自由之知識份子社會實踐的過程。

在《中國論壇》階段，一方面由於出資經營的《聯合報》帶有主流大眾傳播媒體的立場，使得雜誌一誕生便有其結構上的侷限；不過，在資方基本上尊重其獨立運作的前提下，《中國論壇》也延續了《大學雜誌》以來的現代化與革新的立場。至此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透過現代化訴求、多元社會的主張，來保障自由的可能性。若我們以江宜樺所整理之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出之六項「本質性」基本原則：個人權利、多元寬容、立憲政府、

國家中立、私有財產，以及市場經濟進一步來檢視《中國論壇》立場的話，儘管它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向的言論均不強烈地標榜或指向自由主義，不過其基本立場大致上是符合自由主義精神的。不過，或許用「自由派論述」或是「現代化論述」來詮釋，應該會更為貼切。<sup>274</sup>

## 二、實踐面向：《中國論壇》對自由民主的時代關懷

1986年這一年，在戰後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是劇烈轉型的關鍵時刻。《中國論壇》有關政治民主化與政治參與的言論，基本上也可以藉這個時間點分成前後二大階段來觀察。在1986年民進黨創立之前，觀察《中國論壇》各卷期政治論述主題取向可發現，主要在討論政治現代化的基本訴求，以及「選舉制度的研究與反省」與「地方自治」等政治主張的立論上。1986年以後，《中國論壇》議題論述焦點主要是兩大方向：(1)政黨政治、(2)中國／台灣（省籍）之結。該刊此後相關政治論述主題，則明顯不以原則性的政治民主化概念立論，而是進一步扣緊政治環境來具體分析與批判。換句話說，《中國論壇》從1975年代成立之際，到1986年民進黨成立以前的政治議題論述方向，偏重在選舉、地方自治等具體的、既有的制度層面之修正與檢討上，鮮少提到政黨政治的問題；至於政黨政治的討論，大多集中在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如此前後兩階段的發展，可用1986年5月25日出刊的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作為分界點。這一期的兩大座談會主題，第一個主題為「充實國會、維護憲政」座談會，討論主題鎖定在國會即將面臨大幅改革的前提下，如何設計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國會制度問題。另一主題為「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的座談，針對黨外問題所造成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僵局，提出理解與解決之道。因此，我們可以將此一期視為《中國論壇》反映政治時勢變遷的象徵性分水嶺。

---

<sup>274</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頁150-151、174-175。

1986年，就台灣民主政治的現實發展而言，是個關鍵性的階段。醞釀已久的黨外政治力量，不斷尋求走向組織化，與國民黨宣稱打壓的政治壓力之間，形成一股緊張的拉距。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前後，陶百川、胡佛、楊國樞、李鴻禧四人，扮演著朝野溝通的中介角色，而其中有一位正是《中國論壇》編輯會委員，對台灣政黨政治的奠基亦留下貢獻，輿論界遂有「自由派」學者的稱號。當時陶百川、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分別與執政黨及黨外人士接洽會晤，對雙方態度了解之後，成爲一座意見交換的溝通橋樑。胡佛、楊國樞和李鴻禧等人，透過陶百川的協助，不斷向國民黨協商，幫助民進黨成立時免受政府鎮壓，在政黨政治發展史上仍有不可忽視的貢獻。《中國論壇》編委會第四任召集人韋政通如此評論他們所作的努力：

他們爲了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雖同情並支持黨外的民主運動，但始終堅持漸進改革之路。由於態度理性開放，不走極端，專業水準也較高，因此賦予自由主義以新的生命，並能帶動輿論，重建自由主義的社會聲望。<sup>275</sup>

威權體制支配者爲了淡化非民主色彩，在不動搖政權本身的前提下，允許有限的政治參與管道。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這項管道便是國民黨所限定的政治異議尺度，以及所操控的定期公職人員選舉；二者構成有限度的民主空間。在這狹隘的空間裡，只要言論不影響國民黨的政權與權力分配、不懷疑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不侮辱最高領導人、不散播馬列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等，政治異議與活動仍可在黨國機器虎視眈眈、伺機輾壓高風險環境中苟延殘喘。雖然強人允許的政治異議與活動，氣息微弱如強風下的燭火，但也滴水穿石、涓滴匯川，逐漸構築成理性問政傳統。因此，《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宣揚民主自由、社會改革、回歸憲政等政論刊物仍可持續傳承。這股由學術界、輿論界具有學術良知

---

<sup>275</sup> 韋政通，〈推廣民主教育，發展民主文化——爲自由主義者重定位〉，《中國論壇》356 (1990.7.25)，頁 2-3。

之開明知識份子所形成的清流，既不可能組織動搖國民黨政權的勢力，亦未超出國民黨所能容忍的言論尺度，故能在戒嚴時期發揮政治啓蒙、啓迪民智的功能，善盡知識份子諫諍、以言論報國淑世的責任與使命。

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環境的進展，學術界、輿論界的開明改革力量逐漸茁壯。在美麗島事件中，陶百川等人為政治受難者的權益向蔣經國陳情力爭，使得蔣經國總統不勝其擾，間接地請人轉告不要再提此事，而此一訊息被警備總部解讀為是整頓行動的授意，於是便發動圍剿陶百川。在警總圍剿陶百川之際，輿論界、學術界挺身聲援陶百川，包括胡佛、李鴻禧、楊國樞與張忠棟四位《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最後終於使警總致歉、議處失職人員。1986年，在陶百川主持下，由胡佛、李鴻禧、楊國樞等人士，促成黨內外三邊的溝通會談；不但緩和朝野對立衝突局面，也強化蔣經國推動民主改革的決心，為解除戒嚴等民主工程奠下基礎。<sup>276</sup>

回顧《中國論壇》發行時代背景，從1975年在戒嚴和動員戡亂時期創刊，期間歷經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解嚴和開放黨禁、報禁，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與國會全面改選，直到1992年停刊，總共發行十七年的時間。《中國論壇》面對威權統治的客觀環境，致力於鼓吹自由民主、憲政改革，對戒嚴、報禁和黨禁解除，政黨政治推動，動員戡亂時期停止，以及國會全面改選，都發生思想啓蒙與社會力量興起的激發作用。綜觀《中國論壇》這十七年的歷史，橫跨台灣政治發展由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治的重要階段。《中國論壇》是一份對時代變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論刊物，為這一「大時代」的歷史作了見證。正如《中國論壇》發行人楊選堂在停刊號所寫的〈由創刊到停刊〉提到：

在過去十七年所發生的每一項重大問題，都可以在《中國論壇》找到專題的探討。翻讀十七年的《中國論壇》，可知天下事，可明學術

---

<sup>276</sup> 朱高影，〈威權體制下的諍臣——陶百川的政生涯（1949-1986）〉，中正大學歷史

發展，可察社會變遷脈動，可解時代發展，是解讀十七年來中國問題、台灣發展、世界大勢的最好學術資訊與歷史文獻。<sup>277</sup>

《中國論壇》的政治立場，可歸類於帶有「中間派」色彩，且具國民黨改革色彩的政論雜誌刊。其大體上是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認為應該由國民黨來主導不同程度的改革，並主張溫和漸進式的體制內改革。《中國論壇》從未間斷地持續發行了十七年，《中國論壇》的文章形式與風格，注重學術的架構，文筆也較學術性的，沒有那麼激進、尖銳，因此比同時代大多數的政論雜誌（尤其是黨外雜誌）走了更長的道路。1990年，《中國論壇》剛好創刊滿十五年，同時也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停止運作，以及以「半月刊」形式發行的最後一年。在1980年代後期政治大環境的劇變衝擊下，「中國論壇派」幾經努力調適無效後，終究鬆解了。楊選堂寫了一篇〈十五年的參與和感懷〉，以「眷戀」心情去述說《中國論壇》半月刊的成就：

回顧十五年來的本刊，它雖然不能說具有永恆的影響，不過，十五年的日積月累，年復一年的朝向國家社會現代化目標的努力，中國論壇社結合海內外知識分子所發揮的「鼓動風潮」作用，我深信，在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在社會開放進步的變遷過程中，在思想言論自由的擴展過程中，都有深長廣泛的影響。我深信，檢驗台灣過去十五年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現代化演變，《中國論壇》半月刊的貢獻會受到肯定，將來史家會把《中國論壇》當作中國知識分子運動在這個時代的一種標誌，一個繼往開來的里程碑。<sup>278</sup>

---

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202。

<sup>277</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 (1992.10)，頁10。

<sup>278</sup> 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頁7

## 第二節 《中國論壇》局限與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環境

本節首先將說明《中國論壇》做為一份知識份子、學術性政論雜誌所遇到的發展困境，以及編輯委員會與《聯合報》系的分合關係。

### 一、《中國論壇》的局限

前面提到《中國論壇》半月刊的集結和經營特色，是一種與報團（《聯合報》系）合作的「企業經營」模式，想要克服先前「文人辦報」容易經營不善的困難，並藉由報紙媒體的通路和支援來擴大影響力。然而，這一份偏學術性的知識份子刊物還是克服不了市場狹小、連年虧損的命運，幸虧有《聯合報》系不計成本的支柱，方能一直支撐了十七年才結束。縱使《中國論壇》在第十五年發生編委會分裂解散的情形，亦沒有造成《中國論壇》半月刊的停刊，改版成月刊後，又繼續支撐了兩年；直到《聯合報》以在香港發行《香港聯合報》，可以取代《中國論壇》的角色為理由，才決定其停刊的命運。當初《聯合報》系創立《中國論壇》的動機，多少帶有要包裝《聯合報》系開明形象的目的，並為執政當局提供建言和規諫。例如1981年雙十節聯名發表的〈「報禁」應予開放〉文章中，主張開放報禁，固然是自由派學者崇尚民主的象徵，另一方面，在《聯合報》系方面出於限印政策所帶來的財務損失的情形下，未嘗不是受到所屬報系既得利益的呼應和支持。

資方《聯合報》雖然大致上尊重《中國論壇》委員會編輯方針，但因為彼此立場與觀點的差距，難免還是會有緊張的關係出現，甚至受到《聯合報》的壓力，包括更改文章詞彙、抽換部分內容、延期出刊或刪稿的方

式，而掩蓋它的自由主義立場。隨著編委會學者的個人意見日益凸顯，與《中國論壇》社論和《聯合報》系立場的衝突便越演越烈。誠如李金銓所言：「自由學界與報團儘管動機南轅北轍，卻淹沒於共同爭取解禁的旗幟下。」<sup>279</sup>《中國論壇》編委會自 1981 年，亦即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結束次年起，呼籲政府開放報禁，並重視言論自由的爭取與保障，而以司法為最後仲裁之依歸，值得吾人加以肯定。然而，該刊對於國民黨政權掌控媒體，公器私用，未能嚴加批判，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當報禁開放之後，除了李鴻禧曾抨擊國民黨政權——尤其是軍方壟斷或獨占傳播資源之不當、主張重新加以分配外，其他作者雖亦認知到問題之嚴重性，但卻沒有持續、積極地批判。《中國論壇》既贊成人民應享有合法的完全言論自由，又主張政府應斷然取締違法的任何言論。該刊認為執政黨與政府對於言論自由帶有雙重標準，一方面缺乏容忍透過合法方式批評的胸襟，另一方面卻容忍了一些違法、激烈的言論。

《中國論壇》這種視台獨人士為毒蛇猛獸，卻又爭取言論自由的微妙心態，應與該刊早年「揚統批獨」的社論風格，以及內部學者「民主優先於統獨」的立場有關。《中國論壇》的「恐獨」心態，也連帶影響到其對言論自由之捍衛。民進黨成立以後，《中國論壇》社論仍念茲在茲地呼籲民進黨揚棄「群眾路線」和「台獨暴力意識」，並希望該黨能改變過去那種「為反對而反對」的黨外心態，早日蛻變成一現代政黨。在學者個人部分，張忠棟、李鴻禧、胡佛、林嘉誠、韋政通等人皆以言論或行動來支持肯定民進黨；不過，楊選堂和黃光國二人，一樣對民進黨的台獨傾向有所疑慮，呼籲該黨「民主優於統獨」、「認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1980 年代末期，統獨議題逐漸浮上檯面。由於中國／台灣(省籍)之結，影響到台灣人民的認同態度，而認同差異所造成的社會分化，逐漸形成社

---

<sup>279</sup> 李金銓，〈說什麼，不說什麼？——再看字裡行間·再聽絃外之音〉，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 271-272。

會內部的不可忽視張力。此發展也開始衝擊到知識份子本身的價值取向，使《中國論壇》編輯委員在此一階段之後，產生不同的文化認同立場。此議題在《中國論壇》的論述主題之中，雖不曾出現於 1980 年代初期之前，但是在 1980 年代末期，台灣反對運動的台獨主張日益明確，《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群亦產生了省籍與統獨情結，不能免除整個大環境兩極對立摩擦的影響，造成內部的意見衝突增加。在《中國論壇》編委會成員中，多數是支持國民黨或統派的，不過也有些是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和獨派人士，因此在結構上具有高度異質性。最後《中國論壇》便因為「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摩擦，終究導致 1990 年編委會的崩解，學者群隨之分道揚鑣、曲終人散。

關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的「統獨光譜」，從 1980 年代後期到 1990 年代前期，明顯持「統一論」者，是社論和楊選堂；不統不獨、又統又獨者，是將中國的統一放在不可知的未來，有黃光國、韋政通、胡佛、楊國樞、文崇一等人；「反統一論」者，其中李鴻禧和蕭新煌傾向台灣自決，而張忠棟則支持台灣獨立。根據陳重生的研究，此現象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中國論壇》半月刊十五年來，「統一論」始終是該刊的意見主流，尤其藉著社論的方式「抑統揚獨」，更加凸顯中國色彩。<sup>280</sup>第二、《中國論壇》最常談到的「民主優於統獨」理念，主要是「統一論」者所發，至於「反統一論」者雖也偶有提及，但是並不明顯。第三、在學者個人部分，省籍的不同是決定其所持統獨立場的關鍵。主張「統一論」者，除了黃光國有一半台灣色彩外，清一色是外省人或外省人第二代。至於主張「反統一論」者，除了張忠棟外，均是在地的台灣人。張忠棟早年原本也是「統一論」的支持者，然隨者海峽兩岸主、客觀情勢的改變，身為外省人的張忠棟毅然決然地加入本土色彩濃烈的民進黨，成了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學界主將

---

<sup>280</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政治大學新聞

之一，而其急進的程度，甚至超過李鴻禧和蕭新煌，堪稱是《中國論壇》編委會中的異數（不過此時張忠棟已退出該刊）。

就「中國論壇派」來說，至少在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之前，這群學者一直是以「敦厚、拘謹」的風格論政，顯得「流於清議，短於行動」，受限於傳統式「規勸」的知識份子角色，以致於僅對自由民主思想的傳佈與知識青年的啓蒙產生影響。例如在 1986 年舉辦的「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研討會，楊國樞在總結報告中，把胡適、殷海光、陶百川和徐復觀等四人稱作「巨大的」知識份子，希望知識份子能以他們為榜樣。不過，當時的知識份子比起 1930 到 1950 年代擁有更多的資源，個人是否「巨大」已屬其次，若能透過團體的協調運作，以及與其他團體間的互助合作方式，必能發揮昔日所達不到的影響力。如此期待胡適型「巨大的」知識份子來領導，終不免錯失改革的良機。<sup>281</sup>

《中國論壇》首度由作為主流大眾傳播媒體（企業）的《聯合報》，主動集結並出資經營的言論刊物。知識份子在此一合作關係下，一路走過十五年，經歷台灣社會從威權到民主的最關鍵階段，到最後在台灣民主政治轉型之最劇烈階段，走出「知識分子作為客觀中立之第三勢力」的實踐路線，同時也結束與《聯合報》的這一段合作關係。造成《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的結束，儘管主要是因為大環境結構因素所造成，非個人力量所能扭轉；但是從主體的行動面上來看，知識份子選擇結束此一合作型態，卻也顯示出一明顯的角色特質：在變動的環境中，重新尋找啓蒙實踐的可能性。因此顯示出的反而是個積極的意義，畢竟從 1980 年代中期，知識份子介入協調朝野間之緊張關係開始，強調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也逐漸走出所謂客觀中立之「中間路線」格局，並促成「澄社」的成立。所以就客觀

---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401-402。

<sup>281</sup> 陳儀深，〈自由主義的兩種類型——《獨立評論》與《自由中國》的比較〉，《中國論壇》361 (1990.10.10)，頁 14-17。

形勢上，要扮演具有正當性之客觀的「第三勢力」，必然不能再與特定媒體企業或是特定意識型態的政黨有過度密切的關係。因此在澄社成立精神的基礎上，參與的知識份子結束這段與《中國論壇》的合作關係，就知識份子的實踐層面而言，其意義反而是更積極的。<sup>282</sup>

從「中國論壇派」的立論脈絡，可以看到知識份子試圖扮演「第三勢力」的論述位置，嘗試從客觀的、學理的觀點對政黨政治加以批評的想法。1989年以《中國論壇》編委群為班底組成的「澄社」，亦主張「第三種聲音」，以提供民眾判斷國民黨、民進黨兩黨說詞或所作所為是否得當的參考。澄社之所以強調「第三種聲音」，意味著民進黨已羽翼豐滿，足以直接與國民黨交涉，而不需要自由派學者居間協調。這群不打算黨派化的學者，必須重新自我定位，以確保知識份子獨立批判的立場。澄社決定標榜「論政而不參政」，一方面延續《自由中國》以來的理想，以社會批判來促進自由民主體制的實現；另一方面則要求出任黨政職務的社員皆須自動退社，以確保超然獨立之立場。比較《中國論壇》和澄社的主張看來，不難發現兩者的相似點，而這或可說是自由主義者的一貫特色。此外，澄社所標榜「論政而不參政」的主張，在先前《中國論壇》談到「知識份子本身的問題」時，同樣關心學者從政與學官兩棲，以及知識份子的使命感與角色扮演問題。由此可見，《中國論壇》和澄社皆深具學者主導的菁英色彩。<sup>283</sup>

隨著1986年民進黨成立，以及1987年解嚴，1988年開放報禁之後，民營報紙開始改版與增加張數，有意辦報的社會人士也展開行動，此後台灣平面媒體便走向自由化與多元的時代。進入1990年代，憲政改革陸續底定，民進黨逐漸可以和國民黨相抗衡，而在這兩大政黨的激烈競爭下，所謂「第三勢力」、「第三種聲音」能夠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少。隨著時代日益開放，政黨政治逐步成長茁壯，知識份子比以前多出不少機會

---

<sup>282</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頁166-168、175。

可以擔任黨政職務；除了從事「議政」之外，還可積極地「參政」，因此如何將自由民主的理念落實在當前的政局上，則顯得更為實際與迫切。

## 二、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環境

在 1950 年代，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急於台灣推展自由主義，期使建設台灣為一「自由中國」。但是台灣成為國民黨政府有效控制的最後一個據點，在面臨中共攻台的戰爭威脅下，勢必以維繫政權為首要。因此國民黨政府對知識份子進行無情的打擊，進入「白色恐怖」的統治時期。在白色恐怖時期，信仰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想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只好潛心研究教育和傳播自由主義的理念。縱使白色恐怖時期是自由主義在台灣發展的低潮時期，但自由主義的根苗並未斷絕，反而逐漸在台灣生根蔓延。國民黨政府在面臨中共威脅下，總是深恐自由主義會帶來混亂無序，而未認識到自由主義可以作為反共的思想利器。在學術、思想言論與一直有著政治的桎梏，無法充分享有自由。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雖然標榜法治，但實際上人治的成分濃厚，使得日治時期在台灣建立的法治觀念與習慣無以為繼，不能以既有的法治基礎來建立自由主義的法政制度，反而成為自由主義發展的限制與障礙。

及至蔣經國執政末期，開始放鬆對台灣的全面控制，自由主義在政經方面所受的深重限制才日漸減少。國民黨政府自蔣經國時代以來，確立了「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政策走向，在政治上也逐漸採取自由開放的態度，並容忍公開競爭的反對政黨。這種自由化的政經政策，有助於自由主義在台灣茁壯。戰後台灣的戒嚴法，從 1949 年到 1987 年，實行有三十八年之久，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遊行自由的基本人權，普遍受摧殘損害。1986 年民進黨突破黨禁，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宣佈解嚴，

---

<sup>283</sup> 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頁 24。

接著黨禁和報禁也跟著解除，開始放鬆對台灣的全面控制。隨著解嚴、組織反對黨、國會改選，以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加速民主現代化和政治革新之推展，有助於自由主義在台灣的成長茁壯。<sup>284</sup>

在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程裡，主要是以報章雜誌來扮演啓蒙批判的角色，這種現象則與特殊時代背景有關，主要是戒嚴時期對言論自由與政黨政治的嚴密控制。自由主義者一向主張溫和漸進的體制內改革，以及倡導議會路線，因此能避免大多數黨外政論雜誌面臨遭政府查禁、停刊的命運，而持續發揮知識份子監督政府、提供建言的功能。早年自由主義者由於受到政府壓制，無法組織強而有力反對黨來制衡執政者，因此在這種有限的反對管道下，報刊雜誌便成為知識份子發表言論的主要戰場。然而，知識份子透過勸諫、建言和輿論的方式來監察政府，以及發起和參與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來對執政者施壓的方式，所能發揮的制衡力量終究有限，難以獲得主導權。1977 年的「中壢事件」，使台灣的民主運動走向一個新的階段。在此之前，主導運動的，大體上以知識分子為主，之後，民間的政治運動家紛紛崛起，一直居於運動的領導地位。1986 年成立了「民主進步黨」，這不僅是在台灣，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為它純是發自民間的一股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沒有這種力量，一黨獨霸的政權，很難自動走向民主。<sup>285</sup>

進入 1990 年代，台灣社會本身的迅速多元化，也使得自由主義不再是唯一具有論述正當性的綱領，例如：族群認同政治、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以不同方式吸走了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的注意力，而自由主義論政團體只是諸多社會力量之一，且可能是實踐能量較低的一種。許多新興團體都有發行刊物的能力，反而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再有類似的舞台，聲勢自

---

<sup>284</sup> 張明貴，〈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前途〉，《中國論壇》31：1=361 (1990.10)，頁 25-27。

<sup>285</sup> 韋政通，〈儒家與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國論壇》313 (1988.10.10)，頁 40-41。

然相形見绌，<sup>286</sup>於是自由主義逐漸成爲學院內的理論研究而已。

台灣從 1970 年代經濟社會持續成長以來，尤其到解嚴之後的自由發展，整個社會快速地朝向市場化的方向前進。各種媒體、報紙，甚至是知識論述亦逐一被納入市場環境中，成爲自由競爭的一環。無論是對像《中國論壇》般的雜誌，甚至是對《聯合報》這樣的主流傳播媒體而言，所要面對的都將是一個更爲自由競爭的環境，因此，問題也許已經不在於是否知識份子能獨立經營「嚴肅的理性刊物」的方向上，而是「嚴肅的理性刊物」如何面對逐漸走向消費化的大眾文化，以及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sup>287</sup>

1980 年代末期，台灣反對運動的台獨主張日益明確，產生中國／台灣（省籍、統獨）情結，使得族群議題發酵，連帶影響到台灣人民的認同態度，形成台灣社會內部的不可忽視張力。認同差異造成的社會分化與對立摩擦，也衝擊到知識份子本身的價值取向，形成不同的文化認同立場。從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傳播以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便一直進行著拉鋸戰，而其中有大部份時間皆以民族主義比較佔上風。尤其一旦遇到內憂外患時，救亡圖存的聲音便會壓過追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因此自由派的訴求常趨於邊緣化。自由主義的理念似乎適合在政經情勢安定的情勢下，才能獲得有效的發展與成熟。

台灣自由主義運動缺乏的，不只是比較完整而有系統的歷史反省，而且也缺乏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深入瞭解。自由主義不是經過引述或栽植，就一定可以成長茁壯，而是還要經過人爲的努力，不斷地向僵化的體制與權威，乃至於世俗化的規範提出質疑與挑戰，才能在相互激盪中，展現無窮生機。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可謂根苗於貧瘠的土地。台灣受到歷史環境政治與傳統文化因素的限制與障礙，構成不利於自由主義發展的條件。儘管自由主義在台灣發展的先天環境不良，有著主客觀因素的限制，

---

<sup>286</sup>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305。

<sup>287</sup> 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頁 170-171。

但是先天環境不良，可以靠後天的調養加以改良，這也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所在。況且，台灣由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長期耕耘與努力，以及政經情勢的改變，已經產生有利於自由主義發展的條件。因此，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前途，不再如往昔一樣的深受限制，而是有著發揚光大的希望。

總之，目前在自由主義尚未成熟的台灣，知識份子必須勤於研究、教育和傳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勇於監督政府，防止政治腐化，甚至直接參與政治，激濁揚清，才能確保自由主義在台灣發展的有利條件。前一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已在惡劣的環境下，努力護持培育台灣自由主義的根苗，未來自由主義能否在台灣開花結果，就要看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表現如何。自由主義在台灣仍有一段漫長的道路要走，需要新一代的知識份子來承繼與具體實踐，使其理論主張與現實政治環境能更加緊密結合。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

#### (一) 中國論壇叢書

- 1、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女性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台北：中國論壇雜誌社，1989)。
- 2、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
- 3、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我的探索》(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
- 4、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台北：中國論壇雜誌，1989)。
- 5、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挑戰的時代——對當前問題的一些看法》(台北：中國論壇社，1980)。
- 6、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編，《面對未來的沉思》(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
- 7、 胡佛、李鴻禧主編，《成長的民主》(台北：中國論壇社，1980)。
- 8、 韋政通、李鴻禧編，《思潮的脈動》(台北：中國論壇社，1983)。
- 9、 楊國樞等編，《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台北：中國論壇社，1980)。
- 10、 楊選堂(子)，《楊子論衡》(台北：中國論壇社，1980)。

#### (二) 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 1、 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縣：國史館，2000)。
- 2、 陳世宏、張建隆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三)：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台北縣：國史館，2001)。
- 3、 程玉鳳、李福鐘執行編輯，《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縣：國史館，2002)。
- 4、 程玉鳳、李福鐘執行編輯，《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四)：國會改造》(台北縣：國史館，2001)。
- 5、 歐素瑛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五)：地方自治與選舉》(台北縣：國史館，2001)。
- 6、 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縣：國史館，2000)。

#### (三) 雜誌

- 1、 《八十年代》(1979.6-1979.12，1981.2-1986.2)

- 2、《大學雜誌》(1968.1-1986.1)
- 3、《中國論壇》月刊(1990.11-1992.10)
- 4、《中國論壇》半月刊(1975.10.10-1990.10.10)
- 5、《中華雜誌》(1963.8-1986.9)
- 6、《文星》(1957.11-1965.12)
- 7、《台灣政論》(1975.8-1975.12)
- 8、《自由中國》(1949.11-1960.9)
- 9、《亞洲人》(1980.2-1980.4)
- 10、《前進》系列雜誌(1983.3-1986.9)
- 11、《美麗島》(1979.8-1979.11)
- 12、《深耕》系列雜誌(1981.6-1986.2)
- 13、《暖流》(1980.7-1980.8)

#### (四) 報紙

- 1、《中央日報》訊，〈本黨政策會發表聲明正告無黨籍人士，莫輕易嘗試任何違法激烈之行動〉，《中央日報》(1986.10.1)，收於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縣：國史館，2000)，頁 592-595。
- 2、王克敬，〈信託公司弊案引發金融風暴，致使財經當局嚴防資金私用〉，《自立早報》「台灣十年專題」(1989.12.25)，第九版。
- 3、張作錦，〈談報紙的限張和限印〉，《聯合報》(1981.7.13)，第三版。
- 4、陳儀深，〈張忠棟與台灣自由主義的前景〉，《自由時報》(2001.11.06)，第十五版。
- 5、楊照、顏厥安，〈左右失衡、前後失據的台灣自由主義〉，《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9.02.28)。
- 6、鄭瑞城，〈一九九〇年台灣十大問題評析(九)——傳播媒體的問題〉，《自立晚報》(1991.3.10)，第十七版。
- 7、鄭瑞城，〈公眾的角色與報業發展〉，《聯合報》(1987.9.16)，特別第二、三版。

## 二、專書

- 1、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編，《自由中國選集 1：地方自治與選舉》(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 2、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編，《自由中國選集 2：司法獨立》(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 3、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編，《自由中國選集 3：言論自由》(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 4、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編，《自由中國選集 4：反對黨問題》(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 5、王振寰,〈誰統治台灣? 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1996)。
- 6、王惕吾,《聯合報三十年的發展》(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1)。
- 7、包澹寧著, 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 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台北: 時報文化, 1995)。
- 8、田弘茂著, 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遷》(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9、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1999)。
- 10、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 揚智文化事業公司, 1998)。
- 11、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 聯經出版社, 2001)。
- 12、吳密察監修, 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台北: 遠流出版公司, 2000), 頁 184-189。
- 11、李金銓,《新聞的政治, 政治的新聞》(台北: 圓神出版社, 1987)。
- 12、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 自立晚報社, 1987)。
- 13、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 自立晚報社, 1986)。
- 14、李瞻,《新聞學原理》(台北: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1988)。
- 15、沈衛威,《升起與失落: 胡適派文人集團引論》(台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2000)。
- 16、阮銘等著,《民主在台灣》(台北: 遠流出版公司, 2001)。
- 17、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台北: 前衛出版社, 1990)。
- 18、胡佛,《政治變遷與民主化》(台北: 三民書局, 1998)。
- 19、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20、若林正丈著, 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 月旦出版社, 1996)。
- 21、若林正丈著, 張炎憲審訂, 何義麟、陳添力譯,《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台北: 故鄉出版公司, 1989)。
- 22、韋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紀念殷海光逝世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1990)。
- 23、馬之驢,《雷震與蔣介石》(台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1993)。
- 24、張玉法,《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99)。
- 25、張佛泉,《自由與人權》(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3)。
- 26、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1998)。
- 27、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1987)。
- 28、陳國祥、祝萍,《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台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1987)。
- 29、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台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1987)。
- 30、彭懷恩,《台灣政黨政治》(台北: 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4)。
- 31、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 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1)。
- 32、彭懷恩,《認識台灣——台灣政治五十年》(台北: 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7)。
- 33、黃嘉樹,《國民黨在台灣》(台北: 大秦出版社, 1994)。

- 34、黃嘉樹，《第三隻眼看台灣：透視國民黨的台灣經驗 1945-1988》(台北：大秦出版社，1996)。
- 35、澄社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社，1992)。
- 36、鄭牧心(鄭梓)，《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1)。
- 37、鄭梓，《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1946-1951)》(台北：鄭梓發行，1993)。
- 38、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
- 39、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1999)。
- 40、薛化元、陳翠蓮、吳鯤魯、李福鐘、楊秀菁著，《戰後台灣人權史》(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 41、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編著，《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0)，頁 270-271。

### 三、學位論文

- 1、古方雄，〈反對勢力政論雜誌言論主題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 2、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3、朱高影，〈威權體制下的諍臣——陶百川的政生涯(1949-1986)〉，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 202。
- 4、林惠萱，〈台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5、洪春柳，〈中美斷交後國內政論內容分析：「黃河」、「中國論壇」、「八十年代」分析比較〉，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 6、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啓蒙運動〉，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7、陳依，〈《觀察》周刊之研究(1946-1948)〉，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8、陳孟元，〈台灣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9、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 10、陳惠忠，〈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以羅隆基為例(1928-1949)〉，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11、馮建三，〈政論雜誌讀者型態的比較分析〉，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 12、楊秀菁，〈台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13、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 14、蔡智賢，〈《中國論壇》的形成與發展——知識分子特質的分析〉，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15、蔡裕仁，〈黃信介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16、賴永忠，〈台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從日據時期到民國 81 年〉，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1992。
- 17、簡明海，〈救亡與啓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18、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四、期刊論文

##### (一) 《中國論壇》

- 1、中國論壇社，〈我們的抱負和希望——代發刊詞〉，《中國論壇》1:1 (1975.10)，封面裡。
- 2、李祖琛，〈大眾媒介不應只是療傷止痛〉，《中國論壇》237 (1985.8.10)，頁 9。
- 3、李祖琛，〈大眾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中國論壇》274 (1987.2.25)，頁 33。
- 4、李祖琛，〈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中國論壇》263 (1986.9.10)，頁 21。
- 5、李寒冰，〈民生報發行突破卅萬份引起的省思〉，《中國論壇》240 (1985.9.25)，頁 9。
- 6、李筱峰，〈知識分子與政治革新運動〉，《中國論壇》23:1=265 (1986.10)，頁 68-92。
- 7、李鴻禧，〈人權理念的回顧與前瞻——慶祝國際人權日〉，《中國論壇》101 (1979.12.10)，頁 21-27。
- 8、李鴻禧，〈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國論壇》272 (1987.1.25)，頁 1。
- 9、李鴻禧，〈我國人權之概況與展望——解嚴之轉捩〉，《中國論壇》287 (1987.9.10)，頁 29-35。
- 10、李鴻禧，〈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上)〉，《中國論壇》226 (1985.2.25)，頁 37-43。
- 11、李鴻禧，〈言論出版自由之民主憲政意義——兼論其與誹謗之關係(中)〉，《中國論壇》227 (1985.3.10)，頁 55。
- 12、李鴻禧，〈建立溝通、討論、妥協的現代政治體系——溝通理論的序說(上)〉，《中國論壇》262 (1986.8.25)，頁 29-30、33-34。
- 13、李鴻禧，〈革新政府執政黨結構，回歸民主憲政體制〉，《中國論壇》300 (1988.3.25)，頁 17。
- 14、李鴻禧，〈雷震先生的憲法學者畫像——逝世十週年追思〉，《中國論壇》323 (1989.3.10)，頁 56、60。
- 15、李鴻禧，〈認清選民投票意向，瞭解選舉時代背景——年底選舉之動態剖析〉，《中國論壇》123 (1980.11.10)，頁 11。
- 16、李鴻禧，〈憲法基本概念之澄清——從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談起(下)〉，《中國論壇》

- 186 (1983.6.25), 頁 39-40。
- 17、李鴻禧,〈戰後台海兩岸推展法治之比較——兼談法學底研究〉,《中國論壇》24 (1985.10.10), 頁 196。
- 18、李鴻禧,「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32 (1981.3.25), 頁 23-26。
- 19、李鴻禧,「台灣向前看——當前國家情勢的檢討與展望」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93 (1987.12.10), 頁 25。
- 20、李鴻禧,「如何加強立法院的功能及其運作」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72 (1982.11.25), 頁 21-23。
- 21、李鴻禧,「如何建設民主法治的政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97 (1979.10.10), 頁 47。
- 22、李鴻禧,「政治制衡與社會和諧」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56 (1986.5.25), 頁 19。
- 23、李鴻禧,「揭開歷史的新頁——對新內閣的建議和展望」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08 (1984.5.25), 頁 26。
- 24、李鴻禧,「當前問題的探討:(一)民主政治的前途」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49 (1977.10.10), 頁 12。
- 25、辛築,〈建立超然理性的輿論力量〉,《中國論壇》273 (1987.2.10), 頁 7。
- 26、林嘉誠,〈七十二年立委選舉結果的政治觀察〉,《中國論壇》17:5=197 (1983.12.10), 頁 38-39。
- 27、林嘉誠,〈如何提供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中國論壇》8:8=92 (1979.7.25), 頁 44-45。
- 28、林嘉誠,〈政治改革祇進無退〉,《中國論壇》295 (1988.1.10), 頁 57-58。
- 29、林嘉誠,〈為政治權力運作的制度化構思〉,《中國論壇》201 (1984.2.10), 頁 29。
- 30、林嘉誠,〈國會改選的幾個大問題〉,《中國論壇》26:1=301 (1988.4.10), 頁 51-53。
- 31、林嘉誠,〈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之後〉,《中國論壇》277 (1987.4.10), 頁 53-54。
- 32、林嘉誠,〈集會遊行的立法規範問題〉,《中國論壇》281 (1987.6.10), 頁 37-39。
- 33、林嘉誠,〈蛻變中政局的觀察與展望〉,《中國論壇》19:9=225 (1985.2.10), 頁 34-37。
- 34、林嘉誠,〈厲行民主憲政,充分保障人權——對民國七十年政治建設的期望〉,《中國論壇》11:7=127 (1981.1.10), 頁 6-8。
- 35、林嘉誠,「青年人談國是(一)——突玻璃頸,邁向民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75 (1983.1.10), 頁 13。
- 36、社論,〈哀矜勿喜,民主是從——我們對「美麗島事件」的一些感想〉,《中國論壇》9:6=102 (1979.12.25), 封面裡。
- 37、社論,〈政治的智慧〉,《中國論壇》172 (1982.11.25), 封面裡。
- 38、社論,〈值得讚揚的明智決定——對恢復選舉的看法與期望〉,《中國論壇》114 (1980.7.25), 封面裡。
- 39、社論,〈容忍才有理性,自由才能創新,平等才可溝通〉,《中國論壇》215 (1984.9.10), 封面裡。
- 40、社論,〈理解當前國運,審慎參與選舉——對有志競選者的獻言〉,《中國論壇》116 (1980.8.25), 封面裡。

- 41、社論，〈揮著人權的石斧〉，《中國論壇》42（1977.6.25），封面裡。
- 42、社論，〈新聞言論自由的問題〉，《中國論壇》190（1983.8.25），封面裡。
- 43、社論，〈對執政黨的兩點厚望〉，《中國論壇》101（1979.12.10），封面裡。
- 44、胡佛，〈威權與民主之間——台灣經驗的探索〉，《中國論壇》28：3=372（1989.05），頁7-10。
- 45、胡佛，〈政治的高調與低調〉，《中國論壇》217（1984.10.10），頁19。
- 46、胡佛，〈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中國論壇》52（1977.11.25），頁16-17。
- 47、胡佛，「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32（1981.3.25），頁21-23。
- 48、胡佛，「回歸憲政：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66（1986.10.25），頁57。
- 49、胡佛，「如何建設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56（1986.5.25），頁45-47。
- 50、胡佛，「國是會議與憲政改革」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350（1990.4.25），頁8。
- 51、胡佛，「選舉罷免法要更好——對『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草案』的看法」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06（1980.2.25），頁11。
- 52、韋政通，〈科學、民主、反傳統——以「台灣經驗」反省「五四」〉，《中國論壇》327（1989.5.10），頁60。
- 53、韋政通，〈三十多年來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從「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到黨外的民主運動〉，收錄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頁341-380。
- 54、韋政通，〈推廣民主教育，發展民主文化——為自由主義者重定位〉，《中國論壇》356（1990.7.25），頁2-3。
- 55、韋政通，〈儒家與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國論壇》313（1988.10.10），頁40-41。
- 56、韋政通，「談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74（1987.2.25），頁12。韋政通，「談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74（1987.2.25），頁12。
- 57、張忠棟，〈年輕人求新要變——寫在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就任之前〉，《中國論壇》63（1978.5.10），頁14。
- 58、張忠棟，〈那裡是中國的光明大道？〉，《中國論壇》35（1977.3.10），頁10-11。
- 59、張忠棟，〈恢宏開放，積極進取——四全會前夕向執政黨進一言〉，《中國論壇》100（1979.11.25），頁10。
- 60、張忠棟，〈恢宏開放，積極進取——四全會前夕向執政黨進一言〉，《中國論壇》100（1979.11.25），頁11。
- 61、張忠棟，〈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中國論壇》265（1986.10.10），頁109-119。
- 62、張忠棟，〈紀念胡適逝世廿五週年〉，《中國論壇》247（1987.2.25），頁1。
- 63、張忠棟，〈國民黨台灣執政四十年〉，《中國論壇》27：7=319（1989.1），頁62-70。
- 64、張忠棟，〈統一之前我們如何自處？〉，《中國論壇》217（1984.10.10），頁10。
- 65、張忠棟，〈雷震和國民黨分手的開始〉，《中國論壇》323（1989.3.10），頁68。

- 66、張忠棟，〈錯誤的戒嚴情結〉，《中國論壇》305（1988.6.10），頁1。
- 67、張忠棟，〈「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73（1978.10.10），頁58。
- 68、張忠棟，〈「揭開歷史的新頁——對新內閣的建議和展望」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208（1984.5.25），頁17-18。
- 69、張明貴，〈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前途〉，《中國論壇》31：1=361（1990.10），頁23-27。
- 70、黃光國，〈「中國結」與「台灣結」：對抗與出路〉，《中國論壇》289（1987.10.10），頁16、18。
- 71、黃光國，〈治絲益棼的團會改革困境〉，《中國論壇》342（1989.12.25），頁10-12。
- 72、黃光國，〈革新與團結〉，《中國論壇》79（1979.1.10），頁37-38。
- 73、黃光國，〈「加速推展我國民主政治——對國民黨十二全會的誠懇建言」座談會發言〉，《中國論壇》132（1981.3.25），頁34。
- 74、楊子，〈一喜一憂〉，《中國論壇》53（1977.12.10），封底裡。
- 75、楊子，〈民主憲政的再開展〉，《中國論壇》116（1980.7.25），封底裡。
- 76、楊子，〈在野黨自處之道〉，《中國論壇》94（1979.8.25），封底裡。
- 77、楊子，〈相爭而和諧〉，《中國論壇》96（1979.9.25），封底裡。
- 78、楊國樞等，〈陶百川、楊國樞、胡佛、李鴻禧談民進黨與政黨政治發展〉（座談會），《中國論壇》23:10（1987.1），頁8-25。
- 79、楊選堂，〈心憂天下、手援天下——《中國論壇》半月刊創刊十週年叢書總序〉，收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頁1-7。
- 80、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1992.10），頁2-16。
- 81、楊選堂等，〈「報禁」應予開放〉，《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30-31。
- 82、楊選堂等，〈加速中國國民黨的現代化、民主化〉，《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14-15。
- 83、楊選堂等，〈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7-11。
- 84、楊選堂等，〈健全「國會」發揮「國會」功能之道〉，《中國論壇》145（1981.10.10），頁12-13。
- 85、劉淑慧、姚光祖、曾惠敏訪問整理，〈三位召集人走過從前——尉天聰、袁頌西、李鴻禧教授談《中國論壇》〉，《中國論壇》31:1=361（1990.10），頁28-35。
- 86、論壇，〈「報禁」開放的省思〉，《中國論壇》274（1987.2.25），封面裡。
- 87、論壇，〈朝野應多努力尋求政治和諧〉，《中國論壇》258（1986.6.25），封面裡。
- 88、論壇，〈解嚴後的社會〉，《中國論壇》284（1987.7.25），封面裡。
- 89、論壇，〈解嚴後的第一個光復節〉，《中國論壇》290（1987.10.25），封面裡。
- 90、論壇，〈審慎釐訂集會遊行法規〉，《中國論壇》281（1987.6.10），封面裡。

## （二）一般期刊

- 1、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1989），頁71-116。

- 2、 王惕吾，「開放社會中的新聞事業」座談會發言，《中央月刊》9：11 (1877.9)，頁 26-27。
- 3、 本刊編輯部，〈黨外雜誌的昨日、今日、明日——總評黨外十本刊物〉，《夏潮論壇》9：2 (1984.10)，頁 31。
- 4、 朱雲漢，〈國會結構，國會選舉與政黨政治〉，收錄於蕭全政主編，《改革憲政》(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頁 161-162。
- 5、 江宜樺，〈自由主義哲學傳統之回顧〉，《當代》9=127 (1998.03)，頁 16-29。
- 6、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25 (1997.03)，頁 83-121。
- 7、 李金銓，〈建立報業的遊戲規則〉，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頁 129-140。
- 8、 李金銓，〈說什麼，不說什麼？——再看字裡行間·再聽絃外之音〉，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頁 271-272。
- 9、 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收錄於氏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頁 87-100。
- 10、 李瞻，〈我國「報禁」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收錄於氏著，《新聞學原理》(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8)，頁 343-386。
- 11、 李瞻，〈國父與總統蔣公的傳播思想〉，收錄於氏著，《新聞學原理》(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8)，頁 15-27。
- 12、 汪榮祖，〈自由主義與中國〉，《二十一世紀》2 (1990.12)，頁 33-37。
- 13、 南方朔(王杏慶)，〈中國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收錄於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台北：四季出版社，1979)，頁 1-63。
- 14、 南方朔，〈我們曾有過一個黑暗年代——新聞文化人被政治壓迫的那段歷史〉，《新新聞週刊》98 (1989.1.23-29)，頁 68-70。
- 15、 施和悌，〈聯合報從此失去「自由」？——自由派學者抵制聯合報系始末〉，《財訊月刊》100 (1990.7)，頁 211-215。
- 16、 胡佛，〈台灣威權政治的傘狀結構〉，收錄於氏著《政治變遷與民主化》(台北：三民書局，1998)，頁 13-19。
- 17、 康寧祥，〈主體意識的紛爭—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錄於氏著，《危機與希望》，頁 135-151。
- 18、 康寧祥，〈立法院「杯葛」風波〉，收錄於氏著，《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83)，頁 153-156。
- 19、 張玉法，〈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收於《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1912-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1217。
- 20、 陳儀深，〈「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家張忠棟〉，《當代》33=151 (2000.3)，頁 62-77。
- 21、 陳儀深，〈中國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延續與沒落〉，遊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北：月旦出版社，1996)。
- 22、 陳儀深，〈自由主義的兩種類型——《獨立評論》與《自由中國》的比較〉，《中國論壇》361 (1990.10.10)，頁 14-17。
- 23、 曾華璧，〈1980 年代「中國論壇」環境主題之論述及其與環境主義關係之研究〉，《思

- 與言》34:1 (1996.03)，頁 207-262。
- 24、曾華璧，〈一九七〇年代「中國論壇」有關環境主題論述之歷史意義〉，《思與言》33:4 (1995.12)，頁 1-28。
- 25、曾熾卿，〈一九九〇台灣報業趨勢——兩大報仍將壟斷報業市場〉，《財訊》95 (1990.2)，頁 119-124。
- 26、游賢達，〈查扣的手由哪裡伸出？〉，《新新聞》周刊 124 (1989.7.24-30)，頁 20-21。
- 27、馮建三，〈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995)，頁 177-233。
- 28、黃克武，〈自由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國史館館刊》30 (2001.6)，頁 1-16。
- 29、楊國樞等，〈自由主義者張忠棟教授〉，《當代》25=143 (1999.7)，頁 55-75。
- 30、楊森，〈「新聞黑手」面臨角色轉變的新挑戰〉，《財訊》95 (1990.2)，頁 169-173。
- 31、楊憲宏，〈退報——一種潛藏的社會運動〉，《當代》32 (1988.12.1)，頁 119-121。
- 32、楊憲宏，〈黨器官宣傳員與愛國〉，《台灣春秋》2：5 (1990.3)，頁 224。
- 33、董孟郎，〈跑軍事新聞的記者，請你注意〉，《新新聞》周刊 124 (1989.7.24-30)，頁 22-23。
- 34、潘光哲，〈張忠棟教授與現代中國 / 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台灣歷史學會通訊》9 (1999.9)，頁 28-39。
- 35、潘家慶、王石番、謝瀛春，〈台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1986)〉，出自《新聞學研究》第四十集(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88)，頁 70-74。
- 36、餘曉雯，〈這扇飄送書香味的窗戶終於關上了——「中國論壇」歷來扮演的角色與停刊的原因〉，《新新聞周刊》291 (1992.10.3-9)，頁 74-75。
- 37、錢永祥，〈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1：4 (1988.12)，頁 57-97。
- 38、薛化元，〈「自由中國」雜誌自由民主的理念的考察——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思想史研究之一〉，《台灣史研究》2：1 (1995.6)，頁 127-159。
- 39、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 (1949-60)：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思與言》34：3 (1996.9)，頁 241-286。
- 40、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對國家定位思考的歷史探討——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為例〉，《台灣風物》48：1 (1998.3)，頁 41-61。
- 41、薛化元，〈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23=141 (1999.5)，頁 32-45。